



革命のつくり方

台湾ひまわり運動 — 対抗運動の創造性

港千尋
Minato, Chihiro
林暉鈞

革命的な做法

從318太陽花看 公民運動的創造性



作者 | **港千尋** | 1960年9月25日生於日本神奈川縣，為國際知名攝影家、評論家、影像人類學家，大學教授及藝術策展人。1984年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畢業後前往南美洲各地長期駐留，自1985年起，以巴黎為據點展開攝影家及評論家的工作。1995年起任教日本多摩美術大學，現任多摩美術大學美術系教授。

港千尋為傑出藝術策展人，曾擔任2007年威尼斯雙年展日本館策展人及2012年台北雙年展微型博物館策展人，2014年7月起，擔任2016年愛知三年展藝術總監。他亦為知名攝影家、攝影評論人，舉辦過多項攝影個展，作品並獲法國國家圖書館、東京都攝影美術館及紐約現代美術館等收藏。他出版多本攝影集，其中《文字的眾母親》曾發行中譯本（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港千尋善於解析空間中「群眾」及其「移動」背後所顯示的意涵



心靈工坊 Facebook 粉絲專頁

歡迎上網和我們分享
你的「革命的做法」

作者 | **港千尋** | 1960年9月25日生於日本神奈川縣，為國際知名攝影家、評論家、影像人類學家，大學教授及藝術策展人。1984年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畢業後前往南美洲各地長期駐留，自1985年起，以巴黎為據點展開攝影家及評論家的工作。1995年起任教日本多摩美術大學，現任多摩美術大學美術系教授。

港千尋為傑出藝術策展人，曾擔任2007年威尼斯雙年展日本館策展人及2012年台北雙年展微型博物館策展人，2014年7月起，擔任2016年愛知三年展藝術總監。他亦為知名攝影家、攝影評論人，舉辦過多項攝影個展，作品並獲法國國家圖書館、東京都攝影美術館及紐約現代美術館等收藏。他出版多本攝影集，其中《文字的眾母親》曾發行中譯本（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港千尋善於解析空間中「群眾」及其「移動」背後所顯示的意涵，尤其親臨世界各地公民運動，作為他的觀察場域。2014年台灣太陽花運動期間進入立院採訪，著作本書。

譯者 | **林暉鈞** | 國立藝專畢，為國內知名小提琴家。醉心哲學與當代思潮，2011年起引介並翻譯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著作，已出版《論理21》、《柄谷行人談政治》、《世界史的結構》、《哲學的起源》，另譯有《高山寺的夢僧》、《當村上春樹遇見榮格》等書（均由心靈工坊出版）。



革命的 做法

譯 林暉鈞

港千尋

著

從318太陽花
看公民運動的創造性







推薦序一 暗箱中的詩學反叛——龔卓軍——12

推薦序二 心中默念著島嶼天光——吳佳璇——18

中文版序 革命就像不結束的變奏曲——港千尋——20

前言 佔領國會的背景——26

第一部
時代之聲

01 群眾的議會——38

02 群眾的反叛——42

03 另一個議會——72

04 創造出來的民主——90

第二部
革命的作法

01 黑箱——106

03 向日葵——124

02 議會——116

04 身體性——130

05 配置圖——138

07 翻譯部——146

09 教室——158

11 具體性——168

13 補給——178

15 歌——190

17 意見——202

19 版畫——212

21 報民——224

06 醫療站——142

08 緊急通道——152

10 交通標誌——162

12 繩結——172

14 都市的模型——182

16 轉播——198

18 照片——208

20 交織——220

太陽花運動大事紀——234

謝詞——250

延伸閱讀——252



暗箱中的 詩學反叛

龔卓軍

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
《藝術觀點ACT》主編、《報民》編輯

二〇〇三年，我翻譯出版了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的《空間詩學》後，引發了一些討論，我記得在種種討論過程中，最常遇到的提問便是：《空間詩學》是否過於強調幸福、庇護與窩巢的昇華空間，與此相對，暴力、不義與游動的精神現象似乎付諸闕如。巴舍拉的哲學，如何回答反叛與黑暗的空間詩學呢？這個總是讓我語塞的問題，經過十二年的遍尋著落，答案很意外地浮現在港千尋這本《革命的做法：從三一八太陽花看公民運動的創造性》之中。

《革命的做法》在書寫的方法上，取徑相當不同於《空間詩學》的心理分析與現象學，取材亦非法國現代詩歌，然而，我們可以說，這是一本基於「三一八太陽花運動」的現場觀察，如同九一一與三一一後諸多思想家，在事件發生前後立即進行的「事件

書寫」，又擬似當代社會革命的藝術參與手冊。

從「第一部：時代之聲」引用現代社會與政治革命的系譜學開始，作者將論述導向城市群眾運動的部署，以強而有力的「都市權」概念出發，運用革命語言的反叛和街頭上的轉換，指向「第二部：革命的做法」與當代藝術的深切關聯。猶如反叛詩學的組織分析，拆解出革命做法的活動零組件，在行為表演、活動劇場、物件、空間裝置、攝影、歌曲音樂、身體、活動影像、語言翻譯、教育型態、大眾媒體的訊息表現模式基礎上，如何由當代革命歷史的系譜，導出反叛空間的佔領與移動詩學，透過非整體化的零組件布建組態，一個個確有所指的節段，具體描述了政治歧義下的「感性分享」與「感性部署」的詩學迴盪共振，以回應「黑箱政治」和當代攝影「暗箱」的反制行動。

做為攝影家，港千尋首先是一位城市行走論的思考與踐行者。在二〇一三年十月號的《現代美術》，也就是太陽花運動爆發的五個月前，他就已經發表了〈沿著行走之線〉這篇文章，在徵引了日本詩人芭蕉、吉增剛造的行走，歷經當代攝影者森山大道和荒木經惟的都市行走發揚此一傳統後，他轉向了法國哲學家居伊·德波（Guy Debard）國際情境主義的漂移（dérives）做法，以檢視城市的精神地理學的獨特地帶

與群眾狀態。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待台灣攝影家張照堂的攝影價值，在我閱讀這篇文章時，著實令我充滿驚喜。

沒想到港千尋的行走論，不僅止於個體閒逛者式的漂移，藉由《革命的做法》，我們看到了攝影家個體以異鄉人之姿，迅速混入了城市革命的行走陣營中，「觸覺式」地成為美國文學家愛倫坡（E. A. Poe）小說《群眾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的那個人，又像法國散文詩鼻祖波特萊爾（C. Baudelaire）那個插接上都市群眾這個「大蓄電池」的閒逛者，雖然他只在三月底的運動高峰期，在翻譯者呂孟恂與陳俯均的協助下，參與了四、五天，直至三三〇大遊行，卻可以在他的書寫中，清楚看到他各處行走的足跡，與歷經二十年以上，對東歐、南美洲、亞洲城市政治社會運動的用心參與觀察。除了以都市權鳥瞰東歐與南美當代社會革命的淵源，顯現了他年輕時代即已留下的「漂移」軌跡外，包括佔領議場與佔領街道的「空性場所」辯證關係，民主議會與說真話場所的語源學關係，議場外部遊行的觸覺式城市群眾集散論，議場內部裝置的物件議會和照顧倫理關係論，網路連線與媒體反制的話語圖像轉譯論，以及政治黑箱和攝影暗室之間的黑箱顯影論，在在都顯示了某種後國際情境主義者穿越當代城市的有效步伐。

另一方面，港千尋的攝影術之中，對深層環境抱持的倫理美學態度，也隱隱散發於《革命的做法》的字裡行間。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他和我，以及於三一八期間與一群藝術家朋友共同製作《報民》的賴志盛相約，在台南的絕對空間舉行了「絕對不純粹」東亞論壇：報民/AABB—台南/東京交流計畫，邀請了港、台、日、韓的藝術家朋友相互討論，從歷史、社會、思想與美學的觀點，討論東亞的局勢。我記得在論壇結束後的酒桌上，我們彼此問起熱烈參與運動的私人原因。

他說，早在二〇〇九年，他與藝術家岡部昌生來台進行「拓繪樂生計畫」時，他就曾經思考一個尷尬的處境：面對日本殖民時期建立的樂生療養院，身為日本人的他，在這一段禁閉空間的歷史之後，總不免有某種難以言說、進退不得的角色錯置感。相對而言，與殖民傷痛和二戰創傷一樣，樂生不啻是日台間的黑暗、惡性、邊緣場所。但無論如何，他還是決定參與這個拓繪計畫。當計畫結束後，有七、八位院民突然排成一排，用昭和時期的日語腔告訴他：我們非常感謝兩位藝術家的到來，我們沒有什麼可以送給你們的東西，就讓我們唱一首歌送給你們吧！接著，這些身體歷經禁閉與病痛而蜷曲的院民，就用一種港千尋形容「只有他父母輩才有的古典日語優雅腔調」，唱起了〈故郷〉（ふるさと）這首二十世紀初期的日本老歌，其詞意曲調

與人聲在樂生空間湧現的同時，港千尋說他聽聞歌聲的當下，「頓時產生千百種複雜的情緒，終於崩潰大哭，淚流不止。」就在那個當下，他暗自期許，將來台灣有任何大事，他一定會設法前來，視同自己的事。

果不其然，「絕對不純粹」東亞論壇結束後逾三個月，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他的《革命的做法》日文版即已付梓，於東京問世，同時，他也透過出版社邀請了柄谷行人、林暉鈞和我，參與新書發表的座談會。中文版的翻譯工作，正是在會後我們一行人與編輯友人丸山哲郎共同踏查福島的路途中，拍板敲定的。以翻譯柄谷行人和河合隼雄思想而聞名的小提琴家林暉鈞，亦在心靈工坊出版社總編輯王桂花和《藝術觀點ACT》召集人孫松榮的支持下，迅速在三個月內完成了漢譯的繁重工作，為漢語世界帶來當代的革命訊息。我想說的是，這本書的寫作，不僅包含了對於樂生空間、三一八太陽花運動在城市革命中重大意涵的詮釋，也意在回應日本殖民下台日歷史交會中不堪的倫理難題，同時，更是一種善意的贈禮，是一位國際攝影者送給台灣當下歷史處境的密戀情書、友誼信札。

有幸與港千尋在這些特殊的歷史機緣中相遇，讓我從這本書的誕生到漢譯本的完成出版，見證了一位「對於城市的官方現實不為所動」的行走者、閒遊者，他汲汲以漂

移的姿態，走向被官方認為黑暗污穢的角落，找到被世人忽略的群眾，就像是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筆下的攝影師，在城市行走的路線上，命運操弄的路線外，捕捉中產階級富足生活外表下的非官方現實，猶如偵探逮捕犯人一般，精準無誤。



心中默念著 島嶼天光

吳佳璇

精神科醫師、作家、太陽花學運醫療志工團成員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九日，反黑箱服貿佔領立法院隔日，我得知剛穩住陣腳的學生設立了醫療站，便輾轉打聽負責人手機號碼，想問問精神科醫師能進去做些什麼。

「帶頭的開始『燒聲』，學姊在外頭，能不能想點辦法」，手機那端傳來的第一個任務，無關精神醫療。

透過臉書，我迅速得到家醫科開業學長回應。野百合學運世代的他概允提供類固醇（加速過度使用聲帶復原）及其他常備藥，並約好隔天按醫療站指示進場。

隨著佔領時間延長，不約而同進過立法院議場的精神科同仁，開始在社群網站討論輪值的必要，特殊情境下的醫療倫理及規範（含遵守醫療志工團指揮群決議，不能跟著學生呼口號，維持中立姿態），以及未來可能的工作內容。有人提議跟行動決策

小組要時間，站上原是院長寶座的指揮台來場演講，教大家如何放鬆；也有人針對二十四小時不熄燈、既緊張又喧囂的生活環境討論改善方案，企圖恢復在場學生的睡眠生理時鐘。自三月二十三日開始排班，歷經行政院流血驅離、五十萬聲援民眾湧入博愛特區、到四月十日退場，六十名陸續加入臉書「醫療團精神科」私密社團成員，除按排班陸續進場，更藉此平台，不斷交換工作經驗。

當學生與群眾退場、帳棚與拒馬撤去、立院議場與周邊交通漸次恢復時，多數參與學運的人也重回生活常軌。即便日後曾與「醫療團精神科」部分成員共同出席由台大心理系主任辦的「太陽花學運高風險／壓力環境心理照護研討會」，重新體驗、理解了現場及網路的學運經驗，但太陽花學運之於我，終究是漸行漸遠的天邊浮雲。

未料，就在我收到即將出版的《革命的做法》初稿，台北地檢署突然發布，將以違反《集會遊行法》、煽惑他人犯罪等罪名，起訴一百一十九名太陽花學運份子，二〇一四年春，偶然相逢黑夜海上曾互放的光亮，霎時溫熱鮮明。一如作者港千尋所言，群眾的記憶，並不是史書記載的延續，而是透過感性的共通經驗留存——它們是身體性的存在、各類社群網站私密社團、議場主席台上的太陽花、還有當時披著白袍，不好高歌的島嶼天光。

革命就像 不結束的變奏曲

這是一本特別的書，它別具雙重的意義——首先，原作發行不到半年就出版外文譯本，對我來說是頭一遭；再者，中文譯本的出版適逢太陽花運動一週年，這是個值得紀念的時機。同時，這本書對我本身來說，也佔有特別的地位，且讓我舉出幾點理由，作為中文版的序。

就如序言中所說，我從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就持續以群眾作為寫作的主題。我對世界各地興起的群眾現象深感興趣，試圖結合意象（image）、身體、記憶等主題，來解讀這些群眾現象。群眾出現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之中，起源非常古老，且普遍存在世界各地。拔除群眾與權力的關係，我們將無法理解群眾；它既是政治的問題，同時也是想像力與意象的問題。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東歐興起了民主革命，那個時

期我寫作了《群眾論》（一九九一），主要就是在此二十世紀影像文化的框架下，處理群眾的問題。

二十年後的二〇一一年，我原本打算撰寫二十一世紀的群眾論，但就在這個時候大震災襲擊日本，我也因此失去了寫作的契機。即便如此，在我腦海中的某處，仍然想要思考有關二十一世紀群眾與想像力的問題。二〇一四年三月，當我抵達太陽花學運現場的瞬間，我立刻就理解到，不論這場運動的結果如何，那裡正發生著非常重要的事情。二十一世紀的群眾所具有的想像力與創造性，在那裡顯露無遺。換句話說，對我而言，這場運動發生的時機非常特別。

身為外國人的我得以接觸到這場令人讚嘆的運動現場，也有其特別背景。一九八四年我第一次造訪台灣的時候，還是個大學生，其後也因為種種的企劃，又數度訪台。我參與了活字印刷的攝影與展覽會、樂生療養院的工作坊、以及台北雙年展，同時也參加了大學的研討會。透過這些活動，我和許多台灣友人交流，使我逐漸了解台灣的歷史與文化。在太陽花運動的激發之下，為了探討東亞共同反抗運動的可能性，我們在東京與台南舉辦了展覽、研討會以及座談，雙方的交流不斷擴大，直到今日，翻譯本書的機會也因而產生。太陽花運動的創造性，一方面來自許多人發揮自己的個性，

但同時也是協力合作的結果，本書也受到這種特別的「合作之力」的支持。要感謝的人太多了，但是我特別想要藉這個場合，表達對林暉鈞老師與龔卓軍老師衷心的謝忱。

關於本書的標題，我想在這裡說幾句話。在歐美的語言中，談到歷史上的革命，經常把第一個字母大寫。日文與中文沒有大小寫之分，但我個人覺得這樣反而比較好。因為，與其把革命當成只發生一次的特殊存在，還不如把它看作是漫長的、持續的過程，更能夠理解革命的本質。以音樂來比喻的話，大概就像只有開頭、沒有結束的變奏曲吧！本書（日文版）出版不久之後，香港發生了雨傘革命，以社會運動來說，或許它的結果看起來和太陽花運動不同，但若要了解它的本質，我們仍然必須關注在那過程之中的具體細節。本書特別重視人聲的重要性。人聲的力量首先發揮在細部，許多人的聲音組合起來，會形成任誰也預想不到的音樂。因此所謂的結束，其實可以看作是變奏開始的信號吧！無論如何，就像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所思想的那樣——若不是透過具體性，真理將無法顯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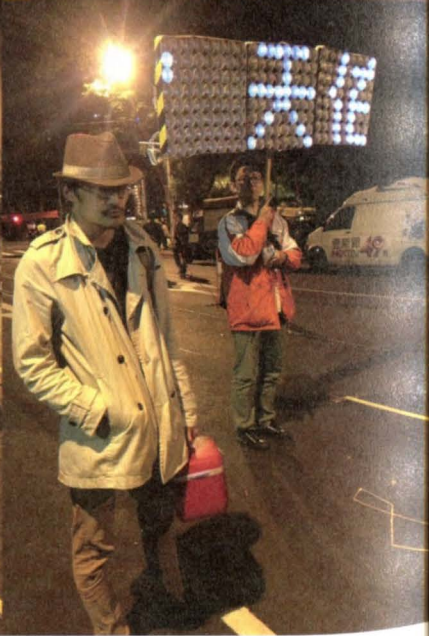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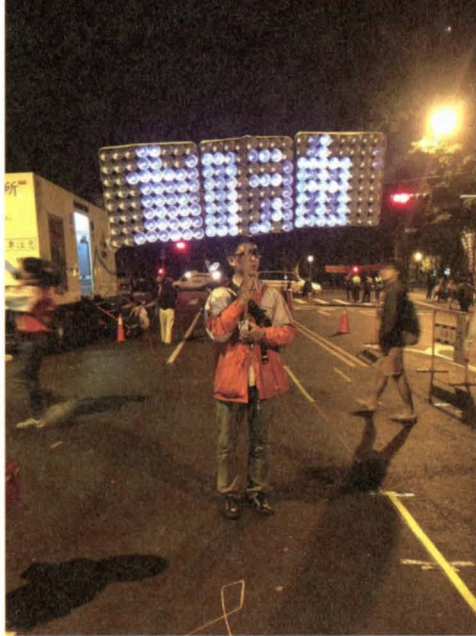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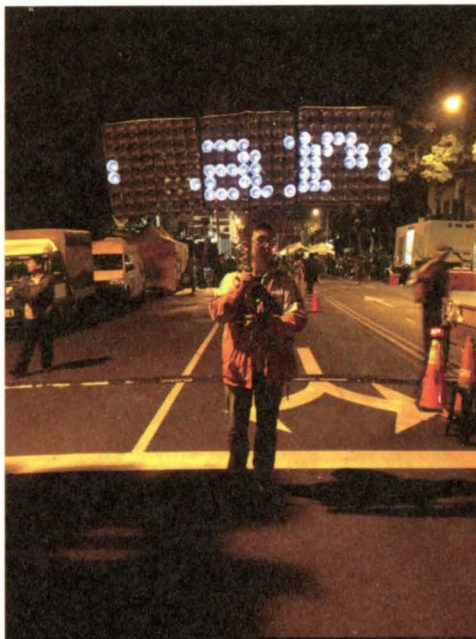
收錄在本書中的照片，是我駐留在台灣有限的時間中所拍攝的紀錄。但是，在台



灣人們的相機、手機、筆電，以及網路上，至今仍然保存著數量遠遠來得龐大的影像吧！重要的是，為了讓這些紀錄成為有生命的記憶，我們必須好好地凝視它。義大利歷史學家卡羅·金茲堡（Carlo Ginzburg）稱呼從這種從細部浮現的歷史為「微觀史」（microhistory），而我認為，攝影就是在微小的事物之中，閱讀無數故事（microstory）的藝術。有一句諺語說，「上帝在細節之中」，我認為，如果我們把「上帝」置換成「革命」或「記憶」，這句話仍然是有道理的。革命作為一種過程，是否能夠長久延續，端看其中是否有記憶存在。

衷心希望對我來說很特別的這本書，也能夠在某種意義下，成為中文讀者心中特別的事物。謹以這樣的願望，表達我內心感謝之意。

二〇一五年
立春之日



佔領國會的背景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一群年輕人入侵了位於台灣首都台北市的立法院議場。立法院相當於日本的國會議事堂，是國家的最高立法機關，從十八日開始，連續五百八十五小時被學生佔領；遍布議場內外的向日葵，成為這場運動的象徵，通稱「太陽花運動」。這場運動的起因，是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經濟協定「服務貿易協議」在立法院的審查遭到單方面強行中止，引發了年輕人的憤怒，於是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持續佔領立法院，同時對政府強烈提出要求。

學生的訴求是：協議不要在密室中進行；要訂定監督條例，且在監督條例法制化以前，不進行服務貿易協議的審查。三月三十日，以台北市為中心，台灣各大城市都舉行了大規模的集會，讓這場學生與其支持民眾的抗議活動達到最高潮。四月六日，立

法院院長王金平表態，願意回應學生的訴求，呼籲學生從議場撤退。學生們接受了王院長的提議，於四月十日離開了立法院議場。

這是個史無前例的事件，但太陽花運動的背景，和「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以及「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有密切的關係。從擴大自由貿易帶來的經濟問題、台灣與中國關係的政治問題、高度資訊化社會中的安全問題，到二〇一一年以降全世界對代議政治的強烈批判，以及各種透過示威與佔領進行的抗議活動，同時代的許多問題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混雜著台灣特殊的因素，以及當代世界共通的因素。本書的目的，並不在分析這些錯綜複雜的現況；但是這些不同種類、不同層次現象的互相糾纏，是當代引人深思的現象。在這裡，讓我們來概略地瞭解一下所謂的「貿易協議」在這些多樣的、同時代問題群的網目之中的定位，以作為一個例子。

中國（與台灣）在二〇一三年六月締結了「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許多人簡稱為「服貿協議」。原本這個協議（在台灣）就引起輿論強烈反對，同年七月便發生了反對「黑箱」的抗議，但是立法院並沒有對這個協議進行正式的審查（稍後我們還會

提到，他們以舉辦公聽會的方式來取代）。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在議會中佔多數席次的國民黨立法委員們，強行中止審查，片面宣布「審查通過、議案送院會存查」。這種仗恃人數優勢強行通過審查的暴行，在日本也經常發生，但是在台北，這樣的行為引起了強烈反彈，學生們立刻在立法院周邊展開示威，批判審查的中止。

當示威還在進行的時候，有一群學生進入立法院，成了佔領的契機。學生們主張馬英九總統以及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必須對審查的強行中止負責，要求他們道歉。總統府方面拒絕這項要求，將侵入國會的學生當作是暴徒，反而加深了學生的反感。三月二十三日夜晚，企圖侵入行政院的學生們遭到警察的強制排除，演變成流血事件，立法院的佔領因而長期化。

這裡首先的問題是，我們要如何理解「協議」、「協定」這些字眼？不用說，台灣和中國的關係特殊，有關經濟方面的協議也是如此。舉例來說，隔著海峽的兩國並不是由政府直接互相交涉的。各個協議是由雙方的代理機構——台灣的「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以及中國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來進行。雙方的名稱都很拗口，但是就由這「基金會」、「協會」等機構接續著「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為進一步簽訂有關貨物與服務貿易的協定，持續進行協商。

另外還有一個必須理解的特殊情况，就是所謂的「兩岸協議」，和一般兩國之間的協議是不同的。台灣稱它與中國的關係是隔著海峽的「兩岸關係」，這種說法，巧妙地表示雙方的關係是地理上的區分——不是兩國，而是兩個「地區」。相對地，中國方面則比照香港與澳門，把它與台灣的關係視為特殊的「國內關係」。目前的階段雖已經有這樣兩種看法，但是考慮到現實上對於台灣「香港化」的憂慮與反感，也有第三種看法，主張台灣與中國是既非國際、也非國內的「特殊關係」、「特殊狀態」。

同時，我們必須瞭解，「協議」在政治上具有什麼樣的特性，才能瞭解學生為什麼會佔領國會，為什麼要對政府提出批判與要求。如果是「條約」，當然必須經過立法院的批准，但「協議」則不需要。如果立法院不主動提出否定、或是條文必須修正的決議，「協議」就自動生效。在這裡特別重要的一點是，佔領立法院的學生們認為「協議自動成立」這個條件本身就有問題，故要求制定條例，讓「協議」也和「條約」有一樣的層次，必須經過立法院批准才能生效。換句話說，他們希望強化立法院的監督，其具體的主張，就是要求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也就是說，學生們的佔領並不是為了否定議會政治，反而是希望賦予立法院正當的權限。「學生佔領議會」聽起來很容易被誤解成無政府主義，但事實上完全不是如此，至少我們可以說，學生對



於兩岸協議所要求的內容，非常的具體，而且以常識就能夠理解。

第二件必須瞭解的事情是，在上述背景下，現行政權急於在最短的時間內締結兩岸協議。對於這個狀況，馬英九總統與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的反目具有相當的重要性。馬英九政權為了改善與中國的關係，想讓協議成立；但是，從國民黨執政以來，王金平院長就對這件事採取批判的態度，因為，就像剛剛所說明的，在立法院中，「協議」成立的條件有其特殊的情況。國民黨的方面企圖縮短審查時程，同時舉辦公聽會，而在野的民進黨則對公聽會的次數與內容大加撻伐。審查與公聽會的進行方式，可說充滿疑慮，三月上旬，為了審查的進行方式，立法院內部就已經激起了強烈對立。

三月十七日，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等聯合委員會的會議上，民進黨方面為了力抗此案，主張召開其他會議，引起了混亂。會議的召開是需要宣布開會的，但因為議場混亂，內政委員會召集人張慶忠無法接近議長席，也就無法宣布開會。會議如果無法召開，就無法審查議案，協議也就沒辦法強行通過。

這時候奇妙的事情發生了。無法接近議長席的委員會召集人，取出自己帶來的麥克風，向著議場全體宣布服貿協議通過審查，送院會存查。在野黨當然強烈批判此一發言，並認為審查並未進行，也因此拒絕送院會存查（原本會議的成立本身就不受到承

認，發言本身並沒有記錄在議事紀錄中）。儘管如此，不論立法或行政都佔多數的執政黨仍強行中止審查，而學生與民眾因此意識到民主主義已陷入危機，就不是沒有道理了。學生們立刻發起示威，也只能說是理所當然的反應。

上述「審查中止」的事件過程看起來也許很瑣碎，但我個人認為，若要思考代表制民主主義的問題，這些正是重點。細部是重要的。

這位召集人拿出來的麥克風，並不是議會準備的，而是他自己帶來的。可想而知，他知道如果議場發生混亂，議長席的麥克風就沒辦法使用，所以才預先準備。這彰顯了讓代表制民主主義成立的空間的具體性：宣布開會的人及其身體的移動、讓這個人可以發聲的環境布局、擴大聲音的媒體器具……，張慶忠以他自己的方式理解了這些空間與身體的條件。他透過擴音器具來有效地應付眼前的例外狀況，也讓人看出這件事本身就經過算計。他以自己的方式調整「法」的空間，並且在那之上宣告審查的中止，這雖然看起來只是個人行為，但由於他是一個民主體制選出來的「代表」，因此他的行為，背叛了他所代表的人民。

本書將要詳細討論的學生佔領事件，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這位召集人行為的一種集體反撲。召集人利用麥克風，明明沒有進行審查，卻宣布已經審查完畢。他以凌駕



法規的方式利用了立法的空間。在這個行為中看到民主主義危機的學生們，也就以逾越法規的方式利用立法的空間，要還給立法院它本來就應該有的權限。立法委員也好，學生也好，身為一個人，同樣都具有他的聲音，而這個聲音以什麼方式、在什麼地方發聲，將會改變「法」的空間樣貌。

第三個重點：這一次的協議——就像它的名稱「服務貿易」——會帶來的不是物品的自由貿易，而是投資與勞動者的自由移動。理所當然地，它引發許多聯想：中國企業大量進入，會不會對台灣中小企業造成壓迫？反過來說，台灣企業移往大陸，會不會讓台灣本身的產業空洞化？學生們也在一開始，就明確地表達了他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這是一個會嚴重影響到他們畢業後就業與生涯的問題。這和他們的未來有直接的關係，然而，卻不是現在才開始的現象。對於同樣以貿易立國的島國日本來說，所謂自由貿易，永遠是風險的別稱。正因為如此，政府有責任，不管花多少時間，都必須對國民與企業提出說明。

這是全球化經濟下、世界共通的問題，但這其中，也存在著兩岸關係的特殊問題。中國對言論、表達、通信、隱私權等等的限制，會不會以自由貿易之名「輸入」台灣？特別是有關新聞、出版、電影等等影像與藝術領域，如果採用了和中國一樣的檢

查與限制標準，對台灣來說，是一種歷史的倒退。關於通信也是如此，在與資訊通信有關的產業或是服務業中，可以預期地，將會發生竊聽與個資洩漏的風險。美國對歐美政治家的行動電話進行竊聽，網路上則對美國政府此舉大加攻擊——處在這樣的世界裡，若有人對於通信感到不安，也只能說是自然反應。服務貿易，隱藏著和物品貿易不同性格的風險，對於言論與表達自由、隱私權保護特別敏感的大學、教育機構、文化產業等等，希望政府採取慎重的態度，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關於這一點，以王金平院長的電話為主，立法委員們受到最高檢察署的竊聽一事，在二〇一三年九月曝光，而馬英九總統以竊聽得到的情報，逼迫王金平院長辭去立法委員職務，更讓其政權進行竊聽的實情攤在陽光之下。然而，此事件並沒有就此結束，王金平院長拒絕辭職，而國民黨企圖剝奪其黨籍，王院長的政治生命陷入危機。

王金平院長從頭到尾，都表達了他對佔領議場學生的理解，其背後就是上述的問題。順帶一提，開除黨籍的訴訟在地方法院持續僵持，而一審的判決，就是在佔領立法院的隔天宣判的。判決結果承認了王院長的黨員資格；倘若結果相反，王院長的影響力將無可避免地降低。換言之，說不定判決確立當天，總統府就會下令強制排除立法院的學生，也就不會有「太陽花運動」這個名稱出現了。

一開始我們就說，佔領立法院事件的背景是一片複雜的「交織糾纏」；翻譯成英語來說，相當於 entanglement 這個字。那指的是，當我們追蹤一個問題，卻發現該問題超越單一層次，與其他許多的問題糾纏在一起，而沒有辦法個別處理的狀態。因此，只要抓住某一個問題點，就會引出所有的問題。不管是被私有的麥克風宣布審查中止的聲音，或是被竊聽的電話的聲音，都絕對不只是瑣碎的問題。之後我們還會提到，這些問題必須一起當作立法空間中聲音與身體性的布局 (configuration) 來處理。一方面，那是個人身體布置的問題，在另一端，卻和以中國為中心的「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以及以美國為中心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緊緊相連。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洞悉自己與這些聲音的關係，聆聽這個被佔領的都市空間中學生與人民所發出的「聲音」。那是以具體的方式，來思考個體與世界的力量如何相互影響。



Democracy at 4 am

Morning without YOU is a dwindled dawn.

This ad has been purchased with donations from 1,621 Taiwanese citizens.

At 4am on March 18th, 2014, 600 students occupied the Legislative Yuan in Taiwan to protest the Service Trade Agreement with China. The Agreement raises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and poses major risks to Taiwan's economy. Over 10,000 students have joined the protests in peaceful air line, galvanised by strong opposition to the government's secret negotiations and handling of the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was rushed through the Legislature without any item-by-item review as originally envisaged in an inter-party agreement. The "anti-Klar's big protests" reject the government's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responsiveness to the people's concerns. The occup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has become a people's movement to wrest power back to the people. Professors, musicians, lawyers, doctors 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have joined the protests in support.

After the President and ruling party failed to respond, the students expanded their protest at 6am on March 20th. The authorities used police to remove the peaceful protesters with batons, riot shields, belts and water cannons, beating them into submission. Police brutality resulted in multiple injuries to the protesters, who only had their bodies to shield themselves. The media, too, were removed from the scene.

One single Agreement has plunged Taiwan's democracy back into the darkest hour of the night. All protesters and supporters of Taiwan's democracy are united in their resolve not to rest and not to give way. We will safeguard the bedrock of Taiwan's democracy - that the government must be transparent and responsive to the people's interests.

Taiwan needs your attention and support. Today, we ask you to join us,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upporters from over 50 cities, in support of basic democratic values.



4am.tw



Supported by 2027 Taiwanese citizens

We invite you to www.4am.tw. See the event firsthand through citizens' eyes. Support us by leaving a message for us with a photo of you and a supporter. 4am may appear to be a dark hour, but we believe that as more people awaken to the truth, the benefits of democracy will not be far away.



史上的革命最大的差異，就在這裡——那就是非暴力。稍後我們還會談到，雖然也有一些其他反抗運動把暴力控制在最小範圍內，但是學生佔據國會長達三週以上，卻沒有出現任何一個犧牲者，在歷史上非常罕見。我認為它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感覺與情感的共有，但如果我們不從歷史上去定位它，就無法理解真正的原因。

不過，尋找歷史的定位，是以後的事吧！就像學生從立法院出來時所發表的宣言：運動尚未結束。事實上，之後的發展，才開始展現運動真正的成果。其中之一，就是在市民的要求下，核四被「封存」，停止建設。

因此，以下章節的首要目的，是記錄這場運動的原創性，同時在其中發掘出過去我們當作「群眾論」來思考的、人類的創造性。

在這一點上，序言裡我們提示的關於太陽花運動的梗概，已描述出群眾運動被歷史化的時候所產生的問題點。為了描述群眾的作為，我們必須掌握這些作為的整體樣貌。當我們試圖在歷史性的脈絡中為群眾運動找尋定位，具體發生的事件就會被抽象化。然而，從群眾的角度來看，沒有任何一個現象應該被捨棄，所有的聲音，所有的對話，所有的肢體語言，所有的物品，都在現象中有它們合適的位置，沒有一件事物是多餘的。實際上，所謂的革命，指的就是這樣的現象。不管是人、物品、語言或

是聲音，所有的細節都具有意義；在革命中，這些意義在同一時間一起改變。

以這個問題點為依據，本書首先將概觀太陽花運動與同時代的共同脈絡，同時透過照片，記錄這中間產生的人、物品與語言的關係的細節。只要運動還在持續，就沒辦法描繪事件的整體；我想做的是，把鏡頭對準一些細部，去捕捉至今尚無輪廓的群眾的身影。這說不定可以成為以影像敘述「微歷史」(micro history)的嘗試。

就像個人有個人的記憶，對人類來說，團體也有它的記憶。人類是社會性的動物，個人的記憶與團體的記憶難以切割分離，從古代神話到現代電影，處理這個關係的作品可說是不勝枚舉。革命的記憶也是如此，參加革命的個人的記憶，和社會性記憶的各種方法相互影響，形成團體的記憶。當社會運動凝聚群眾時，扮演重要角色的，也是這份記憶。

如果我們把二〇一四年立法院的佔領活動放在從前發生過的社會運動系譜中來觀察，首先可以對照的，就是二〇一〇年以後同時發生在世界各地的許多佔領運動。紐約的華爾街¹、馬德里的太陽門廣場²（Puerta del sol）、開羅的解放廣場³（midan at-tahrir）……，「佔領」變成運動者之間的口號，不斷地擴大——這些運動的起因，

主要是對經濟上貧富差距的反動。有的像華爾街，被強制驅離而終止；也有像埃及那樣，最後轉化成推翻政權的政治革命。這些運動也位於過去種種運動的系譜之中。

一九六八年巴黎的五月革命、以及它所引起的世界性反叛，當然也在這一連串的系譜裡。但是，參加太陽花運動的學生們，大多數出生在一九九〇年代。首先進入視野的背景，是一九八〇年代後半的解嚴，以及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的學生運動。因此在這裡，我想要一方面加入自己的經驗，一方面簡單地概觀一九八〇年代以降世界的變動，這個時代特徵的關鍵字之一就是「全球化」。讓我們把目光抽離東亞，把視點移向遠處的巴西，來描繪與群眾論相連的另一份世界地圖⁴。

一九八二年二月，巴西勞工黨正式在巴西登記成為政黨，該黨由勞工運動家以及知識份子仍在處於軍政下的一九八〇年組成，其中心人物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Luiz

1 | 譯註 | 佔領華爾街是由加拿大反消費主義組織「廣告剋星」於2011年9月17日，在紐約華爾街發起，以「佔領」為方法的示威活動。10月1日美國各大城市出現類似的集會運動，10月15日更擴展為串聯全球各大城市。

2 | 譯註 | 太陽門是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的一處廣場，座落於馬德里市中心，也是西班牙公路網的中心點（0公里）。

3 | 譯註 | 開羅的解放廣場又稱塔利爾廣場，最早稱為伊斯梅爾廣場，在1952年埃及7月革命之後，為了紀念埃及的政治制度從君主立憲轉變為共和制，改名為解放廣場。歷年來，解放廣場是埃及抗議活動和遊行示威的主要場所，也是2011年埃及革命的主要場地。

4 | 原註 | 關於二十世紀的群眾及其形象，拙著《群眾論》一書（リプロポート，1990／ちぐま学芸文庫，2002）有詳細的討論。



Inacio Lula da Silva)，就是後來巴西第三十五任總統盧拉。一九八二年七月巴西實施多黨制，勞工黨隨即選出當時擔任聖貝爾那多金屬工會委員長的盧拉擔任黨魁，展開選舉活動。那時我因為正好滯留在聖保羅，於是就到剛誕生的勞工黨的集會與示威現場拍照。

一九八二年對南美來說是特別的一年。那年初發生福克蘭戰爭，受到影響的不只是參戰國阿根廷，整個南美國家的情勢都起了動搖。阿根廷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經濟危機的大火延燒到墨西哥、巴西等南美洲大國；同年十一月，巴西則因為債務問題，要求國際通貨基金給予金融援助。在這樣的狀況下，長期處於軍事政權統治、政治活動與勞工運動都受到嚴格禁止的巴西，開始實施多黨制，這可以說是歷史性的變化。但是，盧拉在聖保羅州長的選舉中落敗，同年的國會選舉，勞工黨的得票率只有百分之三·五，下議院議員只有八人當選。

然而我之所以對巴西勞工黨抱持興趣，並不是因為盧拉，而是因為組黨當時其他參加人物的名字。這些人當時雖然年事已高，卻都是在藝術、文學、歷史等等領域——而不是在政治上——著名的作家。其中的一位，馬力歐·佩德羅薩（Mario Pedrosa）是巴西現代藝術的核心人物，對當代藝術來說是個響噹噹的名字。他為聖

保羅現代美術館，以及里約熱內盧現代美術館的創設盡心盡力，支持聖保羅雙年展，並親自擔任第二屆的策展人。佩德羅薩自己也寫詩，且積極地從事藝術評論，同時把超現實主義引給巴西，一生在藝術與政治兩方面都非常活躍。勞工黨正式登記成為政黨的時候，最早收到黨員證的除了佩德羅薩以外，還有文學家安東尼奧·康蒂鐸（Antonio Candido）、歷史學家塞吉歐·布阿爾奎·德·歐蘭達⁵（Sergio Buarque de Holanda）。或許對於政黨的誕生來說，詩與戲劇、美術與電影的聲音，是不可或缺的吧！

我們無法知道今日已成為大國巴西執政黨的勞工黨，在創黨當時對這些聲音有何種程度的意識，但是在一九九〇年代後半，世界化的社會運動中，這些聲音為巴西政治參與的萌芽灌注了特殊的能量。他們翻譯以安德烈·布勒東⁶為首的超現實主義文本，也與班加曼·佩雷⁷交流來往，同時進行評論與政治活動。這些藝術家與文化人的集合，毫無疑問地，在政黨成立的當時具有龐大的影響力，同時在之後巴西的運動中，成為潛在的記憶。

5 | 原註 | 塞吉歐·布阿爾奎·德·歐蘭達的兒子，歌手西柯·布阿爾奎（Chico Buarque），也對民主化運動有積極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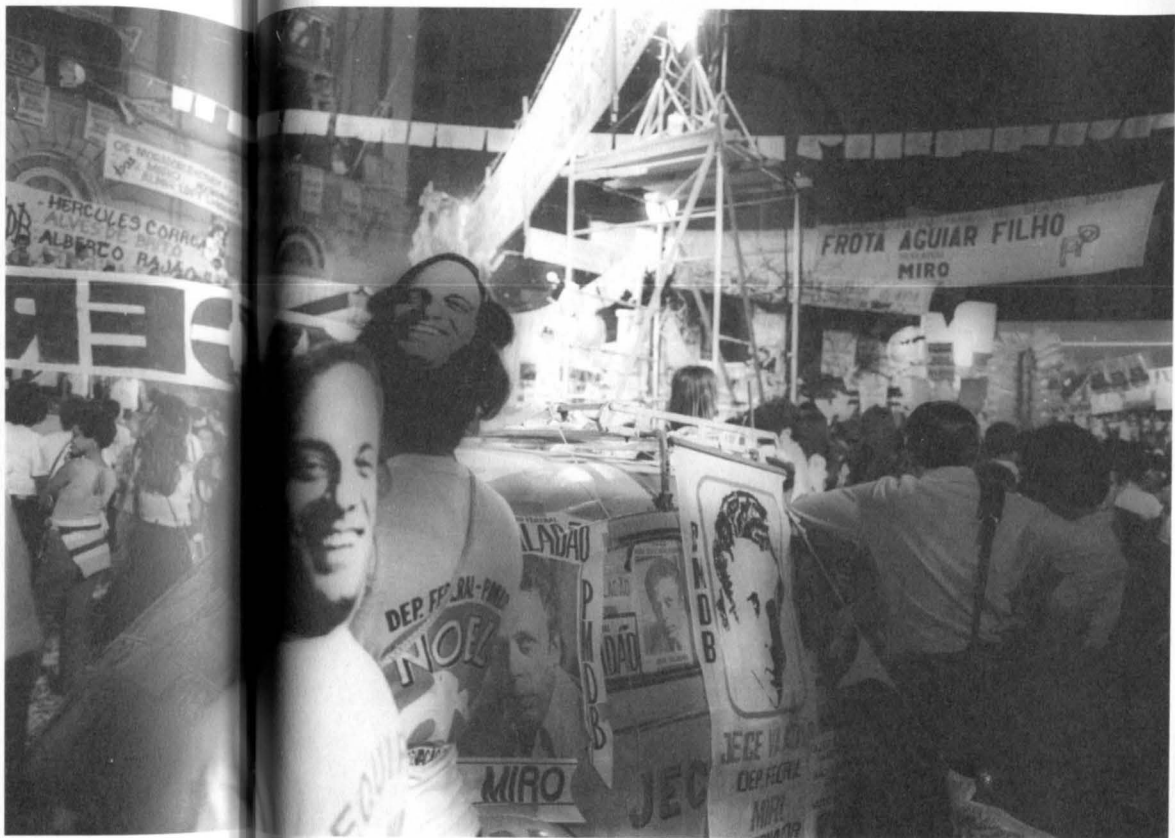
6 | 譯註 | 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 1896-1966），法國作家及詩人，超現實主義的創始人。最著名的作品是一九二四年編寫的《超現實主義宣言》。

7 | 譯註 | 班加曼·佩雷（Benjamin Péret, 1899-1959），法國詩人、達達主義者，也是法國超現實主義的創始人與中心成員之一。



從那時候開始，勞工黨的運動在巴西各地拓展開來，特別是南部的都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舉例來說，標榜全球化替代方案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最早就是在阿列格雷港⁸舉行。這時候的阿列格雷港政府由勞工黨領導，進行新形態地方政府的實驗，積極地支援該論壇⁹。翌年的總統選舉中，盧拉當選，震驚了全世界。整個二十世紀的社會運動，以北半球為中心；但是從二〇一一年佔領華爾街，到二〇一四年的運動趨勢，名實相符地涵蓋了整個地球。可以說就是巴西，創造出這樣的契機。身為巴西現代／當代美術核心人物的作家與評論家們，搭起了橋樑，讓一九二〇年代的現代主義跨越到八〇年代；終於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社會運動中，留下了他們的名字。

足以和這場運動拿來比較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運動。一九八九



8 | 譯註 | 阿列格雷港 (Porto Alegre) 又稱愉港，是巴西南部最大的城市之一，南大河州的首府。

9 | 原註 | 世界社會論壇於2001年1月25日到30日，在巴西的阿列格雷港舉行。論壇標榜「另一種全球化運動」，由許多參加團體組織而成，並且由勞工黨執政的阿列格雷港政府大力支援。這時候阿列格雷港已經在摸索新形態的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統合擁有代表權的機構，以及市民的公開會議。





年發生在東歐的一連串革命當中，以瓦茨拉夫·哈維爾¹⁰為首的作家與藝術家們，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的運動中心，成功地率領了一場非暴力革命。這場革命的主體，是一個稱為「公民論壇」的組織，在革命初期設立了一個名為「戲劇俱樂部」的劇團內部。舞台藝術與美術系的學生在反抗運動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從八八年到八九年組織了許多次的示威，因而知名。他們呼籲全國進行總罷工，把示威推展成全國性的反抗運動，瓦茨拉夫廣場¹¹（Wenceslas square）一時間被廣大的群眾佔領。

八〇年代巴西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這兩個民主化運動，都是發生在獨裁政權底下，但是通常它們不會被拿來相提並論。前者是由幾乎可稱為巴西共產黨的勞工運動——包含馬力歐·佩德羅薩等硬底子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所產生，而後者，則是反抗共產黨一黨支配的運動。不同於波蘭的「團結工聯」以工會為中心，成立在哈維爾與雅恩·帕托什卡¹²「七七憲章」¹³周圍的「公民論壇」，並沒有將工會納入他們的組織。雖然同樣是民主化運動，但意識形態可以說是正好相反的。

儘管如此，我之所以舉這兩個民主化運動為例子，是因為這兩個運動的中心，都可以見到美學語言的生產與發聲。那並不是要求民主化的直接標語，也不是人權憲章的條文；美學的語言出現在這一類語言的生產之前，和日常語言的使用有關。換句話

說，「語言的使用」本身即成為問題的所在。語言的使用，也就是空間的創造。創造詩或戲劇的語言，並且朗讀它們，沒有別的，就是用其聲音創造出空間來。瓦茨拉夫·哈維爾在遭到逮捕囚禁之後，作品的出版與上演都受到禁止，但他仍然持續創作詩與戲劇，就是因為他相信一定會有那樣的空間——在那其中，自己作品中的語言，可以大聲地迴響。

這種空間的聚集，就是都市。集會、說話、唱歌、步行，是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最基本的活動。正因為充滿了群眾的言語，都市才成為都市。對人類來說，都市不只是獲得生活食糧的手段，對於人類的創造性生活來說，都市的價值可以說是無限的，無法用不動產的價值來衡量。自從昂利·勒菲柏爾¹⁴的《對都市的權利》（*Le Droit à la ville*）一書問世以來，這件事在眾多的都市論與文化論中反覆地確認，但它以「法」的形態出現，不過是這十年的事。其中先驅性的例子，要算是巴西

10 | 譯註 | 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 1936-2011），捷克劇作家，捷克斯洛伐克總統（1989-1992），捷克共和國第一任總統（1993-2003）。

11 | 譯註 | 瓦茨拉夫廣場是布拉格的主要廣場之一，布拉格新城的商業與文化中心，許多歷史事件的發生地，也是示威、慶典和其他公共集會的傳統地點。

12 | 譯註 | 雅恩·帕托什卡（Jan Patoška, 1907-1977），捷克哲學家。

13 | 譯註 | 「七七憲章」是捷克斯洛伐克反體制運動的象徵性文件，發表於一九七七年，主要內容是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遵守赫爾辛基協約中的人權條款、公民權和人權尊嚴。

14 | 譯註 | 昂利·勒菲柏爾（Henri Lefebvre, 1901-1991），法國馬克思主義者，哲學家。



憲法（聯邦法）的加入條款保障了居民「對都市的權利」。其內容的要素，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

對都市來說，其使用價值比交換價值優先。

都市的價值之所以可以用這麼明確的語言來表示，是有它的背景的。一九九〇年代的自由主義經濟之下，因為幾無限制的都市更新（再開發），許多居民面臨迫遷的命運，地區共同體也遭到破壞，同時，抵抗這個趨勢的各種實踐也持續進行。都市是屬於整個社會的，不應該屬於資本，巴西憲法裡「對都市的權利」，在世界各地激起了漣漪。有趣的是，受到這個想法的啟發，美國成立了「都市的權利」（Right to the City Alliance）聯盟。在「南方」的公民實踐，影響到了「北方」¹⁵。稍後我們也將提到，這個想法在巴西國內，觸發了深遠、長久、持續的反抗運動，一直到今日仍持續著。民主化與新自由主義以全球的規模同時進行的這個十年，同時也是反抗運動的十年。

全球化也為都市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性格，那就是行動通訊科技。網路與行動電話的普及，讓各個都市及其市民可以直接聯繫，促成即時性的群眾現象。其爆炸性的出現，是二〇〇三年反對伊拉克戰爭的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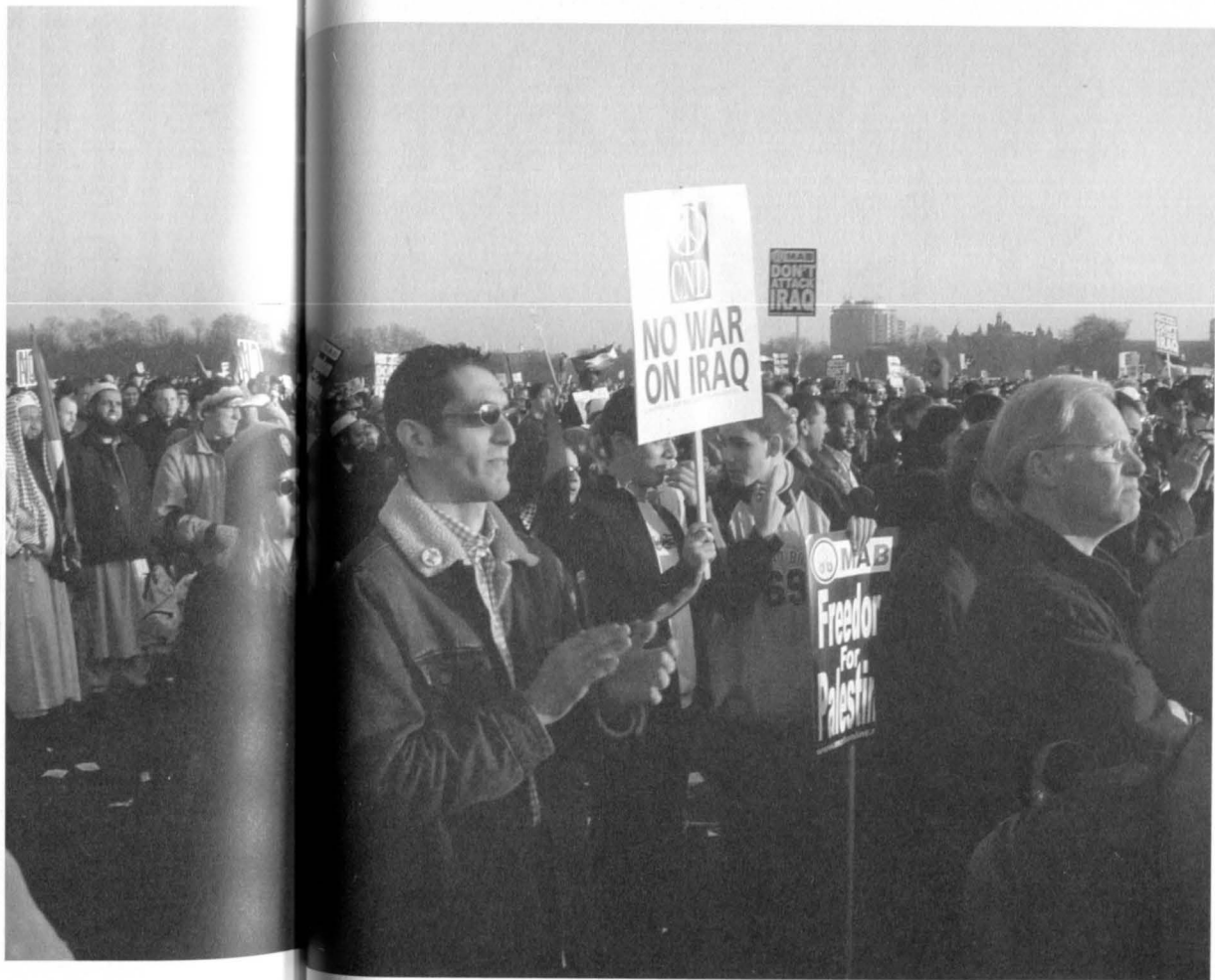


15 | 原註 | 在所得差距加大、貧窮化加劇的狀況之下，有限的預算應該以什麼作為優先？為了讓市民共同思考這個順位，引進了參與型的預算編列。其後2009年，芝加哥市、加州瓦列霍市（Vallejo）都引進了參與型的預算編列；現在這個風潮正由美國擴散到歐洲。

反對運動以連鎖的方式接二連三發生並不罕見。不但一九六八也是如此，甚至早在十九世紀，就已經發生過革命、反革命的連鎖效應。然而二〇〇三年群眾現象的特別之處，並不在於空間上的新奇。那是在二月十五日這個特定的日期，全世界眾多都市共同發生的現象。最大的動員紀錄在羅馬，據說實際上有三百萬人走上街頭。當時我花了一天的時間在羅馬街頭來回漫步，如果以單一日期、單一場所發生的示威來說，我想它確實可以稱為史上最大規模的反戰集會。雖然規模大小各有不同，但是全世界有兩百多個地方參加了同一場反戰活動，聚集了數百萬人。

這場同一時間召開的反戰集會，從後來伊拉克戰爭的突然爆發以及其後的情勢看來，是幾乎完全被遺忘了；但是，對當時參加的市民們來說，這絕對是一個重大的經驗。可以就在我們生活、居住的地方表達對於國際紛爭的意見，而且是以全地球的規

革命的
做法



模同時展開，不管對誰來說，都是超乎尋常的經驗。二十一世紀的都市，成了帶有這種可能性的場所；這個經驗在日後將以完全不同的形態不斷地變奏吧！不論如何，這一天，世界各地眾多都市的居民，感受到「數百萬」這個過去從未有過的規模與數量，說它是人類史層次的經驗，也不為過。

對於如上述的、世界中的反抗運動來說，安東尼奧·內格里（Antonio Negri）與麥可·哈特（Michael Hardt）的著作《帝國》一書在二〇〇〇年的問世成為強大的理論支柱。遍布羅馬街道、手持彩虹旗幟的人們其實各式各樣，除了同樣都是市民以外，並沒有任何共通點；但是，在包容各自差異、為了同一個行動而聚集起來的這個意義下，他們形成了多樣性的群眾。

然而發生在那裡的現象，和過去對於「群眾」的概念，並沒有任何不同。如果我們把「諸眾」（multitude）定義為「彼此具有差異、保有多樣性，為了民主主義的實現而形成的集合體」，用以說明特定的群眾，那是正確的，但這只不過是看到了群眾一小部分的面向而已。群眾是本來就棲息於內在的東西，而且是一種觸覺性的現象；它既是幻覺，同時也是現實。

我們最好不要把群眾當作一種實體，而應把它當作一種過程。在某個地方被稱為群眾的團體並不是以「實體」的方式存在著的。群眾存在於某個時間點，也在另外的時間點消失，就算我們可以把群眾分為好幾個種類，也一定會有從「人」演變為「群眾」的過程。通常我們把群眾視為人類的群集，以它的全體作為意象，但那是個沒有輪廓的全體。正因為全體不存在，才使得群眾成為群眾。

有一個好例子，就是關於示威人數的宣示。每每在示威活動之後，主辦單位和警備單位所發表的人數都會有很大的不同。以三月三十日在台北發生的示威來說，主辦單位說五十萬人，但警察則宣稱只有十一萬人，相差了幾乎五倍。但這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在主辦單位與警備相對立的場合，大致來說，一定是前者宣稱的人數比後者多。前者希望多，後者希望少，如果我們用數量來衡量示威的意義，那麼兩邊的估計可以說都合理。但是，這個現象的本質不在這裡。群眾是無法計數的。

首先，以現實的問題來說，超過數萬人的街頭示威，人數很難掌握。有的人中途參加，有的人走到旁邊去，有的人從來時的道路折返，也有最後才參加的人，參加者的範圍無法界定。本來群眾就和軍隊的行進不同，即使美國也有人試著用監視器來計算人數，卻仍然無法正確估算。然而，真正的理由不在這裡。群眾總是希望可以增大，



不論什麼時候，都追求過剩。

舉例來說，主辦單位會對著群眾發表人數。在這樣的時候宣布人數，是因為主辦單位和群眾都相信人數還會增加。計算的不可能性，正是「群眾」這個概念的核心要素，發表的人數有所差異，正證明了這正是一群「群眾」。「群眾」這種無法確定全體、具有增大過程的特性，和表示全體的「諸眾」是不同的。換句話說，所謂的「諸眾」，就是群眾以某種特異的肢體語言移動。

我們在日常的都市生活中，對於空間有慣常的使用方式，而上述的肢體語言之一，就是一種顛覆這種慣用方式的移動。讓我們看看一個例子：二〇一三年，發生在遠遠相隔的兩個城市中的群眾的反抗運動。一個在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堡，另一個是以聖保羅為首的巴西各都市。二〇一三的土耳其和巴西，乍看之下沒有任何關聯，卻具有重要的共通點。

首先是伊斯坦堡，為了爭取二〇二〇年夏季奧運的主辦權，預定進行大規模的都市更新。發生示威的塔克西姆廣場（Taksim Meydanı）是市內交通的重要據點，也是著名的觀光地，為了疏通這裡的交通，二〇一〇年開始進行隧道工程。照理說，這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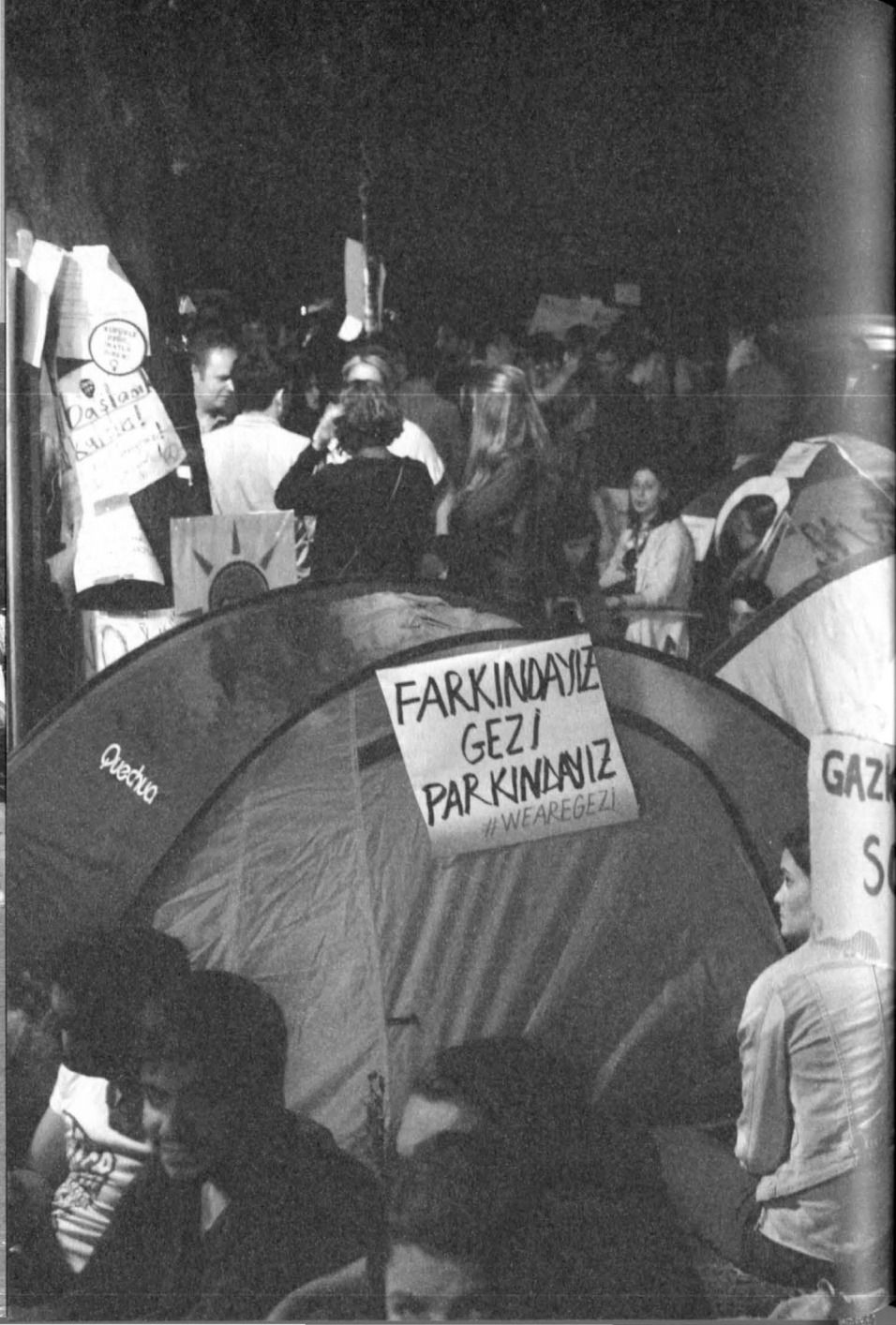
工程應該會受到市民的歡迎，但是當推土機開始破壞鄰接著廣場的蓋齊公園（Taksim Gezi Parkı）時，事態有了劇烈的變化。長久以來，蓋齊公園是市民休憩之地，是他們熟悉親近的場所，在充滿了建築物的伊斯坦堡，這是最後一塊綠地。而且，破壞公園並不是為了整建廣場，而是為了搭建大型購物中心；當地的居民面臨迫遷、綠地將遭到破壞，反抗的聲音於是升高。

二〇一三年春天，四個年輕人在公園搭起了帳篷，露宿公園，以阻止施工單位砍伐公園的樹。贊同他們理念的學生與市民接踵而來，參加抗議活動，卻受到了警察暴力鎮壓。警察的鎮壓引爆了市民的怒火，演變成全國性的、對埃爾多安¹⁶政權的抗議。

五月底公園已經搭起了數百個帳篷，以學生為中心，數千人夜宿公園，以佔領的方式抵抗。六月一日，大約一千名示威民眾聚集在總理官邸，政府出動鎮暴部隊，法院發布命令，暫時停止建設計畫。

一開始埃爾多安總理採取了強硬的姿態，有趣的是，他稱呼參加抗議運動的人為「野蠻人」。這和稱呼佔領立法院的學生為「暴民」的台灣國民黨政權態度相似。抵抗的群眾繼續佔領公園，但是最後被催淚瓦斯與推土機強制排除。我在佔領最高潮的六月初滯留伊斯坦堡，公園裡的情況令我驚訝。他們既不是媒體報導的「過激派」，

16 | 譯註 | 埃爾多安 (Recep Tayyip Erdoğan, 1954-)，土耳其政治家，曾先後擔任土耳其總理（2003-2014）與土耳其總統（2014-）。





也不是「野蠻人」，只是有組織的、普通的學生與市民。

「從阿拉伯之春到土耳其之春」、「從解放廣場到塔克西姆廣場」，這些標語，不只代表了他們共同的情感與行動，還彰顯了其他共通點：以最大限度利用社交媒體傳播資訊，以多方面的連帶關係號召群眾。在短時間內，公園裡就搭設了附有舞台的廣播中心，設置了影像與文字的編輯部；學生經營的工作坊（Workshop）日以繼夜地進行。這時恰好在伊斯坦堡舉辦的紀錄片電影節，也臨時把最後一天的頒獎儀式遷移到公園內的舞台來舉行。這種組織方式與速度感，和立法院的佔領是相通的。

另一方面，在巴西，為了籌備二〇一四年FIFA世界杯足球賽，以及二〇一六年在里約熱內盧的奧運會，同樣進行了大規模的公共工程與都市更新（再開發），居民們發出了批判的聲音。從二〇一二年到二〇一三年，為了抗議公共交通機構提高車資，在多個都市都發起了示威活動。最初觸發這些抗議的，是主張公共交通工具應該免費、稱為「免費運動」（Free Fare Movement）的團體，但由於警察對抗議者行為粗暴，導致了新的抗議示威產生。聖保羅的反抗運動和伊斯坦堡的持續示威一樣，都發生在六月。為了抗議同年一月市長宣布調漲公車、鐵路、地下鐵的車資，在聖保羅人大道（Avenida Paulista）組織了示威遊行，里約熱內盧也有十萬人參加。和伊斯坦堡一樣，

為了抗議警察的鎮壓，並聲援被逮捕的民眾，抗議活動在全國各大都市蔓延開來，包括首都巴西利亞在內，擴大動員到兩百萬人的規模¹⁷。

順帶一提，對於公共交通機構調漲車資的抗議並不是從二〇一二年開始的。最早是東北部的大城薩爾瓦多（Salvador）於二〇〇三年發生了反對漲價的抗議活動，之後各個都市也都在漲價的時候，各自發起抗議示威。在這個意義下，我們必須觀察二〇〇一年巴西憲法加上「對都市的權利」條款後，這十年來的變化。公共交通服務品質下降，都市中心區域的再開發與土地價格的飆漲，與通勤圈的擴大以及交通阻塞的嚴重化相伴發生。

發端於公園保護運動的土耳其反政府示威，以及反對車資上漲的巴西示威活動，不僅出乎意料地同時發生，更讓我們看到奧運是如何地被納入全球經濟之中，並引起在地居民的反感。但是，還有比這個更重要的事情，我想舉出其中和太陽花運動有關的三點。

第一點，這些反抗運動富有實驗精神。以土耳其來說，運動佔據了首都中心的公園，把它當作某種實驗室，把綠地的保護——雖然沒有直接的關係——和對抗強權

17 | 原註 | 關於巴西的「六月抗議」與「免費運動」的經緯，以及社會學家與都市計畫家的論述與考證，在巴西與法國都出版了論文集。*Cidades rebeldes*, Boitempo Editorial, 2013. *Villes Rebelles*, éditions du Sextant, 2014.

治的其他反對勢力聯結起來。巴西的運動則是提出「公共交通免費化」這個實驗性的、獨創的構想，作為「對都市的權利」之主張。我們正應該在這裡，看到政治的激進風格。

第二點，出現在這兩個運動的群眾，都以無法預測的方式移動。巴西的群眾關心的正是每日的移動（交通）問題。說到「為了共通目的而形成」的群眾，那麼，通勤的群眾應該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群眾吧！它雖然和慶典的群眾、示威的群眾不同，但是以「集中在某個時間帶出現」這一點來說，是共通的。假使通勤的群眾轉化為抗議的群眾，那會變成什麼樣子？大概會成為歷史前所未見的群眾吧！通勤可以說是最日常的行動，因而被等閒視之，但事實上，它是「對都市的權利」之根本問題。「免費化」這個單純的構想，把無意識的、日常的移動，化為思想的移動。巴西的群眾以他們的身體體驗到這件事。

第三點是，群眾聚集的場所，發揮了象徵的功能。即使大多數人都知道伊斯坦堡是觀光勝地，但是聽過蓋齊公園名字的外國人一定不多。但是，它在一夜之間成為世界知名的公園。原本只不過是市民公園裡平凡的樹木，因為砍伐的危機而成為受到矚目的、特別的樹木，透過環境保護與公共自然意識的通路，和遠遠相隔的樹林、森林聯

結在一起¹⁸。在運動發生之前，這樣的聯結是無法想像的；就算進行民意調查，也不會浮出台面。換句話說，它證明了一件事：有一些不曾出現在民意調查或統計的民眾，確實存在於某處。這些隱形的民眾創造了象徵性的場所，突然以群眾的姿態現身。

以上三點，都顯示了政治場所的形成過程。實驗性、不可預期性、象徵性，是抗議群眾固有的特質，獨立於議題之外。然而，想要把握這樣的特質，事實上非常困難。

18 | 原註 | 某一場所的自然，不只對當地的居民，對其他的地區來說也是必要的生命資本——這個觀點越來越重要。某一個潮間帶透過候鳥為媒介，和遠方的潮間帶聯繫在一起，形成「生命區域」；因此個別潮間帶的保護，將會影響到全體。也有聯結多個公園，將其視為「綠帶」(Green belt)的看法。關於這種區域的構想，慕雷·布可欽的思想足以作為參考。*Remaking Society: Pathways to a Green Future*, Murray Bookchin, South End Pr., 1990.

我們曾提到，在群眾發起行動的時候，所有的細部都同樣重要。這不只對群眾成立，對於和群眾對峙的權力來說，也是如此。首先讓我們注意語言的使用，再轉而思考全體。如前所述，當伊斯坦堡的蓋齊公園被佔領、聲援的示威活動在市區內蔓延的時候，總理當場稱呼他們為「野蠻人」，這和稱呼太陽花運動的學生為「暴民」是一樣的。二〇〇五年法國大城市的郊外，年輕人們發起抗爭活動的時候，薩科齊（Nicolas Sarkozy）總統說他們是「垃圾」，也是一樣的。強權政治在處理反抗或抗爭的時候，使用這樣的名稱並不稀奇。然而把它們單純當成「暴言」而不多加注意，對兩方來說都是損失，因為即使在這樣的細節裡，說不定也包含著某種真實。

這些稱呼隱藏著某種暗默的瞭解。野蠻人意味著言語不通、無法對話的對象。

Barbaroi（野蠻人）、Subaltern（賤民）、暴民……，這些名稱雖然不同，但有同樣的意味：他們聽不懂人的語言，說也沒用。這種稱呼和鎮壓，是強權發動的一體兩面，實際上，不管是伊斯坦堡、聖保羅或是台北，流血事件就發生在那樣的瞬間。這微不足道的一句話，是危險的一句話，但也就在這個時候，民眾發出的聲音是有意義的。發聲代表民眾有他們的語言。

哲學家賈克·洪席耶¹⁹注意到，民眾有他們的語言；他並且主張，這正是政治的基礎所在。通常所謂政治，指的是國家做出決定的過程。立法院的學生們對於這個政治過程變成「黑箱」，表達了憤怒；但洪席耶所說的「政治」，是在過程之前的問題。

毋寧說，透過語言表達憤怒，才產生了「政治」。洪席耶在他的重要著作《歧義》²⁰（譯按：意見分歧、意見不合）一書中指出，一般意義下的政治，指的是參加並認同團體、權力的組織化、地位與職業的分配等整體過程。這個過程首先創造出「身體的秩序」，而我們的肢體語言、說話方式、地位、角色，就遵循著這個秩序被分配。因此，雖然人類使用著視覺、聽覺等感官，但是身體秩序化的基礎並不在感覺的層次，而是在人類團體之中，以某種程度共有的感性的階段；洪席耶稱它為「感性的布置」（configuration）。



19 | 譯註 | 賈克·洪席耶 (Jacques Rancière, 1940-)，法國哲學家，出生於阿爾及爾，巴黎第八大學哲學榮譽教授。

20 | 譯註 | 賈克·洪席耶《歧義》(La mésentente)，中文版由劉紀蕙等譯，麥田出版，2011年。

讓我們舉出一個容易理解的例子：一個記載在《羅馬建國史》中的平民反叛。對貴族不滿的平民佔據了山丘，元老院命令一個貴族前去說服他們。只不過這裡所說的「說服」和今天我們所指的意思並不相同。因為貴族認為，平民沒有名字，因而沒有得以和貴族對話的語言，所以議論無法成立。他認為平民的語言是「空洞的東西，立刻就會消失的聲音、鳥獸的一種嘶吼、欲求的表示，而不是知性的表達」，和平民說話也沒有任何意義。

從貴族的感性中所看到的平民，幾乎和鳥是一樣的地位。針對這個貴族的成見，平民模仿貴族的方式，選出一位平民、為他取了名字，作為平民代表。這位平民代表以端莊的儀態傾聽貴族的言語，表現出合乎禮儀的姿態動作，並且要求貴族與平民締結協議，讓貴族心底受到驚嚇。

洪席耶的著作書名《歧義》，指的就是這個故事所貼切地表達的狀況，這種看似瞭解，其實卻完全不瞭解的情形，並不是因為貴族與平民之間語言不能相通，而是貴族的感性認為，言語就算從平民口中發出，也不會有任意義；換句話說，在這個狀況下，語言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平民表現出他們對貴族語言的理解能力，便顛覆了貴族的成見。透過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到語言本身內在的二重性，也就是「明明瞭解，卻

又不瞭解」的矛盾。洪席耶所思考的另一種「政治」，指的就是這個瞬間——平等的真正實現，暴露了語言的矛盾與二重性。

洪席耶的想法——在語言的次元找尋政治的起源——雖然和日常意義下的政治屬於不同的次元，卻意外地具有它現實性的一面。當權力面對抗議的群眾，輕蔑地稱呼他們為「野蠻人」、「暴民」的時候，我深切地感覺到這一點。

——這些傢伙是野蠻人、是暴徒，他們的言語沒有意義。所以我們不需要和他們談論，也沒有交涉的餘地；我們該做的，就是鎮壓。

這個狀況如實地顯示了一件事：語言原本應該平等地分配給我們每個人，但在現實中，卻完全是不平等的。只有把視點放在這個語言的平等性，我們才能瞭解佔領議會事件的核心吧！議會——Parliament——就如同它字面的意思，應該是為了語言而設立的場所。

說到這樣的「議會」，讓我想起一九九三年誕生在法國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國際作家議會」²¹。一般這樣的集會，通常稱為作家會議；這一次的集會卻稱為 Parliament——也就是「議會」，從此成為它的特徵。它是以雅克·德希達²²、

21 | 原註 | 會議的景象，收錄在攝影集《明日、広場で》中。港千尋著，新潮社，1995年。

22 | 譯註 | 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當代法國解構主義大師，當代最重要哲學家之一。

皮耶·布迪厄²³、詩人阿多尼斯²⁴、布雷騰·布雷騰巴赫²⁵等人為中心所成立的組織，旨在保護作家的生命（當時在阿爾及利亞正發生著連續暗殺作家與記者的事件），並反抗作品檢查制度。擔任「議長」的，是薩爾曼·魯西迪²⁶（Salman Rushdie）。當時受到暗殺威脅的魯西迪，過著隱遁的生活；他在斯特拉斯堡發表談話，明白地指出「議會」的意義。它既不是像「歐洲議會」那樣的代表制，也不分階層；就像「Parliament」原本的字義，它是「說話的場所」。這個時代到處蔓延著對表達的壓抑與暴力，以致於作家不得不親自創造「說話的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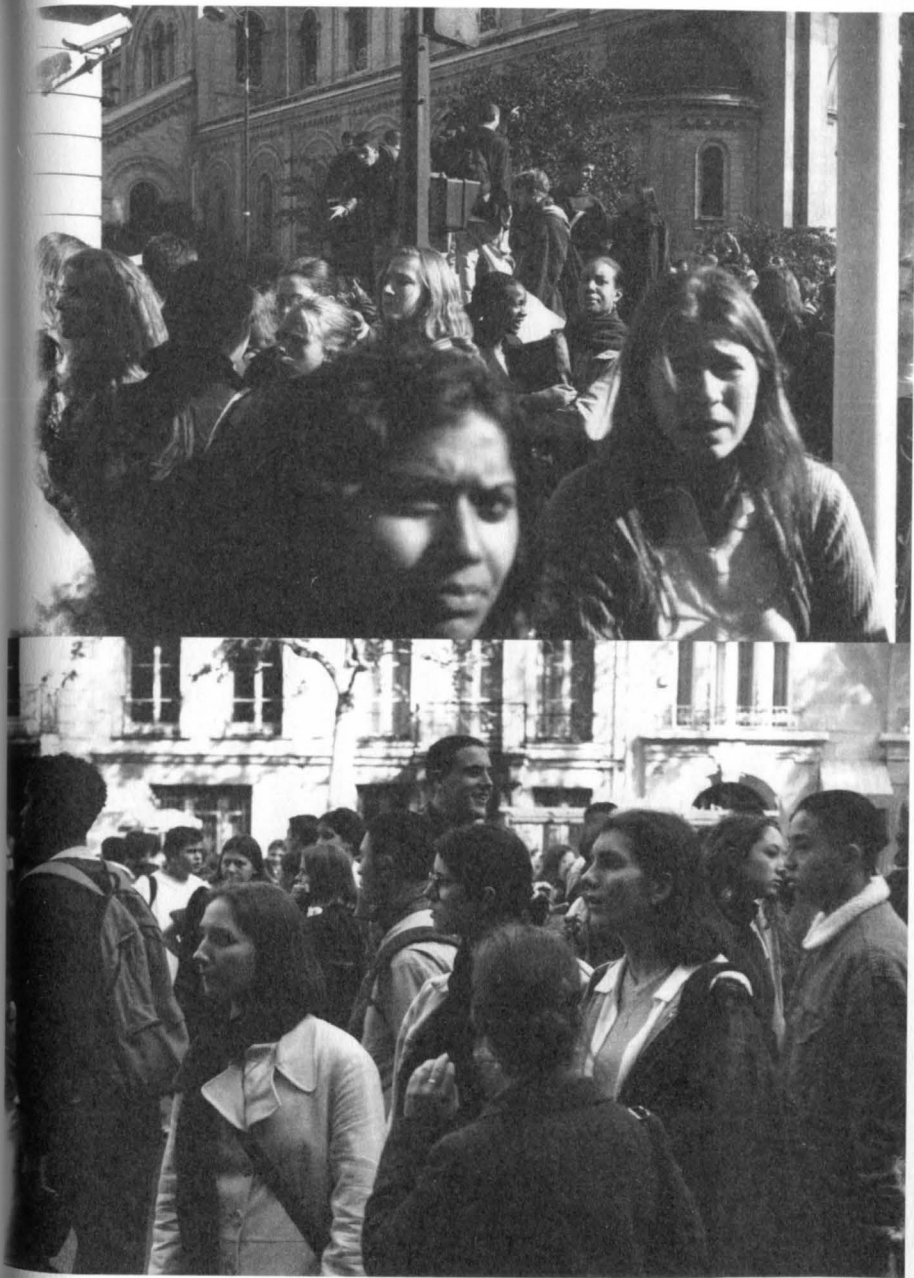
立法的議會，是為了那些被認可具有發言權的人所提供的場所。民眾只能在外面，在街上說話。然而在議會內部，語言失去了機能；外部的言語，則不被承認。我們不妨說，當議會（立法院）被佔領，當那些沒有被分配到語言權利的人開始說話，議會本來的意義才浮現出來。不論如何，按照洪席耶的說法，透過把歧義（意見不合）的狀況揭露在陽光之下，議會才開始成為政治的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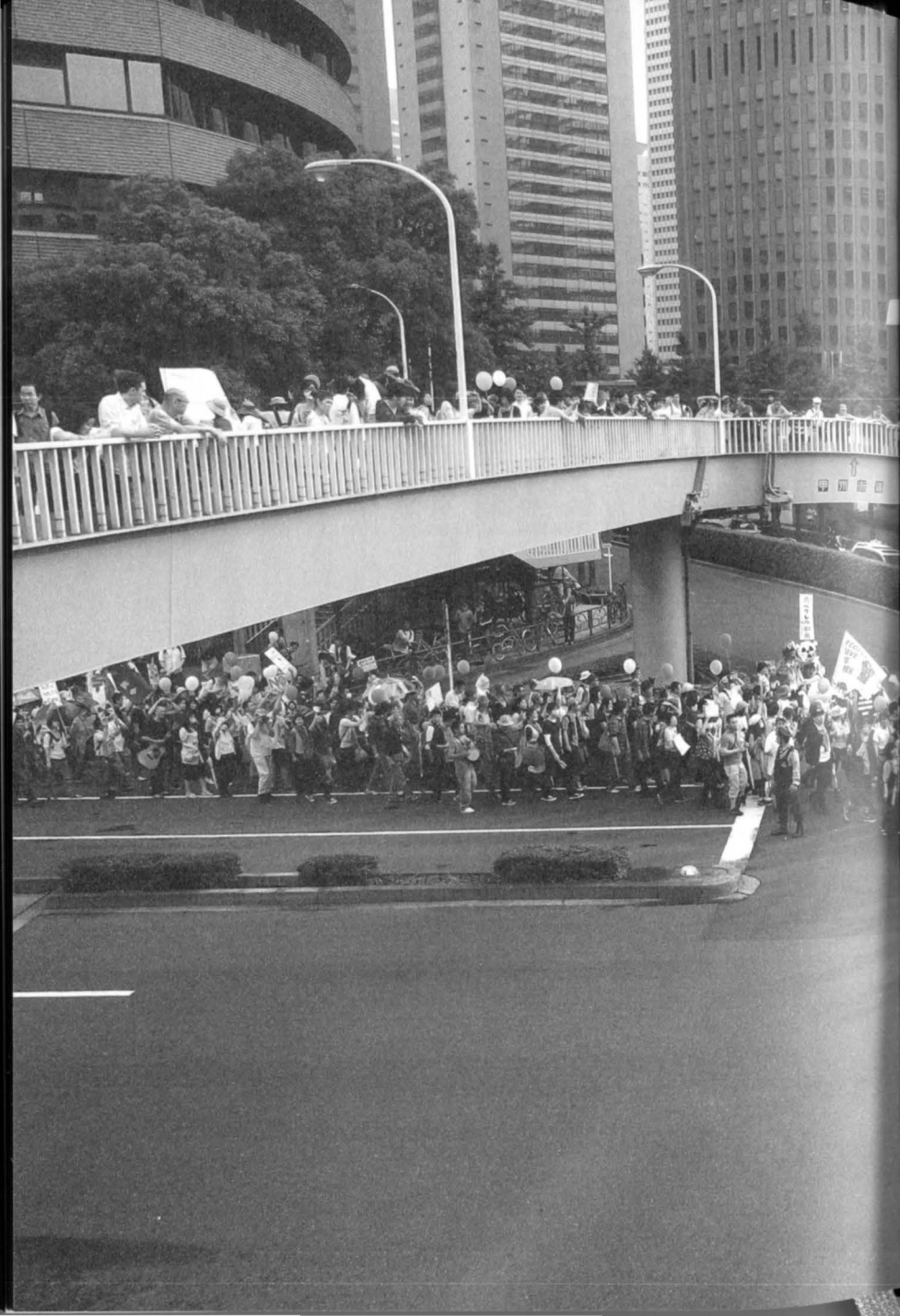
23 | 譯註 | 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法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哲學家。

24 | 譯註 | 阿多尼斯（Adonis, 1930-），敘利亞詩人、思想家、作家、畫家。

25 | 譯註 | 布雷騰·布雷騰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 1939-），南非作家、畫家。

26 | 譯註 | 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 1947-），出生於印度的英國作家，現居美國紐約。1989年他出版《魔鬼詩篇》，內容涉及指責伊斯蘭教，因而受到伊朗領袖霍梅尼下達追殺令。





重要的是，平等不是目標，而是一種以人類作為出發點的觀點。如果我們不把平等當作哲學的概念，而把它看作是具體空間內身體配置的問題，那麼就必須為弱者設想。雖然語言的平等是必要條件，但是要讓它充分發揮機能，我們不得不竭盡智慧。太陽花運動就是一個好例子。在立法院裡外，為了身體與健康的考量，運用了許多的精力。

舉例來說，雖然立法院周邊的道路連日連夜被抗議的群眾佔領，但卻讓開了一條緊急通路。一方面那是為了讓坐輪椅的人也可以參加活動，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讓緊急病患可以盡快被運送到大馬路。換句話說，那是為弱者的設想，同時也是讓弱者得以參加的智慧。實際上，不但議場內部有坐著輪椅的人參加，也有學生因為身體不適，用擔架經由緊急通路被送出去。不管是哪個情況，如果沒有事先準備好的通路，就會非常困難。

一般來說，當運動擴大，這樣的設想自然會發生，但是以台灣的情況來說，這樣的設想是在實際的運動中培養出來的。當然，隨著我們對「設想」的認知的不同，實際的作為也會有所不同。稍後我們還會提到，「設想」就像英語中的「care」這個字，具有好幾個不同的意義。

讓我們舉一個例子：台北近郊的樂生療養院——通稱「樂生院」的保護運動。它是位於新北市新莊區，為了治療漢生病所設置的療養所。樂生院成立於一九二九年，當時台灣正在日本政府的殖民統治之下，設立時的名稱是「台灣總督府癩病療養樂生院」，和當時其他地區的設施一樣，都是為了強制隔離並治療漢生病患者所設置的設施；患者在嚴格的院內生活中，度過了大半的人生。

在殖民統治結束之後，大多數痊癒的漢病患者，在療養院之外已無歸所，只能以療養院作為他們最後的家，繼續生活。但是到了二〇〇〇年代，台北捷運的建設工程開始破壞樂生院，並且要院民搬離。不顧多數的院民已屆高齡且希望在住慣了的地方終老，政府開始強迫搬遷，並拆除樂生院內的建築物。為了抵抗這樣的暴行，院民和聲援的學生與市民，於二〇〇七年正式展開樂生院的保護與保留運動²⁷。他們在療養院的內部設立運動本部，和全世界其他舊漢生病設施所展開的相同運動結盟，第一次讓世人瞭解樂生院的歷史與現狀。

二〇〇九年，我和藝術家岡部昌生，以療養院的人們為對象舉辦工作坊，首次造訪樂生院。雖然捷運機廠的工程已經開始，破壞也逐漸擴大，但還是有不少住屋留了下來，住著充滿活力的院民們。在台北市的後院——已過度密集開發的新北市中，樂生

27 | 原註 | 樂生院設立於日本統治時代，是台灣最早的公立漢生病療養所。反對破壞與保護運動持續進行的結果，政府的文化部終於做出回應，開始了修復的工程。並參考日本多摩全生園的做法，計畫設置「漢生病綜合設施」，合併設立醫療資料館以及人權紀念公園等等。

院就像它的名字，是一個圍繞著綠意與花朵的、美麗的地方。諷刺的是，正是從戰前延續到戰後的嚴格管理，才讓過去的環境得以保留。

我們在工作坊裡，使用岡部昌生的拓印手法，讓這些在樂生院度過大半生的院民們，把他們希望留下來的痕跡，拓印在紙上。從準備的階段開始，就有許多學生以義工的身分參加，要不是他們，工作坊也無法舉辦。這些過去罹患漢生病的院民們，許多人身體都有所殘缺，特別是失去手指與腳趾的人最為明顯。他們要製作拓印的時候，必須有人和他們一起握著鉛筆或蠟筆。這個最重要的輔助工作，學生們做得非常稱職。經由這個工作坊的實施與展覽，我體悟到運動的目的並不在於救濟弱者，而在於透過為弱者設想的經驗，逐漸改變社會。

像這樣的藝術參與運動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藝術是一種嘗試，透過感性，去改變日常生活中物與物、物與人被賦予的關係，以及涵蓋著這一切的環境。以樂生院的拓印為例，即將被破壞的建築「物」，透過一張紙、一枝鉛筆，轉化成記憶的場所。這樣的轉換透過人類的身體進行，這樣的行為，成了重新調整身體的不平等的契機。洪席耶所指出的，作為政治根源的感性的配置，應該在這個層次上思考。



包括樂生院的保護聲援運動，台灣有著各式各樣的學生運動的系譜（請參考²³⁴—²³⁵頁）。一九九〇年代以降，以野百合運動為首，學生運動發生在各個世代；換個方式說，社會運動的經驗超越了世代，以某種方式串聯在一起。雖然那可能不是有意識的記憶，但是這些以感性才能夠理解的、間隔出現的事件，對太陽花運動來說，應該是具有正面的作用吧！這些運動分別反映了各個時代的流行：歌曲、音樂、時尚、戲劇、文學、電影、電視節目等等，同一世代在感性上共有的事物，和運動的記憶結合在一起。群眾的記憶，並不是史書記載的延續，如果沒有感性的共通體驗，記憶是不會留下來的。抗議歌曲也是產生團體記憶的重要要素。

三月二十七日的午後，議場內突然有人開始分發小紙片。紙上小小的文字寫著〈島嶼天光〉，底下一排排羅列的文字，似乎是歌詞。所有的人集中在議場中央的空間，確認都拿到了紙張後，擴音器播放音樂，大家開始唱歌。這是練習，大概反覆練習了兩次以後，搖滾樂團「滅火器」的主唱楊大正出現在議場，所有的人一起歌唱。錄影機已經準備好，立刻就正式錄影。這就是後來傳遍全國的抗議歌曲〈島嶼天光〉，包括影像的第一次發表。

〈島嶼天光〉不用說，意味著台灣的破曉。至於「破曉」的意義，至少在這個場合，



是不需要任何說明的吧！它讓人想起三月二十四日凌晨四點，從立法院進入行政院的一群學生，引來鎮暴警察的暴力鎮壓，導致許多人受傷的流血事件。有人在這些於現場遭強制驅離的學生的照片上，打上了「凌晨四點的民主」一行字幕，經由網路，將這個畫面傳送到全世界。也就是說，楊大正和他的夥伴們，在短短兩天內寫作了這首歌曲，把它帶到議場來。

這首歌的歌詞，有一個令人驚艷的開頭。主人翁首先因為不能回家，向母親道歉；接著因為不能一起去看電影，向愛人道歉。但是他希望他們不要為他擔心，因為現在，自己有不得不在這裡的理由。不用說，那表示現在他不能離開議場。就在這個議場，在二十七日的午後，我從學生們還有點生疏的歌唱中，感覺到這個歌詞的開頭，精確地捕捉到運動的本質。「我」並不是在向母親或愛人辯解，而是在為他們設想。這一份「設想」，不就是議場中心、運動全體的中心，那一份「心」的作用嗎？

就像先前所說，這一份「設想」，也正是對弱者的掛慮，相當於英文的「care」這個字。設想、擔心、關心、照料、看顧、保護——這個字的意義相當廣闊，要在中文與日文裡找到涵蓋這所有意義的單一詞彙，非常困難。這些涵義有一個共通點，首先，就是假定他者的存在；同時也假定，對於這個他者的需要，要做出具體的回應。



以這一點來說，「care」和人類與生俱來的溫柔與反應——比方「母性」——層次有些許不同。注意、並理解他者的需求，同時思考、尋找如何滿足這份需求的方法，這就是「care」；在這個意義下，它的本質是具體的行動。

在倫理的層次思考「care」，首先，是透過一九八〇年代卡羅爾·吉利根²⁸的女性主義思想所發展起來；一九九〇年代鍾·特倫多²⁹從「care」的概念出發，對於現實的政治與經濟狀況採取批判的立場，以此作為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具體抵抗。特倫多清楚地認識到，「care」是民主主義的根本；她表示，所謂「care」的民主主義，就是「市民要求不斷的對民主主義的照料（care）」；市民「不但相互之間對彼此負有責任，同時對於民主主義的制度與其實踐，也負有責任」³⁰。一個市民對政治漠不關心（不care）的社會，不會產生為他者設想的人際關係。

包括議場的內外，這整個運動充滿了這個意義下的「care」；不是理論，而是具體的行動。理解對方的需要，針對這一份需要思考可行的辦法，然後付諸行動。太陽花運動在保護（care）民主主義的同時，同時也為他者設想，兩者不可分離。這一切看起來好像理所當然，但若是突然得在不適合生活的環境下生活時，會發生什麼事？答案正是，無論任何人，都必須「care」其他人的狀況。每個人都動員自己擅長的事情、

精通的知識、以及特殊的技能，只要是做得到的事，就動手去做。這種人類的「多工（多重任務處理）」（multitasking）現象，就誕生在「佔領」這種特殊的狀況之中³¹。

也因此，「care」和一般所說「支援」有些許不同。支援也是理解他者的需要，起而行動，但通常那是由支援的人向接受支援的人單方面進行。當然，太陽花運動產生了數十萬、數百萬的支援者，但是只用「支援」這句話無法描述發生的現象。無數的「care」像看不見的網，發生在群眾內部，賦予運動生命。或許我們應該說，這才是支援的本質。

正式錄影的時候，太陽花運動領袖林飛帆把他一直穿著的綠色外套，和滅火器的楊大正交換，全員一起唱歌。雖然歌詞很簡單（請參考194—196頁），裡面的想法可不簡單。短短的句子裡，表現了我們面對的時代與狀況。這是首好歌。太陽花運動所實現的最美好的部分，恐怕就是灌注在這裡面的「care」了；即使對著遠在他方的人，也以同樣的方式歌唱。

28 | 譯註 | 卡羅爾·吉利根（Carol Gilligan, 1936-），美國女權主義者，倫理學家與心理學家。

29 | 譯註 | 鍾·特倫多（Joan C. Tronto），美國政治科學家，明尼蘇達大學教授。

30 | 原註 | 鍾·特倫多在她最新的一本書中，從正面處理民主主義；她寫著，所謂民主主義之下的市民，必須共同來照料（caring with）市民與民主主義。Caring Democracy: Markets, Equality, and Justice. Joan C. Tronto,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3.

31 | 原註 | 稍後我們會提到，《報民》的製作者之一龔卓軍，對於運動所採用的、積極的「多工」，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那是前所未有的概念。

太陽花運動之所以實現的非暴力的根本原因，或許就在這裡了。只要觀察二〇一一年以後世界各大都市的佔領運動就不難明白，運動的規模越大，要貫徹絕對的非暴力就越困難。像紐約或伊斯坦堡那樣的強制排除，反而是正常現象，或者，像烏克蘭的歐洲廣場（Euromaidan）那樣出現大量傷亡的案例，也絕非例外。以台北來說，立刻出動鎮暴警察或是軍隊強制排除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但是運動者和在野黨保持良好關係，一方面看清楚現實政治的推移，一方面絕對避開任何挑釁的行為，一直到最後都貫徹著非暴力的原則。這不但了不起，簡直可以說是奇蹟。只不過為了堅持這個原則，需要耗費巨大的能量，不要說是台灣了，以香港為首、來自世界各地的聲援，也都是不可或缺的。

非暴力不會只靠著主張與提倡就實現，非暴力與暴力的關係，實際上是不對稱的。當抗議行動擴大的時候，以暴力的方式解決其實簡單得多，而情勢也很容易往那個方向演變。情勢越是緊張，趨向暴力反而越是「自然」，在這層意義下，非暴力想要抵抗這個自然的趨勢，便需要巨大的能量。這個能量來自現場為他者設想的無數行動。佔領期間，議場的議長席上一直插著一朵充滿活力的向日葵，可以看作是一種象徵。

這朵花生成為運動象徵的經過，有好幾種不同的說法；但共通的部分是，許多人經由

網路看到議場內部的情況，看到那兒插著的向日葵，開始認為它是一種象徵。最早是花店送來的花，後來南部的花農也接二連三地送花來聲援。與其說這個象徵是學生自己選擇的，還不如說是來自民眾的贈與。年輕人們下決心把自己關在立法院這個大黑箱裡，這些送給他們的花，同時也等於是放在傷痕累累的民主主義枕邊的花。

同時，在議長席的太陽花前面，樹立著一張牌子，寫著大大的「民主」兩個字。民眾取代了議長，佔據了他的席位；要表達異議，再也沒有比這個更明快的方式了吧！緊鄰著議長席的旁邊，就是醫療站。為了照料急病患者、或是身體不舒服的人，二十四小時都有醫師與護理師待命；他們的身影，彷彿是在為民主主義提供醫療。太陽花運動明確地展現，因為代表制，民主主義正瀕臨危機。議長席上寫著「民主」的名牌，就是這個運動讓民主主義緊急住院的證明吧！

這正是「Demonstration」（示威運動）的本義吧！「Demonstration」意味著在公共的場所進行論證，而不只是單純的要求。太陽花運動以令人驚訝的方法展開這樣的論證。以一句話來說，就是轉換的方法。組織、人、服務、物品、資訊、知識、技術、語言……透過轉換這些要素的關係，去論證「黑箱」的內容——也就是代表制民主主義——正陷入機能不全的狀況。舉例來說，面對議長席的左側，張貼著一張巨大的名單，上面印著所有立法委員的大頭照（請參考¹²⁰—¹²¹頁）。樣子看起來就像選舉的公告，立法委員的名單依照所屬政黨排序，底下留有空欄。凡是聲援太陽花運動的立法委員，就會在空欄內填入他或她的名字，透過網路的轉播，大家都可以看到哪些委員表示支持。結果除了一個人以外，其他的欄位都空著。這是一種很巧妙的轉換，把政治

的表象倒轉過來使用。

議場內用來阻擋警察的屏障也是如此。雖然只是把議員席的椅子以及紙箱高高地堆砌起來、用繩子固定而已，但是透過轉換現場日常物品的關係，並且重新組合，卻產生了別的東西。不管在議場內部，或是場外的街道上，都可以看到無數的這樣例子。令人不禁覺得，拼裝修繕（bricolage）的高手都在這裡集合了。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把利用現地「材料」組合製作物品的方「法」[bricolage]，和事先製作設計圖或計畫來工作的「engineering」（工程），視為對比的觀念，並且認為人類創造神話的做法，是一種「bricolage」。佔領的現場正是如此，當下現場的所有東西，特別是紙箱，被轉換了用途。不只是物品，語言也是如此。對於機智的作用來說，幽默感遠比「engineering」來得重要。

透過佔領，議會被轉換成「物品的議會」。被送進議會的物品，代表它們自身發言。寶特瓶裝的水、向日葵的花、維他命劑、網路線、緊急裝設的空調、睡袋、替換的衣服、相機……所有的東西都訴說著自己的構成，以及它們所構成的世界。這些物品的生產與供給管道、基礎的代謝以及必要的能源消費、現場生產的資訊與其流通……，被佔領的議會呈現出一種實驗室的狀態，在其中，我們重新思考人、物品、以及資訊



的關係。這個關係將會因為「服務貿易協議」而受到什麼樣的影響，也是物品議會的議程。不管是政治上或經濟上，微觀 (micro) 和巨觀 (macro) 在這個議會裡的界線都是曖昧的。巨觀侵入微觀之中，微觀也滲透入巨觀，兩者互相測定。

就這一點來說，經常保持議會與街道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一說到「佔領」，很容易就給人困守圍城的印象，但事實不是如此。人員、資訊、物資、服務的流通，透過支援協力進行調整；日常與非日常相互交雜，形成時刻變化的暫時共同體。進食、睡眠、閱讀、撰寫電子郵件、剪輯影像、記錄筆記……，這些總是被斷片化的日常行動，這時候有了不一樣的感覺。那或許是因為它們各自在經過轉換的現實之中，尋找自己的視點吧！Demonstration 並不是一種跟從的行為，而是透過賦予自己嶄新的視點，來面對現實的行為。團體感性的配置，就從這裡開始改變。

這種轉換的模型，恐怕要在藝術、而不是數學中尋找吧！布拉克 (Georges Braque) 和畢卡索 (Pablo Picasso) 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在繪畫的形式上引發了一場小型的革命。他們把物品原原本本，直接帶到畫布上來。剪報、鈕扣、傢俱的一角，都成為畫作的一部分，畫布裡面——不再像以前那樣——不再是均一的空間。透過物品的引進，畫面自己也被還原為物品。一面觀賞繪畫，一面開始閱讀畫面

上剪報文字的觀眾，在這裡發現了意象 (image) 的不同體制。畫布成為「物品的議會」。

從一九一〇年代到二〇年代，立體主義、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構成主義 (constructivism) 等等相繼出現在歐洲興起的運動之中，「拼貼」(collage) 的發展，當然不是只有造型上的理由。都市空間的變形、被新技術改變的人類知覺、潛意識世界的發現……等，外在世界與內在世界發生了一連串的龜裂；物品對於這樣的龜裂起了強烈的反應，「拼貼」的發展同時也是這個反應的結果。漢娜·赫希³²與約翰·哈特菲爾德³³等人使用照片作為政治上的視覺語言，馬克斯·恩斯特³⁴使用通俗書的插畫，發明了影響潛意識的視覺語言，也都是運用拼貼的手法。

如果我們把一百年後、在台北的街道上展開的這場運動，看作是一方畫布，那麼作畫的材料，也可以說就是這一百年之間的蓄積吧！我們看到畢卡索與恩斯特用過的繪畫、報紙、照片，以及數位攝影、錄畫影像、文字文本、光、聲音、身體等等，在這一整個世紀歷經藝術試驗的所有材料與方法，都投入其中。那是物質與資訊的拼貼 (collage)，使用剪刀、膠水、

32 | 譯註 | 漢娜·赫希 (Hannah Höch, 1889-1978)，活躍在柏林的德國達達主義藝術家。

33 | 譯註 | 約翰·哈特菲爾德 (John Heartfield, 1891-1968)，本名是 Helmut Herzfeld，德國達達主義藝術家、攝影家，運用其作品作為反對納粹與法西斯主義的訴求。

34 | 譯註 | 馬克斯·恩斯特 (Max Ernst, 1891-1976)，出生於德國、後歸化法國的雕塑家、畫家，風格歷經達達主義而轉向超現實主義，是超現實主義代表性畫家之一。

手機的拼裝 (Bricolage)。

在這難以計量的創造性氛圍下，誕生了名為《報民》的媒體。那是在運動擴大到全國規模、三月三十日的大型示威前夕所發行的一份報紙。它運用簡單的圖表，把服務貿易協議的內容，說明得人人都能理解。一大張紙對折，裡外一共四頁；翻過一頁，就看到一片空白，剩下的幾頁也都是空白。雖然畫有欄位線，但是只有標題，沒有報導內文。四個大標題，分別是學生們向政府提出的四項要求（請參考²³⁰—²³³頁）。這份《報民》，是由聲援太陽花運動的大學教授與藝術家團體所製作的；一方面是示威用的媒體，另一方面同時也是媒體藝術。在議場內外出現的眾多作品之中，《報民》具有幾個引人注目的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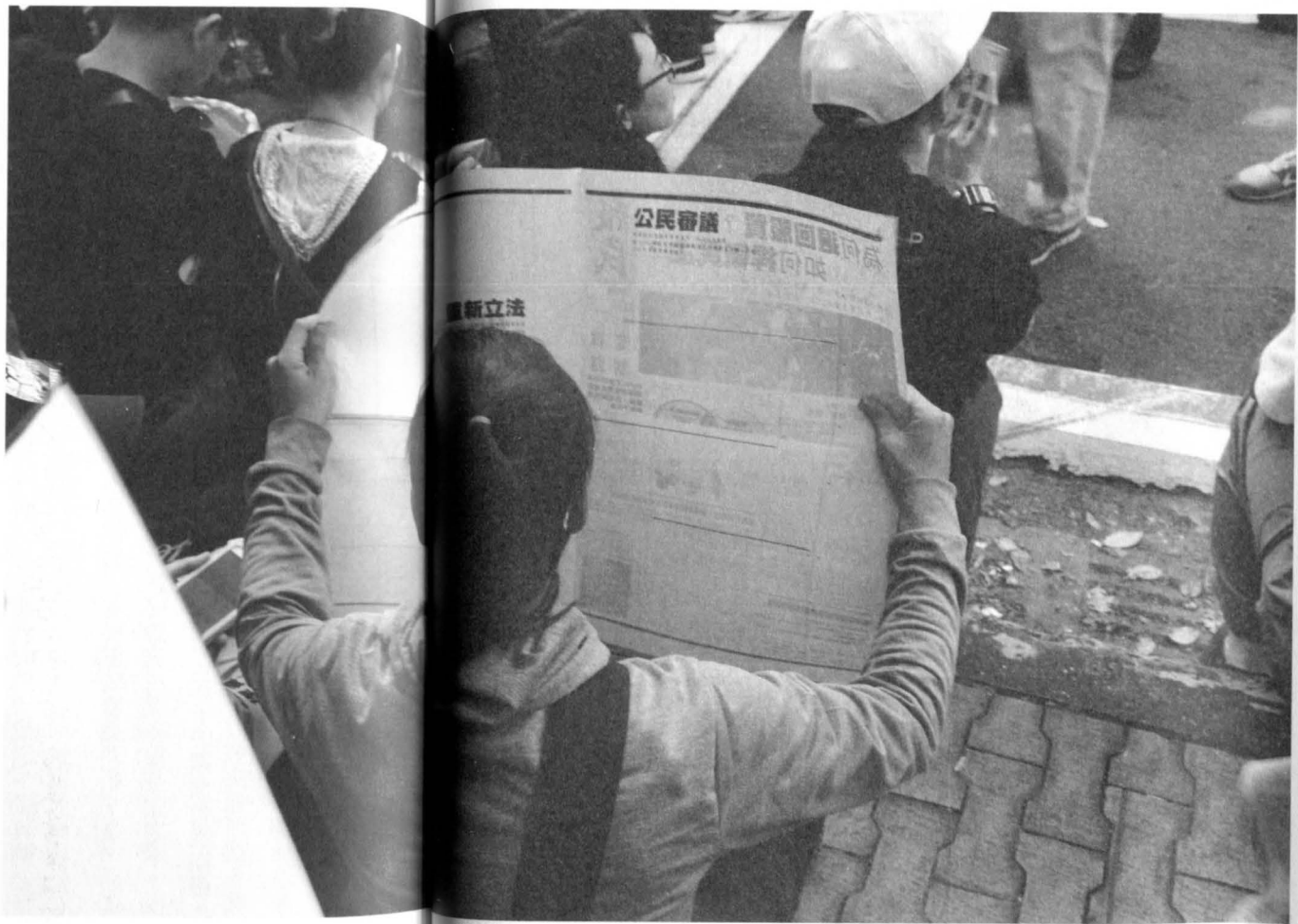
- 製作的速度非常快，從構思到設計一共只用了四十八小時，印了兩萬份。儘管當天有交通管制，仍然在示威活動的中心地區全數分送出去。這種速度感正好和太陽花運動的本質相呼應。
- 示威當天幾乎所有參加者都穿著黑色的T恤，被稱為是「黑潮」；全白的紙面在人群中帶來相當大的視覺衝擊。當天現場還有許多傳單發送，《報民》巨大的尺寸也特別顯眼。

- 和紙本同時，《報民》也在網路上準備了可以下載的電子版本。報導的部分設計成可用行動電話閱讀的形式，許多人可以一邊走路一邊閱讀。這是為了讓人可以一面移動一面思考，也一面思考一面移動的作品。

- 雖然是很單純的設計，它的訊息性卻非常強烈。在學生的訴求下所留的空白裡，政治家們將會填入什麼樣的話語？任誰都會忍不住想像。同時也讓打開這份報紙的人思考，他想在這空白中讀到什麼文字？

《報民》的標題，故意與「暴民」諧音。先前我曾說過，「暴民」這種說法和語言不平等性的系譜相連；「政治」就發生在明白指出這種不平等的時候。《報民》透過設計，重現了這樣的二重性：我們似乎被給予資訊，其實並沒有；政府好像做出回答，但其實什麼都沒有回答。這種二重性，就是「黑箱」的本體；《報民》則把它反轉過來，用紙上的空虛來表示。我們看到潛藏在藝術最底處的力——從空虛之中抽取力量的能力——也看到設計這份報紙的藝術家令人驚訝的想像力。

一開始我們就提到，服務貿易協議的背景，是特殊且例外的關係。兩國之間的「關係」、「協議」、「協定」，都和平常所使用的意義不同，因此這些詞語的解釋與理



解，就顯得更為重要。詞語本身讓我們意識到，一個詞語的內在，就包含著看法不同所帶來的差異。在攝影的領域裡，光學上的差異稱為「視差」。我們不妨說，特殊且例外的狀況，讓我們意識到意義上的視差。因此我們必須從平常生活中，就訓練自己對視差敏感地注意。不會錯過差異的眼力，是非常重要的。

良好的眼力，是藝術的基本。而「反黑箱服貿」的學生們更證明了，良好的眼力同時也是政治的基本。他們注意到政客的「偽裝」——明明沒有經過審查，卻做出已經





侵蝕，陷入了機能不全的窘境。他們的眼力不僅沒有錯過這些，更發現到議會本身就是一片空虛。他們把這樣的空虛取名為「黑箱」，藉此更解放了自己的想像力。

今日的革命，標示出代表制的極限，並且透過創意與巧思，思考另類政治的做法。雖然這樣的實驗已經開始在全世界中進行，但是太陽花運動的學生率直地讓我們看到它的做法。他們的眼力不只在思考的空間發揮，也發揮在現實的空間中。他們看到立法最高機關的建築上，開了小小的窗子，察覺法的空間並不是不可分割的實體，所以才有打開的窗子讓他們從那裡潛入，把偽裝的審查場所，轉變為真正的審查場所。只是利用那裡原本就有的物品，以及自己包包裡的物品，他們創造了政治，並且將之呈現在我們眼前。這也是想像力釋放所帶來的成果。

要佔領某個場所，那個場所必須是空的。所謂佔領，就從發現空虛開始。這一場運動發現了立法的場所是空虛的，並且證明了創造的力量就潛藏在這一片空虛之中。換句話說，他們並沒有讓「黑箱」中的「黑暗」保持黑暗，而是在箱子的裡面發現空虛，把它轉變成能量。

他們在空虛中創造出來的，是一種秩序，一種社會，學生們在這裡所發揮的創造力

令人驚奇。重要的是，被佔領的立法院，並不是一個內部封閉的狀態。從一開始它就向著外部開放，透過積極的宣傳活動、源源不絕的支援物資流入、以及完備的衛生與法律的救援體制，讓我們看到「黑箱」被破壞了。

被政府排除在審查之外的人，沒有發言權利的人，全部被賦予表達意見的機會。在民主制度當中，社會成員本來應該全體平等，但是「黑箱」的存在顯示了這件事不過是個幌子。「黑箱」排除了語言的平等，透過破壞「黑箱」，則讓我們重新取回語言，解放被封閉的聲音，從中引發共鳴，政治就從這裡開始。許許多多的學生與市民，在議場內，在街道上，在所有的場所發言。這是一場透過聲音、紙張與媒體所進行的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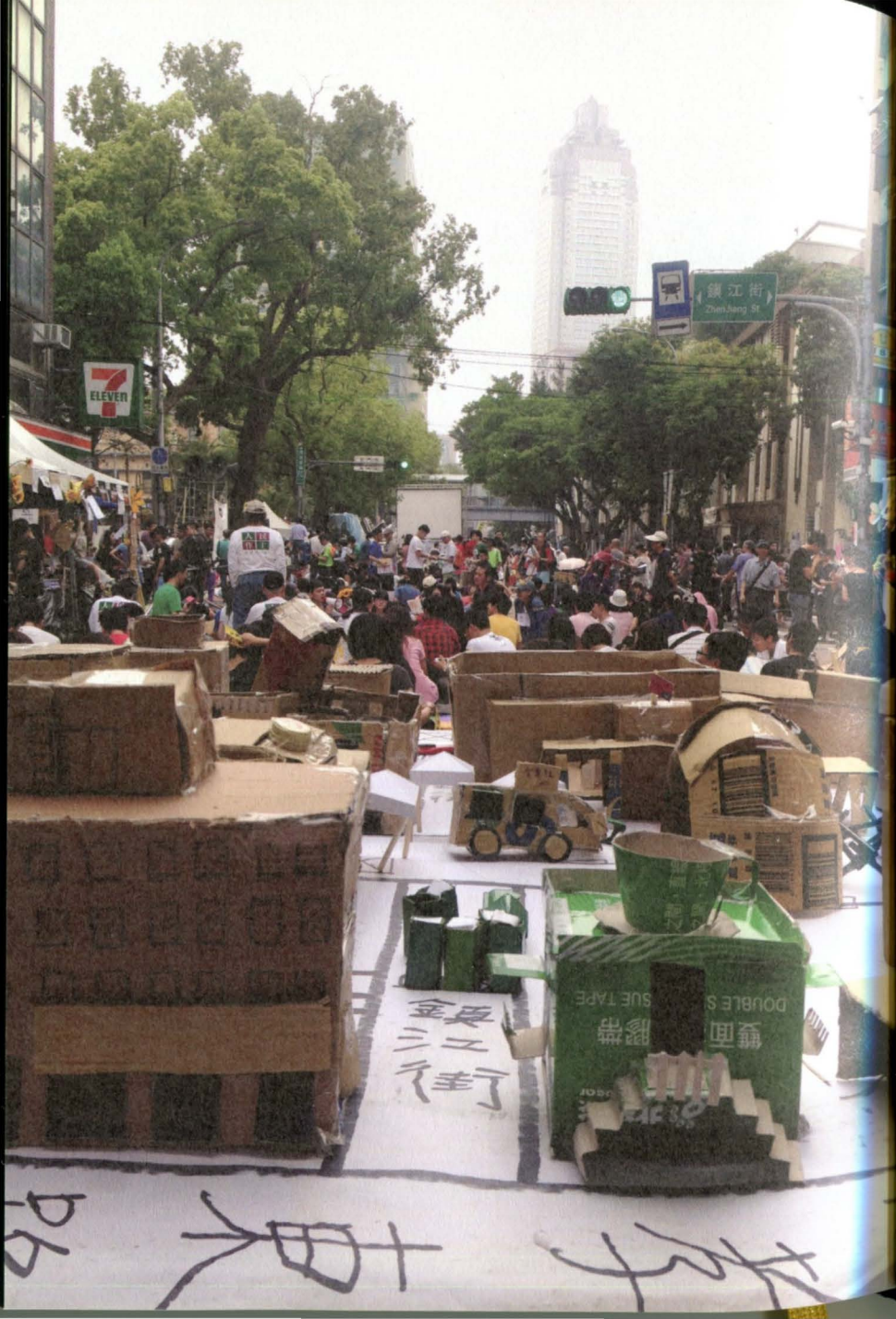


| 照片說明 |

46 - 47頁	聖保羅	巴西勞工黨的集會	1982年
48 - 49頁	里約熱內盧	要求民主化的集會	1982年
50 - 51頁	布拉格	天鵝絨革命成立之日	1989年
54頁上	巴黎	反對大學入學考改革案運動	1986年
54頁下	巴黎	高中生的示威	2002年
56 - 57頁	倫敦	反對攻擊伊拉克的示威	2003年
60 - 61頁	洛杉磯	歐巴馬總統當選的瞬間	2008年
64 - 65頁	伊斯坦堡	佔領蓋齊公園	2013年
66 - 67頁	伊斯坦堡	塔克西姆廣場的示威	2013年
76頁上	巴黎	巴士底廣場的集會	1988年
76頁下	巴黎	蒙帕那斯大道大學生的示威	2002年
78 - 79頁	西新宿	反核電示威	2011年
84頁	台灣新北市	樂生院的工作坊	2009年
96 - 97頁	台北	太陽花運動示威中閱讀「報民」的人	2014年
100 - 101頁	台北	太陽花運動示威	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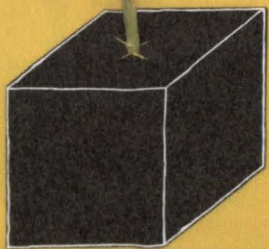
第二部 革命的做法





反對黑箱

公開透明



黑箱 01



106



107

反黑箱服貿——我們反對黑箱審議與密室政治。如果畫成圖畫，黑箱就是黑色的立方體。單純，不論是誰一眼就能明白，就像標語一樣。對於象徵的功能來說，重要的是不需要解釋，運用直觀就可以傳達訊息。「黑箱」這個象徵在群眾之中發揮的力量，在許多方面引人深思。

首先，從黑箱產生了黑色。黑成為基本的色調。並沒有誰決定了這件事，這是自然形成的。而且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散布開來。海外的人知道這件事，是因為許多人在臉書上的大頭貼照，一個接一個變成黑色的。很快地，有人製作黑色的T恤，周圍穿黑衣服的人多了起來。最初從黑箱誕生的就是作為主題的色彩：黑色。

稱呼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的審議為「黑箱」，是一種相當強烈的批判。黑是批判對象的顏色，在這個意義下是一種負面的顏色。這樣的顏色成為反對運動的主題色彩，仔細想想還真是奇妙。成為主題顏色的並不是對比的顏色——比方白色——反而是應該被批判的顏色成為主題。換言之，如果人們選擇了對比的色彩，反而需要多做說明；因為一定會有人問，為什麼選擇了這樣的顏色？在這個意義下，穿著黑箱的黑比較好，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傳遞訊息，讓大家知道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色彩是一種符號，也是一種訊息，會轉化成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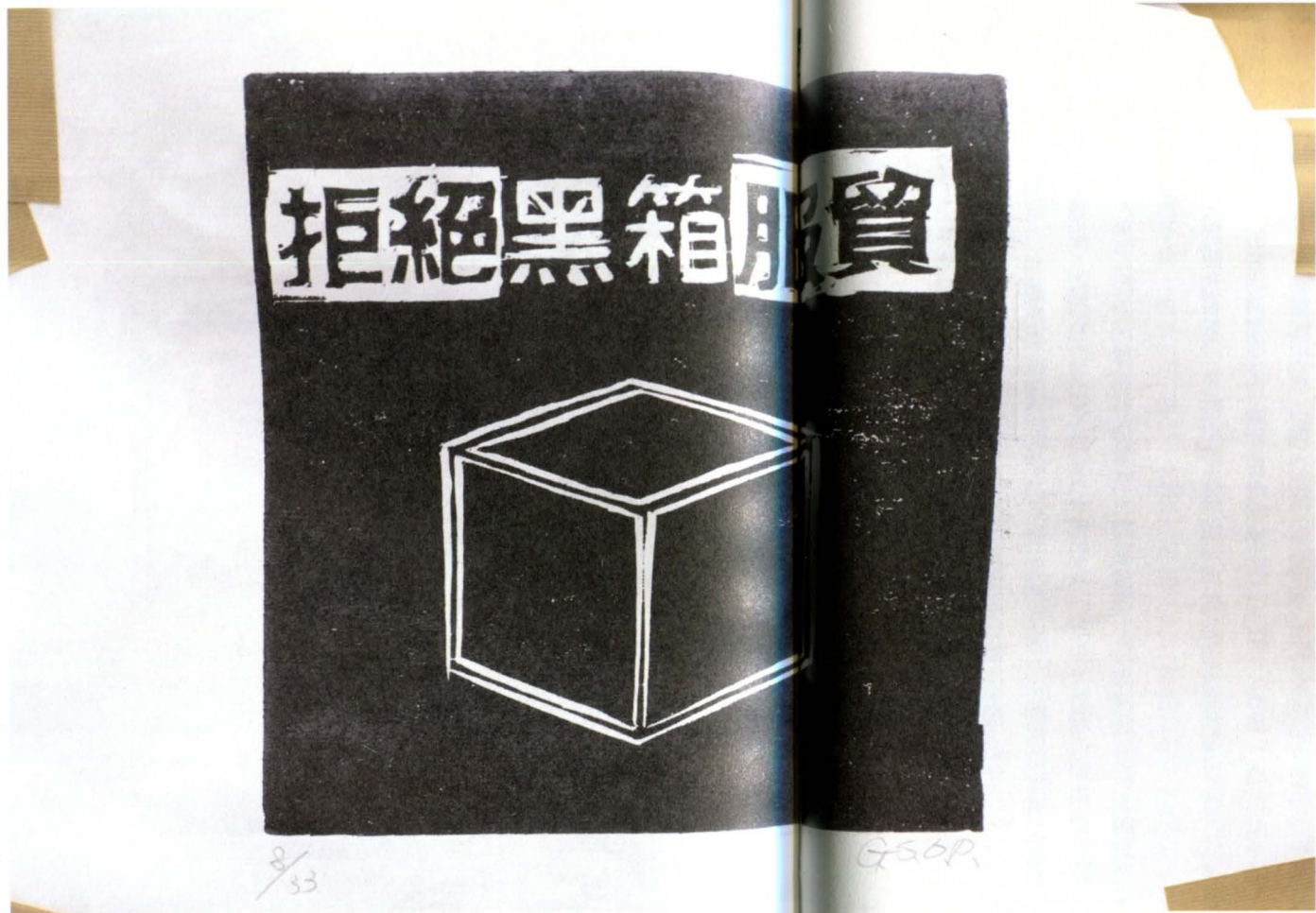
雖然不知道最早是誰開始說的，但「黑箱」本身就內藏著深刻的意涵。以政治上的脈絡來說，這個詞語經常出現在一九七〇年代所流行的「行為主義」政治學中，其代表就是大衛·伊斯頓¹的政治系統理論。政治系統理論以輸入／輸出的機械論模型，來思考政治的決定過程。人們的要求或支持是一種輸入(input)，最後輸出(output)成為政策的形態；在這過程中，存在著由政黨、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所形成的政策決定的機制。

雖然伊斯頓所思考的政治，是一種輸出經過反饋、再成為輸入的循環系統，但是在實際的研究中，輸入被數值化，決定過程本身則被視為「Black Box」而捨棄不論。心理學上的行為主義，以刺激與反應、輸入與輸出的模型來思考行為，把「心」本身視為「Black Box」，而不加以處理；類似地，在伊斯頓一派的體系論之中，對複雜的政策決定過程進行分析，是不必要的。雖然他們絕對不是希望政治「黑箱」化，但是他們僅僅把著力點放在輸入、輸出以及反饋這個流程的觀點，也成為批判的對象。

當然，黑箱這個詞語本身，並沒有行為主義的意味。不過，美國的政治學中出現行為主義，有它的背景——相對於過去以法律制度為中心的政治學，他們引進了新的視點，著重人類在社會中的行為。從「黑箱」這個詞語所包含的政治理論歷史，來觀看

1 | 譯註 |

大衛·伊斯頓(David Easton, 1917-2014)，出生於加拿大的美國政治學家。在他的政治系統理論中引進行為科學，獲得極高的評價。哈佛大學博士，芝加哥大學榮譽教授。



「反黑箱服貿」運動，會看到這樣的輪廓：相對於現實中「Black Box」化的政策決定過程，人們的行動要求恢復法律應有的權利。人們的行為，顛覆了「行為」在行為主義中的意義。直接的行動、參與者的心、現場的組織化等等，在理論上無法數值化的行為，正是政治過程的本身。以這一點來說，「黑箱」這個命名直指現象的核心。我還想加上一點，「黑箱」讓人想起暗箱——那是稱為「Camera obscura」的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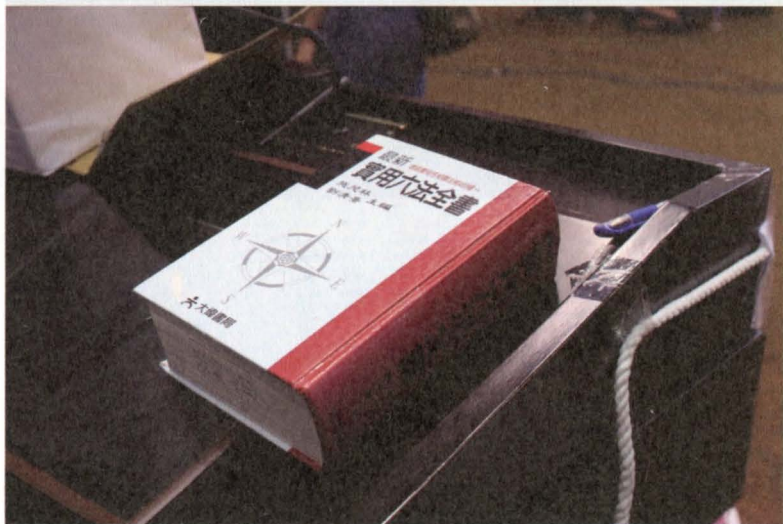




如果在其中的一端裝上鏡頭，另一邊的壁面就會投影出畫像來。如果在這個壁面裝上感光物質，就會變成我們所熟知的「Camera」，也就是照相機。暗箱是照相機最重要的機制，談論攝影史必定會談到它；它把環境轉換成「光——鏡頭——影」的關係，並且記錄下來。把這個關係倒轉過來，就成了投影機；透過「影——鏡頭——光」的關係，把影像投射到環境之中。

從影像的記錄和投影這兩個機能來看，黑箱和暗箱的關係非常有趣。為了將政策決定的過程祕密化，當代的政治使用了各式各樣意象（image）的投影技術。在當代政治中，形象（image）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增大，是毋需贅言的事實。我們萬萬不可忘記，關於立法院的「黑箱」，執政當局的對應和現存媒體所報導的意象，很明顯地並沒有傳達真實，而是為了形成障眼法的一種「權力的投影」。





議會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進去的地方。只有被選中的人才可以進去，在那裡進行議論。透過選舉選出來的代表，我們把政策決定的權限託付，這就是代表制民主主義。議會是只有被託付權限的人才能進入的場所。所謂議會指的不是建築物，而是國民透過選舉選出來的人執行職責所在的活動之場所。

議會的內部是代表者的空間，外部則是被代表者的空間。內部為了立法而存在，所立的法，則應用到外部。雖然再怎麼說，內部都是外部選出來的，但是外部卻受到內部根本的影響。一個都市裡「法」與「空間」的關係，就從這裡開始。

然而，如果議會單單只是建築物呢？沒有進行議案審查的時候，議會是空的。議會的中心是議場。如果沒有進行審議，它就只是一個空間，一個沒有在使用的空間。佔領立法院，就從認識到議會是一個物理性的空間開始。學生們理解到它是一個空洞的空間。他們從外部向著內部，跨越了內外的隔離。那是一種決斷，一種態度。

他們並沒有錯過外部與內部之間的緊張。空間的外部與內部，經常處於一定程度的緊張狀態。加斯東·巴舍拉²在《空間詩學》³中寫著，當某一方受到肯定而另一方受到否定的時候，空間便帶有攻擊的性格。單方面強行中止議案的審查，正好引起了這種狀況。看得出來，那是內部背叛了外部，但是對於這件事的嚴重性，內部了解

2 | 譯註 | 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法國哲學家、科學哲學家。

3 | 譯註 | 《空間詩學》中文版由龔卓軍翻譯，張老師文化事業出版。

到什麼程度，則不得而知。實際上，它引起了嚴重的事態，在某個意義下，它是個清楚的證據，證明民主主義還在發揮機能。

所謂的機能，就是在緊張關係下，認識議會內部與外部的關係。因為內部制定的法，會對外部造成影響，所以外部必須注視著內部的活動。雖然在行為主義式的「黑箱」理論中，政策這項「輸出」會被反饋到輸入，也就是影響到國民的要求與指示，但是「黑箱」本身並不能在理論上保證這一點。當某個對國民的經濟或生活會造成直接影響的法案成為焦點，外部對於內部的注視，會更加嚴厲。

話雖如此，議會內部與外部的關係，並不會侷限在這裡。就像巴舍拉所說，重要的不是肯定哪一方，而是必須在外部與內部之間創造出辯證法式的關係。若想要在緊張的關係中去除空間的攻擊性，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如果只是否定內部、肯定外部，反而會強化攻擊性，招來暴力。

這個辯證法式的解決，就在街道上。以這一點來說，台北的都市計劃與立法院的位置，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在台北，與行政有關的建築物群聚在一起，立法院就在其中的一個角落，以東京來說，相當於霞之關⁴。但是只要踏出建築物一步，就可以看到商店以及各式各樣服務業林立，立法院正位於生活空間之中。不遠處還有公園與博

物館，再往前一點則是台北車站周邊的繁華地帶。議會和包括食、衣、住、行在內的日常生活，相接在一起。日常生活最重要的空間就是街道，那是聯接內部與外部的第三空間。

反黑箱服貿的議論，並不是在被佔領的立法院內部進行。以數量來說，在周邊的街道上靜坐、參加議論的人壓倒性地居多，後來還擴大成為示威的群眾。在這街道上展開的各種活動，讓內部與外部的緊張關係沒有朝向攻擊性發展，而是轉化成為辯證法式的關係，或許這就是運動成功的因素。

街道是微型關係性的集合。不特定多數的市民來往於其間，經由各自的日常關係性，去理解此時此地正在發生的事情，互相交換意見，然後付諸行動。只用「支援」不足以表達這個景況，那是同時具有感覺性的涉入，以及知性理解的行動。對步行的人來說，對於空間感覺的掌握與知性的理解，是不可分離的 action（行動）。在議會周邊的步行也是一樣，感覺的掌握與知性的理解，在不知不覺中創造出辯證法式的空間。

雖然外部與內部的關係被逆轉過來，假使沒有來自街道的參與，大概也不能持久吧！

4 | 譯註 | 霞之關是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的一處地名，因為日本行政機關的廳舍群聚於此而知名。



Free TAIWAN

120:35

青年奪回國會

馬英九

完成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先立法再審查



朝野立委協力 人民站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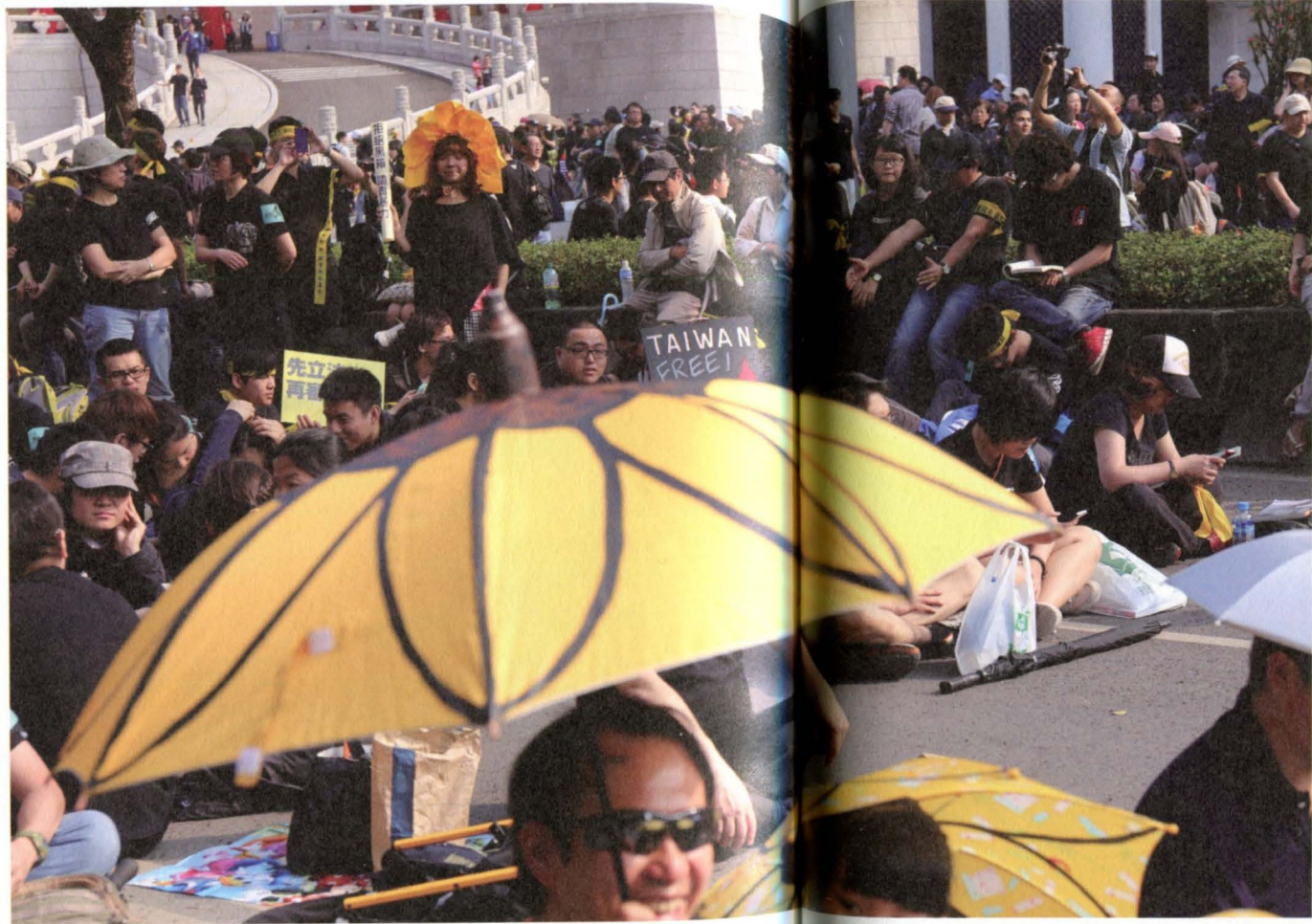
向日葵 03



124



125



因為佔領立法院是從三月十八日開始，最初人們稱它為「三一八學運」或是「佔領國會事件」；而後向日葵成為運動的象徵，「太陽花運動」遂成為通稱。也有人稱它為「向日葵學運」或是「三一八公民運動」等等。關於太陽花這個象徵的形成，有好幾種說法。似乎是在佔領立法院的第一個夜晚，有人從外部送進來一朵向日葵，被插在議場中央的演講台上。這個畫面經由新聞與網路散播開來，支持者與學生們便開





始把花送進會場，於是成為運動的象徵。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六日發生的「三月運動」被稱為「野百合運動」；二〇〇八年冬天反對馬英九政權的集會遊行法，發起了「野草莓運動」；台灣已經有了以花草冠名的學生運動系譜。太陽花運動誕生在這個傳統之中，令人想起 Flower children⁵。在太陽花運動被佔據的道路中，鐵絲網上不只裝飾著向日葵，還裝飾著大量白色的百合花。野百合運動中，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廣場靜坐絕食，當時是戰後最大的學生運動；他們後來被稱為「學運世代」，對台灣的民主化有很深的影響。當時的總統李登輝接受了學生方面的要求，召開了國是會議。對於太陽花運動，李登輝也透過電視的訪問，表示理解與支持。從野百合到太陽花的傳承，顯示了超越世代的聯結。然而運動的規模有很大的不同，這一點也可以在實際上獲贈的向日葵的數量上看出來。根據報紙報導，從南部陸續送來的花有二十萬朵，反映了運動時間的長度與參加者的眾多。一方面剛好是台灣南部向日葵的盛產期，另一方面也表達了農村對都市、南部對北部的支持。

5 | 譯註 | 1960-70年代，美國的嬉皮在反對越南戰爭的背景下，用象徵和平與愛的花朵裝飾身體，故被稱為 Flower child 或 Flower childr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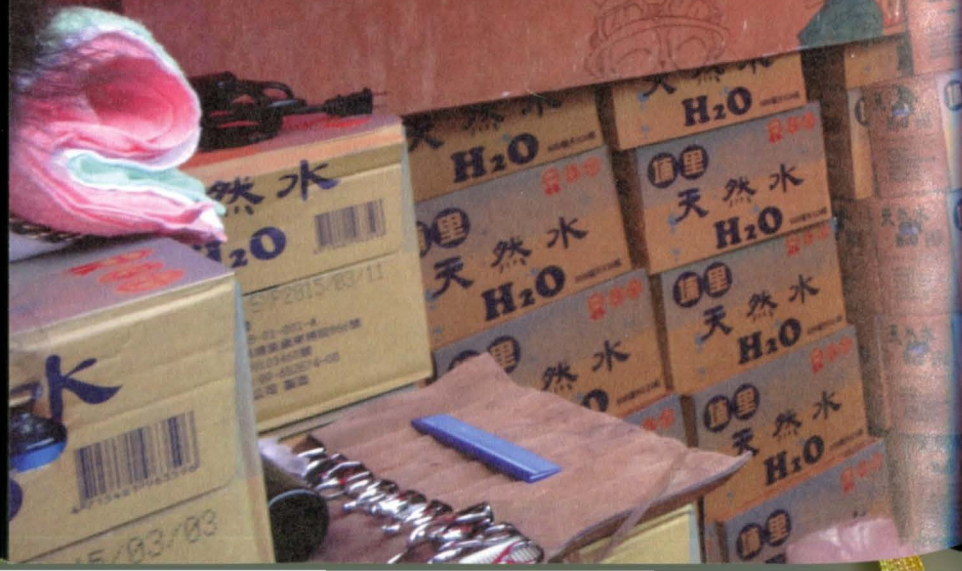


馬路上坐著好幾千個人。地上鋪著瓦楞紙板或是塑膠布，準備好瓶裝水以及遮陽傘的人們，在立法院周圍的道路上，日以繼夜地集會。不只是議場內部，道路也被佔領了。立法院主建築的前面有一個中庭，成為定期召開記者會的場所。學生佔領的議場、支持的學生與市民召開集會的道路以及聯結這兩者的中庭，言語不斷通過這樣的空間構造，被生產出來、散播開來。



太陽花理髮

蕉不想的愛



參加集會的不只是一般的市民或大學生，其中也可以見到高中生、國中生的身影，各自在塑膠布上舉行自主性的討論會。也不知道是誰帶來的，通道上擺放著大家共用的白板與布告欄。還有銀幕、投影機、擴音器，以及免費網域的看板。以一句話來說，除了沒有課桌和椅子之外，在這道路上設立起幾乎和學校內一模一樣的環境。如果說有什麼不同，就是這裡有許多人一起吃飯、一起午睡。儘管時間很短，但人們共同進行著日常的生活。

這樣的運動和僅限於一日的示威，或是幾個小時就結束的集會不同。它不是只有議論或抗議，還透過日常生活產生情感，這情感會慢慢擴散。面對佔領華爾街和佔領解放廣場運動，朱迪斯·巴特勒⁶重新思考憲法所保障的「集會的自由」，他這樣寫著：比起任何事物，集會首先發生在身體性之上。首先人們的身體必須一起存在於同一個場所，主張「我們是民眾」；這一點必須先於任何政治上的主張。

這看起來這好像在說著很單純的事情，但事實上則是切中道理的見解。通常人們以政治集會的主張或訴求，來理解這個集會，但是比它優先的事情（譯按：身體的聚集）其實更為重要。柄谷行人在他否定示威與集會之區別的發言中，認為移動與步行有很深的意義。他表示，示威是集會的一種形式，是「移動的集會」。在人們聚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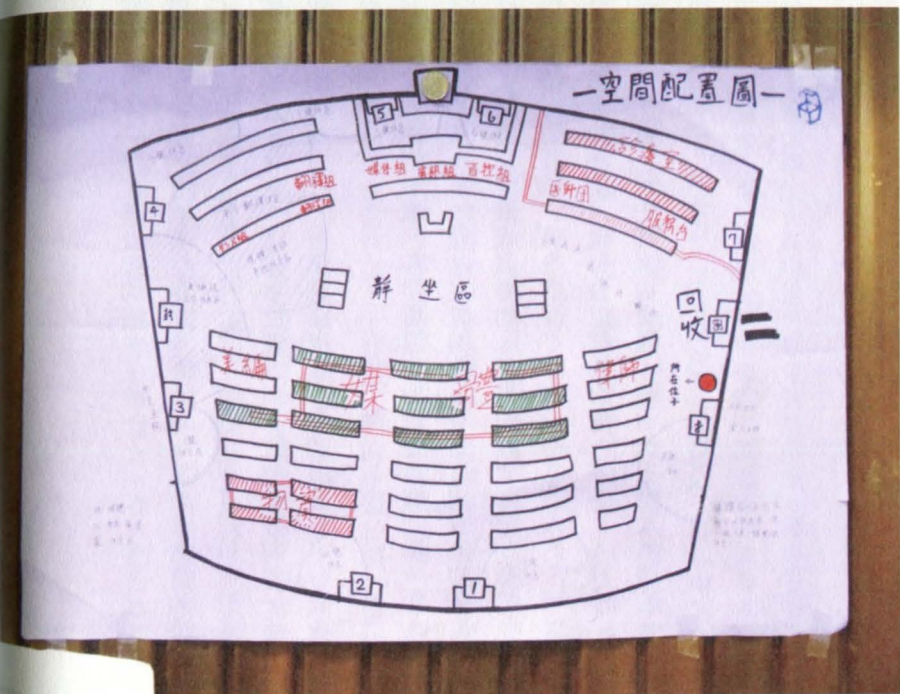
步行移動的「移動的集會」之中，「存在著直接的民主主義」。

事實上，當大量的身體聚集在一起，可以發生意想不到事。佔領華爾街的時候，像擴音器這種用電力擴大聲音的裝置一概被禁止；參加者為了與之對抗，於是使用「人體麥克風」。發言者所說的話，大家一起逐字反覆念誦。雖然有時間差，而且只是把耳朵聽到的字句原封不動地覆誦而已，但訊息確實就會傳遞出去。單一個身體做不到的事，由群眾來做，就做得好。

也有完全不出聲音，只是站在那裡的群眾。在伊斯坦堡的塔克西姆廣場，當人們被強制驅離公園之後，有一名男子不發一言，就站在廣場上。看到這個景象的人也過來和他站在一起，形成了連續數天只是站著凝視廣場的、無言的群眾。第一個站在廣場的男性，是一位演員。作為團體行動藝術，這些默而不語持續站立的人們，可以說是沉默版的「人體麥克風」吧！群眾的身體，也有像這樣的力量。

三月三十日「黑潮」示威的存在感，首先就來自身體。政治的主體是具體的。

6 | 譯註 | 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1956-)，美國後結構主義思想家，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辭學及比較文學教授。



有關太陽花運動的組織力，支持運動的人不用說，當然會表示肯定；但是連採取批判態度的既有媒體，也表示認同。尤其是議場內部，在極短的時間內形成井然有序的秩序，特別值得一提。內部分成議長席側與議員席側兩大區塊，中間的空間則放置演說用的講台。面向正面的右邊有醫療部，由醫師與護理師二十四小時常駐。它的對面是由數名律師組成的法務部。從右頁「空間配置圖」可以看到，醫療與法律這兩種最需要應付緊急狀態的服務，位於離右下角唯一出入口最近的區域。

議長席的左側是翻譯部，由擅長各國語言的人員駐守。中央的部分是應對媒體的窗口，在這裡答覆各種細微的問題。議員席的中央部分是媒體的區域，架設著各家媒體的轉播攝影機，記者們散坐在其間，面對著電腦。它的左邊是學生的美編組，負責動態影像、靜態影像的記錄攝影，訪談等工作也由他們負責。媒體區域的兩側分別配置著法律與美編，這一點很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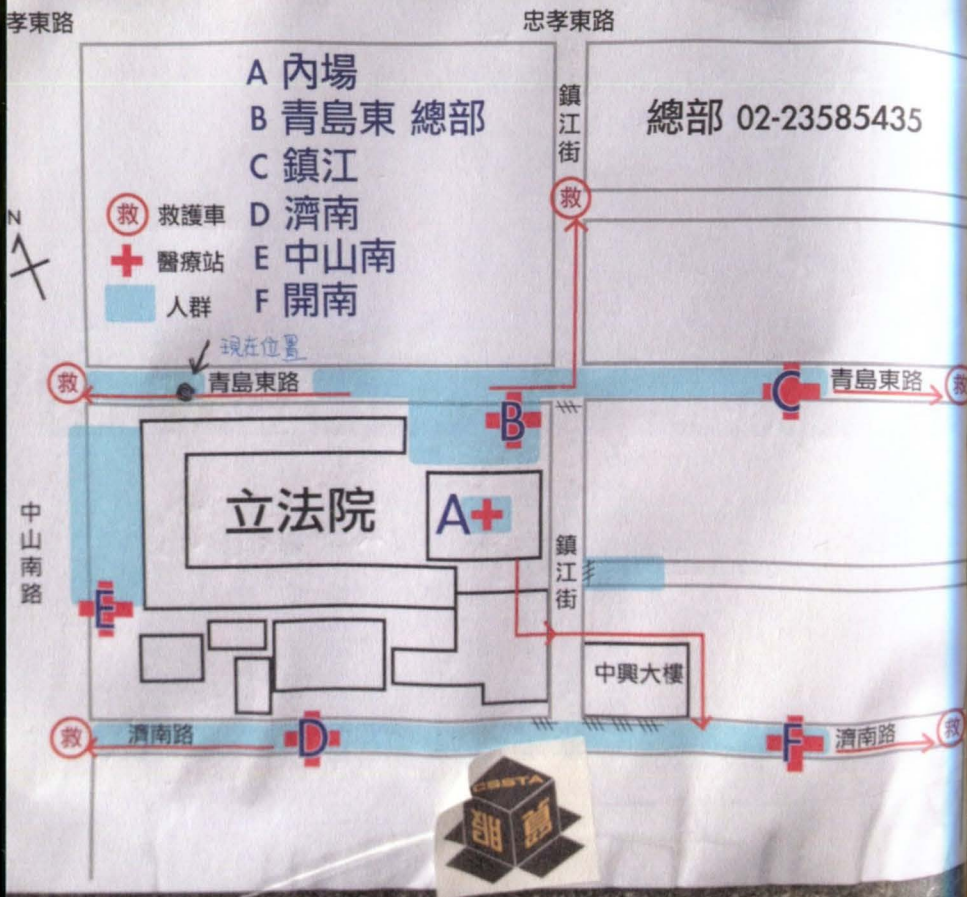
議員席的最後面、議場的最裡面是「物資部」，負責各種日用品的供給。食糧、飲用水、更換的衣物、睡袋、衛生用品等等必需品都在這裡供應。入口的旁邊有垃圾回收箱，垃圾在這裡分類，隨時可以拿到議場外面。上述大致的分區不但井然有序，而且充分發揮機能，幾乎要給人「原本就一直這樣子」的錯覺。不但和「佔領」這個



字眼所給人混亂想像相去甚遠，機能性的組織配置，更令來自外部的聲援者，及外國的媒體瞠目結舌，不是沒有道理的。

學生們撤離立法院的時候，這些都乾乾淨淨地回復到原來的樣子，讓後來進入的警察與政府人員嚇了一跳，就好像展覽之後撤走所有作品，把美術館恢復原狀一樣。佔領是暫時性的裝置藝術，目的達成後就恢復原狀回家，這只能說是藝術性的思考方式。我們可以說，透過這一連串的行動，太陽花運動明確地展示了「佔領」的新概念。

醫療站配置圖





理所當然地，議場空間的設計，純粹是為了議會開會使用。連續好幾天在這個不適合生活的空間中過夜，身體開始不舒服也並不奇怪。議場的內部，以及許多人持續靜坐的議場外，最顯眼的就是大大地寫著「醫療」的區域；醫師團就常駐在這些區域。以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的學生與醫師、護理師為中心的成員，以輪班的方式二十四小時值勤。毫無疑問地，他們的存在為大家在心理上帶來很大的支持。進入議場的時候有消毒的服務，也時常看到護理師為大家測量體溫。

醫療站也準備了維他命劑與提神飲料。只要一靠近醫療站，馬上就有人詢問你什麼地方不舒服，比平常更徹底執行健康管理。醫師團每隔幾個小時一組一組地輪班，這時候不論議場內外，群眾都為他們拍手。議場的牆邊全部成為休息的區域，因為是二十四小時輪班持續活動，總是有幾名學生躺在牆邊睡覺。五百八十五小時是令人驚訝的長時間佔領，雖說憑藉的只是他們的熱情，但是支撐他們的，則是照護的體制。





佔領活動完全改變了議會的空間結構。高出一截的議長席空在那裡，取而代之的是用空瓶做成的小巧紀念碑，碑上寫著「民主」兩個字。在全世界的國會中，議長席上寫著「民主」的議會，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吧！它的上面，插著一朵向日葵。背後是孫文的肖像畫。議長席後面的兩扇門，都用屏障封住，下面是休息的區域。在這個角落裡，紙板上寫著「翻譯部」幾個字。

以英語、俄語為首，佔領一週後，就已經可以處理十國語言的翻譯部，是以外文系的學生為中心，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日語的翻譯由三個人擔任，把學生方面的聲明譯成日語發布。不論議場內外，他們都積極地應對媒體的採訪。工作的不只學生，有些已經畢業的翻譯家也來幫忙，除了把各種文書譯成英語或德語，在外國媒體來採訪的時候，還擔任口譯。

這一次的運動，消息的傳布從一開始就跨越國境，支援的圈子不斷擴大，多國語言應對速度之快，發揮了很大的功效。「翻譯部」不只存在於議場內部，世界各地的人們，也把學生發表的訊息或是新聞，翻譯成各自國家的語言。動態的影像也經過翻譯，加上字幕。維基百科上「佔領立法院」的條目之下，在第一時間除了中文以外，

：服貿開放《第二類電信服務業》之影響分析

第一類電信服務業指的是 第二類電信服務業指的是

台灣開放內容

存轉網路服務
Store & Forward Network
傳真存轉
數據網路服務
交換服務

存取網路服務
Store and Retrieve Network
語音訊息
遠端存取服務
線上訊息接收

數據交換
Data exchange
數據通信
電信業者設置網路設備
Interconnection Transfer Model

疑慮 網路行為恐遭監控
存取行為遭監控、遠端存取網路設備, etc.

疑慮 取得經營網路權限的資格
遠端存取中心、遠端操作等, etc.

中國開放內容

僅允合資企業

新增福州市為試點城市

允許在福建設立合資企業

離岸呼叫中心業務

提供數據機處理與交易

Department of Design, National Sun Yat-sen Memorial University
No. 1, Chuhsia Hsueh, Cheng De 59th, Lan Tai Campus, Shahu, Tainan City, Tainan 70001, Taiwan 70001-HK

國家暴力



革命的
做法

更以英文、西班牙文、法文、泰文、越南文、日文等等各國語言的版本同時刊載，並且受到回饋。所謂網路時代的速度感，大概就是這樣的東西吧！





立法院前面的大馬路全面禁止通行。學生與市民的靜坐佔據了大部分的路面，多輛配備著碟型天線的轉播車排成一列一列，現場還有大型的投影幕。這要說當然也是當然，畢竟國會被佔領了。被群眾佔滿了的道路的一邊，留著寬度一公尺左右的空間。要是有人不知情走在上面，馬上會有學生出聲：「請離開這個地方」。那是為了緊急狀況，特地留出的通道。當我看到細心設置在立法院與緊鄰區塊之間的道路上的這條通道，我理解到，這次的佔領緊緊地抓住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對弱者的設想，以及為了讓弱者也能參加而努力設計萬全的體制。實際上，我就曾經目擊有人從議場內部坐著輪椅出來；還有學生在大熱天的集會當中，因為身體不舒服被用擔架送到救護車上。不管是哪一種情形，都因為這條事先準備好的「通道」，才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將人運送到群眾的外圍。

我在三十日的大規模集會上所看到的景象，也和這件事有關。據說，五十萬的群眾中，有許多人是全家一起參加，也可以看到許多小朋友的身影。其中，有一位坐在輪椅上、由護理師推著前來參加的老人，一隻手腕上還插著點滴管子，看來像是剛剛從病房直接出來；即使在遠處，也可以看到他竭盡力氣來參加的樣子。雖然我在世界各地看過許多抗議的群眾，但是一邊打點滴一邊坐輪椅來參加的，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勇敢面對

國家是人民的
民不該是

緊急通道

物資領取

林水通

一般

物資站
物資收文宣

旁自水道
滾休前出

騎樓·人行道
SIDEWALK
EXCEPT MOTORCYCLES
PARKING AREA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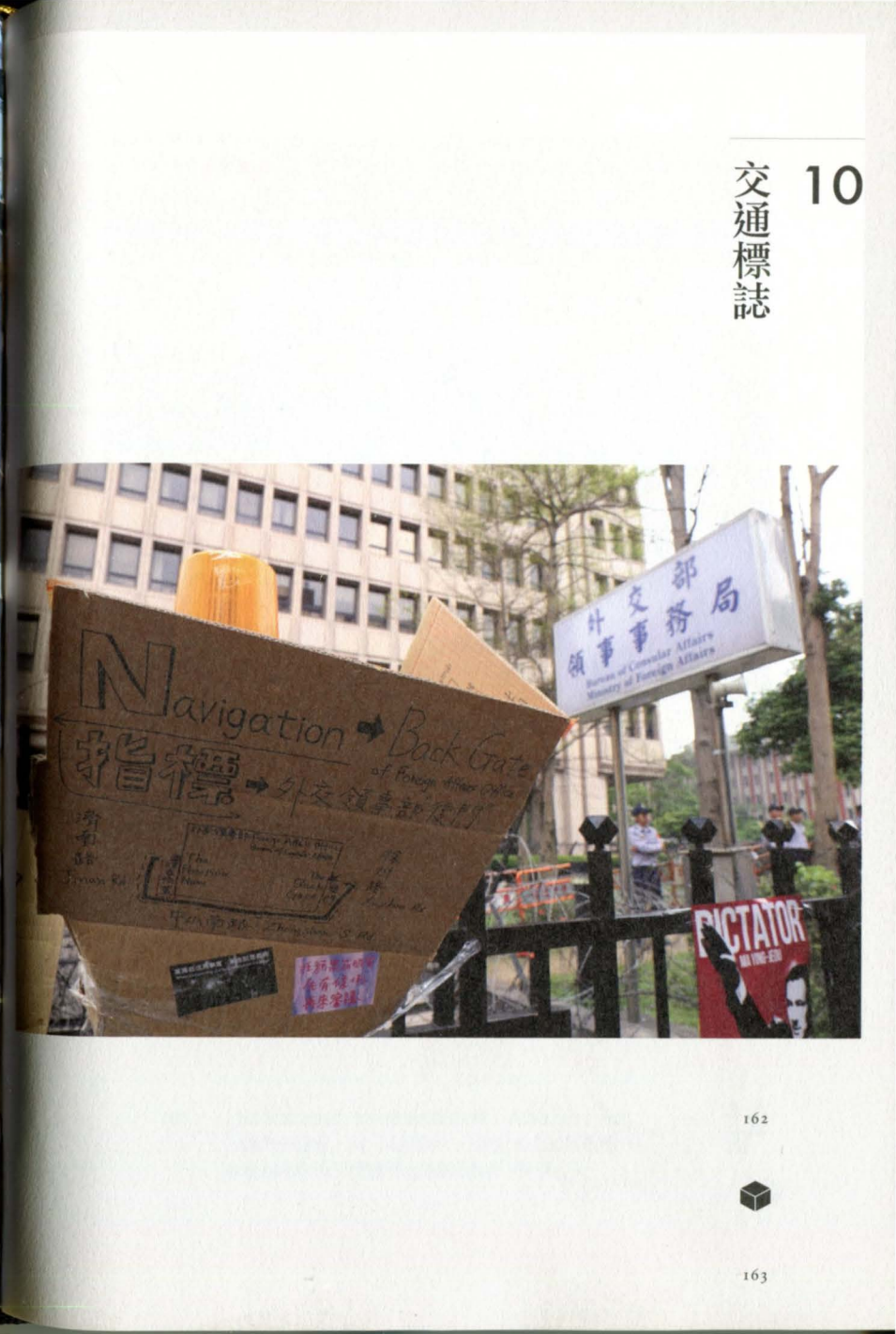


要改變空間與時間的使用方式，需要下點工夫。比方路上掛著一些牌子，上面寫著學校上課科目的名稱。今天在街道上上課——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也有學生站著，手上拿著瓦楞紙板，上面大大地寫著「民主教室」幾個字；箭頭的方向指向立法院。不管哪一個，都不只是牌子或看板，實際上人們真的在街道上、在議場內設置了教室。只要老師和學生都在，一堂課就可以成立。

這樣的工夫在世界各地都在發生之中。二〇〇八年秋天，在法國發生了學生與教員的罷課。因為罷課的長期化，許多人開始了一邊走在大馬路上、一邊舉行研討會的上課方式。雖然不是逍遙學派⁷，但如果人數不多，應該是可以一面慢慢走、一面討論吧！這樣說不定更適合屬於都市的希臘哲學。

議場內的上課，大多是圍成一個圓形的討論。以服務貿易協議的說明圖為本，逐漸展開認真嚴肅的議論。對於民主主義的學習，沒有比這個更真實的環境了吧！我相信那些稱呼議會為「民主教室」的年輕人，一輩子也不會忘記這樣的經驗。

7 | 譯註 | 逍遙學派是亞里士多德學派的別稱。據說亞里士多德在講學的時候，有一面說話，一面走來走去的習慣，故他和他的弟子們被稱為逍遙（散步）學派。





革命的
做法

當立法的空間被佔領，鄰近的外圍空間也被佔領，首先發生的就是認識上的變化。原本車輛行走的道路，因為擠滿了人群而無法通行。一直到昨天都還是道路的地方，不再是道路，而變成某種其他的場所。讓道路成為道路的，是法；而生產法的地方，就在牆壁另一邊的空間。這種認識上的變化，在這裡、那裡，到處發生。

大致上來說，車道上都有箭頭。那是全世界到處都有的通行標誌。所有人開車的時候，都會遵從那個箭頭。若不這樣，就會引起事故，都市的機能也要麻痺了。但是在立法院的周邊，那樣的箭頭被用瓦楞紙板覆蓋起來，上面再用粗大的麥克筆畫上別的箭頭。立院周邊被靜坐示威的人佔領的路面，方向的指示改變了。若不這樣，不知情的車輛將會駛入，難免造成事故。

看到這樣的光景，我想起「布拉格之春」，華沙公約組織的軍隊侵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時候所發生的故事。以非暴力方式挺身抵抗的市民們，在一夜之間拔除了所有的交通標誌與地名路標，讓「敵方」的戰車與裝甲車動彈不得。對外地人來說，地圖沒有辦法和現實對應，引起了混亂。不過這樣的戰術在現代說不定行不通了。只要用 Google map，就可以知道自己所在之處。

在台北的正中央，用瓦楞紙「修正過」的標誌發揮了作用——這說不定是 GPS 的





革命的
做法

時代才有的戰術。只要日常還是日常，道路就只是道路。然而，一旦議場的內部與外部的關係逆轉，空間的政治性就顯露出來。坐在車道上、逆著箭頭的方向行走、倚靠在牆壁上——雖然禁止這些行為的是內部，但外部重新改寫這些規定。在瓦楞紙板上畫箭頭，這誰都做得到。黏貼在車道箭頭上的這一張紙，不但暴露了空間的政治性，也顯示出內部與外部的二重性。





主張要一貫，要求要具體，資訊要迅速——對運動的強度來說，這些都是重要的要素。我們不妨說，太陽花運動巧妙地結合這三者，讓運動得以成長、持續。大家之所以能夠共有「佔領」的這一段非常時間，在三個要素之外，還要加上獨特的幽默感與「酷」的感覺。那是自然產生的，不是概念，而是具體的東西。

劇作家貝托爾特·布萊希特⁸離開德國之後，輾轉於蘇黎世與巴黎之間；後來他移居到丹麥菲因島（Fyn）斯溫堡（Svendborg）近郊。在這遠離都會的鄉下，他以麥稈屋頂的農舍作為工作的地方；在他的門扉上，掛著一塊匾額，上面寫著「真理是具體的」。在納粹侵略不斷擴大的緊迫狀態中，布萊希特一方面和倫敦與巴黎的逃亡者接觸，同時以這句話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多數的人之所以能夠共有情感與感覺，是透過具體的行動，以及賦予行動具體性的努力。所以群眾必須製作物品，書寫文字，發出聲音。這些具體的過程本身，就是政治的主體。真理並不在什麼遙不可及的地方，真理就在這些過程裡。布萊希特的話語，超越了世紀的藩籬，至今仍然栩栩如生。

8 | 譯註 | 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德國劇作家、詩人。









除了保留一個出入口以外，進入議場的所有入口，都用箱子與椅子堆積而成的屏障封閉起來。椅子用的是議員用的大型的椅子，組合起來後用粗細不同的繩子固定住。雖然看起來不是很安定，但實際上文風不動，非常穩固，並不是隨隨便便使用繩索網起來而已，上面打了大大小小、無數的繩結，不論從哪個方向推它，都一動也不動。議場中不只屏障用的繩索而已，實際上充滿了各種纜線類的東西。手機的電源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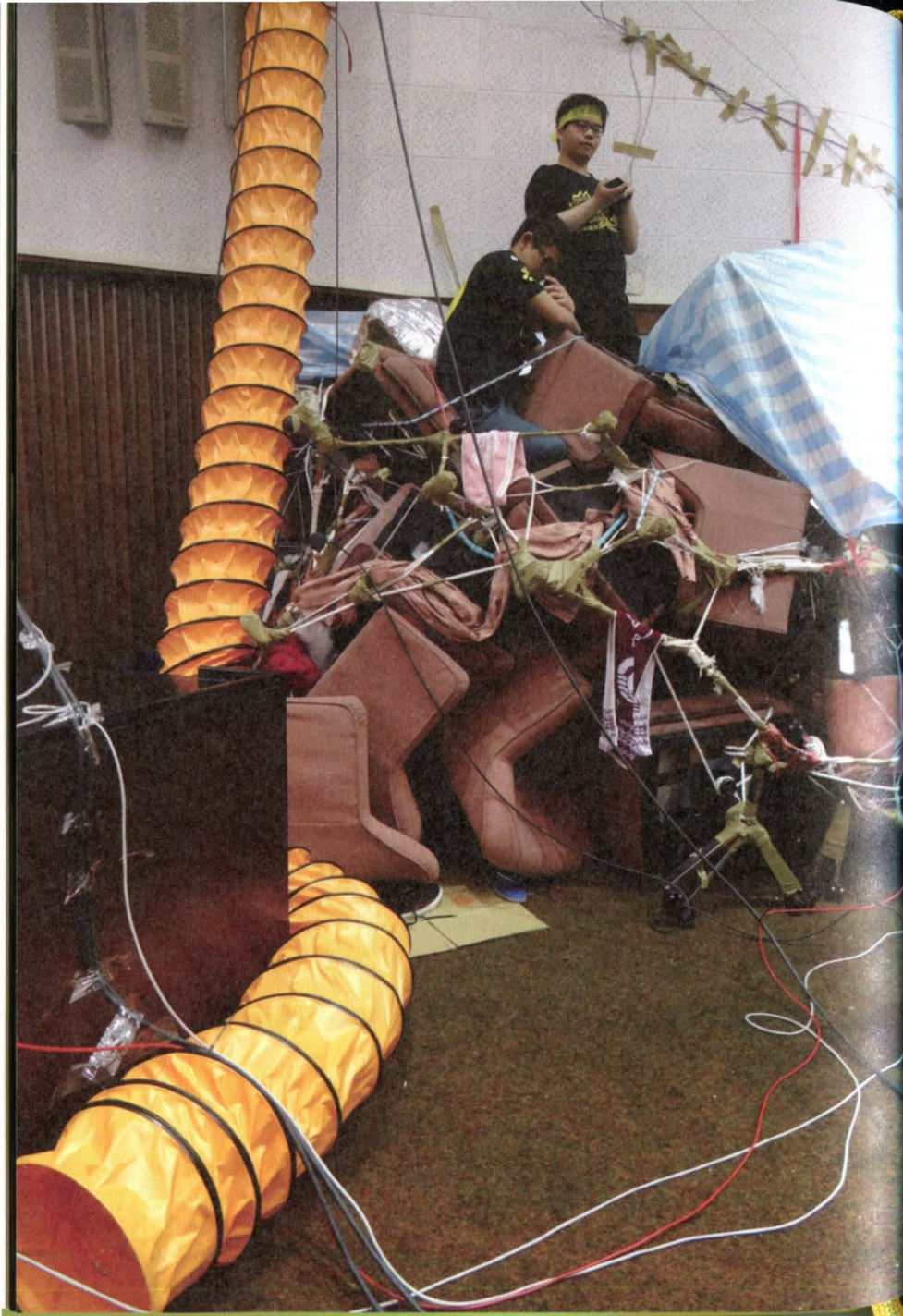
照相機與個人電腦的傳輸線、從外部拉進來的網路線——無數的纜線縱橫交織。但是，每一條線都用膠帶固定在地板或是牆上，走路經過的時候不用擔心被絆倒。這種細心的地方，可以看出組織的徹底。

通往議場二樓的樓梯上也有屏障，但這裡使用的不是椅子，而是用電風扇組合起來。大型的、水藍色的扇葉集合在一起，看起來像是當代的裝置藝術。說起來，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克里斯托⁹在巴黎的街頭用汽油桶堆積而成的牆，已經是一種屏障、一種街壘。把它看成裝置藝術是錯誤的，應該說，是巴黎街頭巷戰所產生的街壘記憶流入藝術之中，這才是正確的看法。事實上，雨果原著改編的電影《悲慘世界》（2012）中描寫的路障的象徵，是許多年輕人共有的印象。

後來，克里斯托用銀色的布，把柏林的舊德意志帝國國會議事堂捆包起來。國會議事堂就這樣化為一件作品，成為克里斯托流傳美術史的代表作之一。那雖然是慶祝德國統一，是一種政治象徵的事件（event），但是看了佔領立法院學生們的共同創作，克里斯托的作品反而讓人感覺是古典的裝置藝術。

9 | 譯註 | 克里斯托 (Christo, 1935-)，出生於保加利亞的藝術家，和妻子珍納-克勞德 (Jeanne-Claude) 一起，以 Christo and Jeanne-Claude 之名活動。有人稱他為地景藝術家（雖然他本人否認）。從日常生活用品到龐大的建築物、自然地景，以各種大小「捆包」的作品知名。







革命的
做法

台北三月的氣溫，就像東京的七月。不只如此，因為議場內的空調被關閉了，室內的溫度上昇，呼吸變得困難。當人們開始擔心學生們的健康時，有某家電器行自願提供空調，成功地從二樓的窗戶，用巨大的吹口送進新鮮的空氣。不用說，他立刻就在網路上成為名人。飲水也不斷送過來，裝著寶特瓶的紙箱堆砌在路旁，築成一道長長的牆。有一天，送來的水瓶外觀還特別針對這場運動作設計，雖然也是平常的寶特瓶，但是瓶子的一半包著黑色的塑膠膜。

水與電氣等等社會生活的基礎，不但支撐了人們的生活，同時也成為群眾議論的主題。和日本反核運動互相聯繫，台灣也有反對「核四」——第四核能發電廠——的運動傳統。反核運動也流入太陽花運動之中，連日來在街道上召開反核的集會。佔領的行動，在多種抵抗政府的抗議運動之間建立起聯結。這些聯結在佔領結束後更加強化，甚至迫使政府面對反核運動，不得不做出凍結核四工程的承諾。

福島的核災成為一個很好的契機，讓日本人具體地思考「能源」——這個平常眼睛看不到，卻是巨大無比的對象。所有的事故，都暴露出潛在於物品之中、平常看不到的關係性。使用具體的事物，可以製作出讓我們以具體的方式思考政治的環境。在這個意義下，太陽花運動也可以說是把「議會」這個具體的東西當作一個對象，讓貿易協議這個肉眼看不到的、具巨大關係性的複雜網絡，突然之間變得清晰可見。





14
都市的模型



照片上所呈現的，是放置在立法院前靜坐的中心區域、青島東路正中央，用瓦楞紙板製作的立體模型。以立法院為中心，包含建築物在內，重現了東西南北的兩個區塊。仔細一看，模型不只包括既有的建築物，還用紙片與牙籤，製作了集會用的帳篷、轉播車、禁止通行的標誌等等，可以說是佔領開始以來，有關這一帶區域最逼真的模型。模型的周圍有許多原本裝著寶特瓶等物品的空紙箱，旁邊放置的箱子裡，裝著剪刀、美工刀、糰糊、膠帶等等工具。就像個勞作教室一樣。這一定是大人和小朋友一起，在靜坐的空檔中製作的吧！

不論在世界各地的佔領行動或是示威遊行，我從來沒有看到這樣的景象，真的感到非常驚奇。瓦楞紙大顯身手。台灣是水果之國，新鮮的水果大致上都是用紙箱裝著運送，瓶裝水也是如此，因此材料是不怕不夠的。要是不知道實情的人，還會以為這是一般市民的工作坊，主題是瓦楞紙和文具的功用呢！

瓦楞紙的厚度，可以有各式各樣的用途。周邊與政府有關的建築物外面，滿滿地架設了纏著鐵絲網的、鋼鐵製的拒馬。拒馬上面有像刀刃一樣尖銳的凸起，不小心跌倒在上頭就會受傷，但是學生們卻靠在拒馬上讀書，或是彼此談笑。走近一看，原來他們把瓦楞紙板對折鋪在拒馬上，這樣就可以背靠著它而不致受傷。柔軟的紙吸收了鋼







革命的
做法

鐵製的刀刃尖端，防禦用的拒馬變成了簡易的沙發。拒馬上裝飾著向日葵與百合花，還貼著一些小紙片。其中有一張紙片上，印著「柔能克剛」幾個字，正好說明了這次整個運動的基本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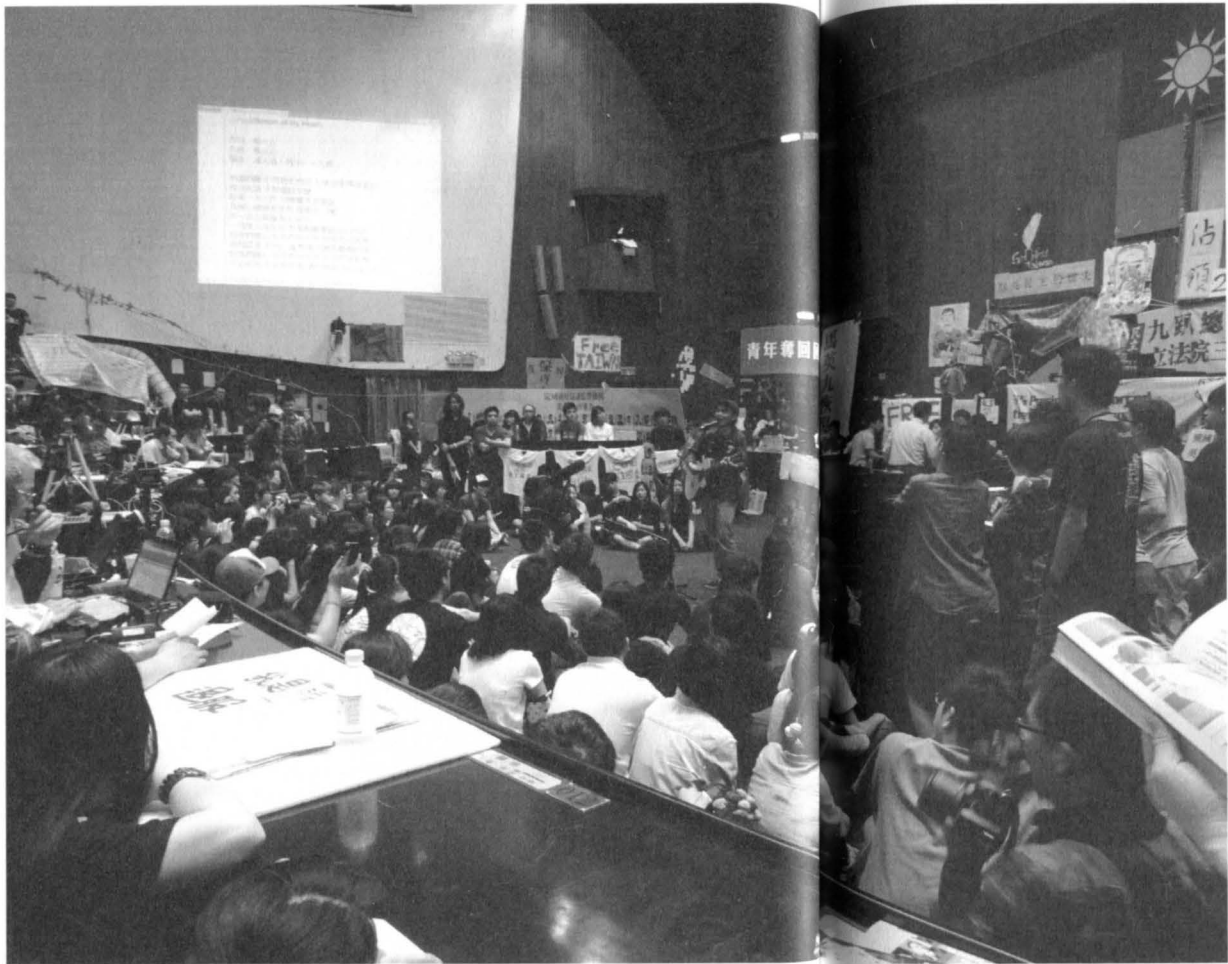


我有一個請求
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
不能流血

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傅斯年，1949

賴澤涵、許雪姬：〈彭孟緝先生訪問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第5期（1994年6月），頁33





〈島嶼天光〉以「滅火器」這個受歡迎的團體為中心製作而成，在佔領的議場內錄音，發布到網路上之後，立刻大為流行。實質上，這是一首抗議歌曲。所謂的「島」，指的當然是台灣。二十四日清晨，天還沒亮的時候，受到警察暴力鎮壓，滅火器的團長楊大正作了這首歌的歌詞，在裡面放進「天色漸漸光」這句話。「換阮做守護恁的人」「已經袂記是第幾工」等等，短短的歌詞裡反映出運動的歷時性關係以及時間的推移。中間出現的「已經不再驚惶」這個句子，同時也是二〇一一年發生的抗議運動中，佔領馬德里太陽門廣場的學生們所喊出來的、在世界各地傳承的一句話。情感的共有，在這樣的地方也可以確認。



〈島嶼天光〉

親愛的媽媽

請你毋通煩惱我

原諒我 行袂開跋

我欲去對抗袂當原諒的人

歹勢啦愛人啊

袂當陪你看電影

原諒我 行袂開跋

我欲去對抗欺負咱的人

天色漸漸光

遮有一陣人

為了守護咱的夢

成做更加勇敢的人

天色漸漸光

已經不再驚惶

現在就是彼一工

換阮做守護恁的人

已經袂記哩 是第幾工

請毋通煩惱我

因為阮知道 無行過寒

袂有花開的一工

天色漸漸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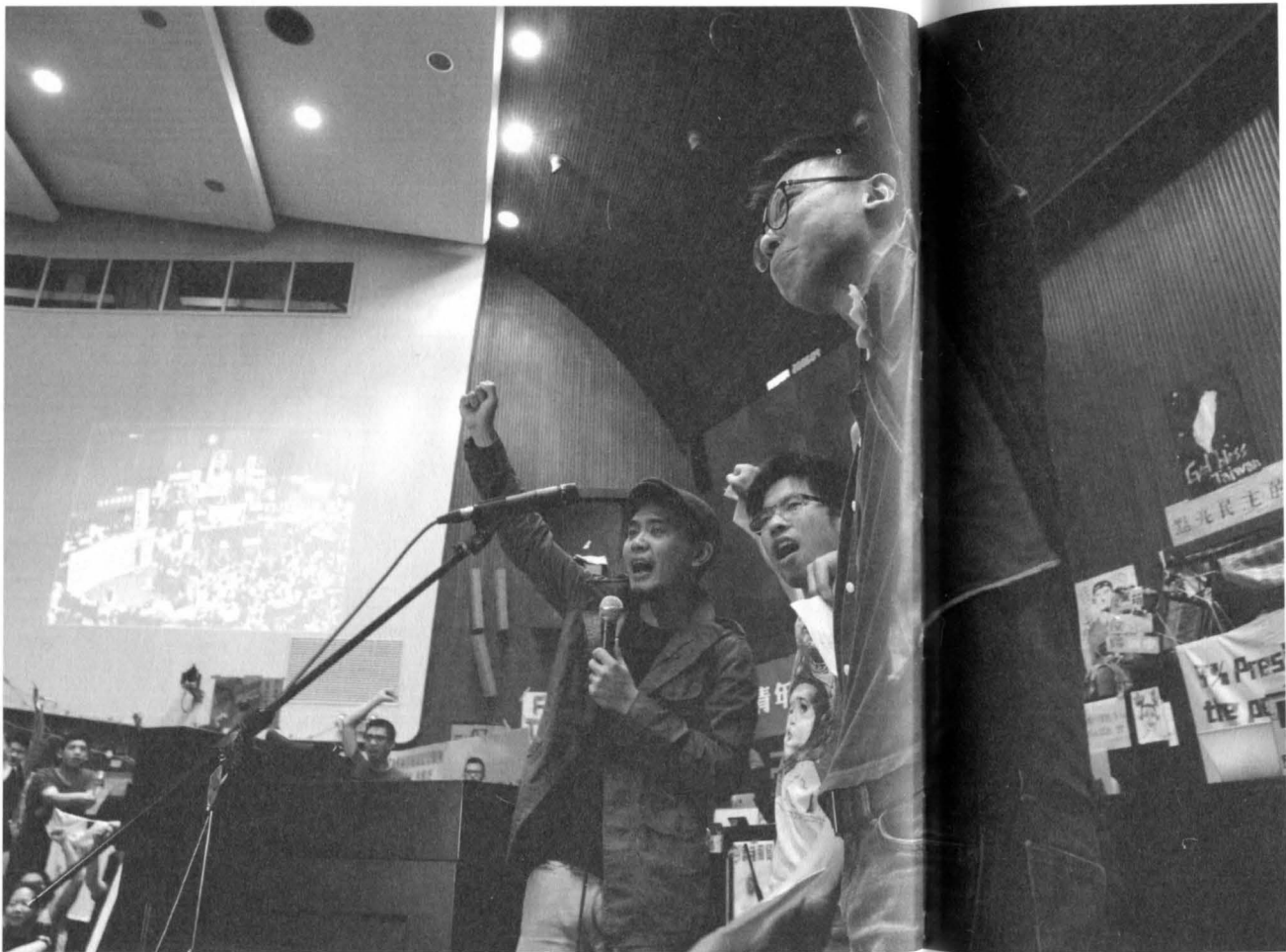
天色漸漸光

已經是更加勇敢的人

天色漸漸光

咱就大聲來唱著歌





革命的
做法

現在是彼一工
勇敢的台灣人

一直到希望的光線
照光島嶼每一個人
天色漸漸光
咱就大聲來唱著歌
日頭一（足百）上山
就會使轉去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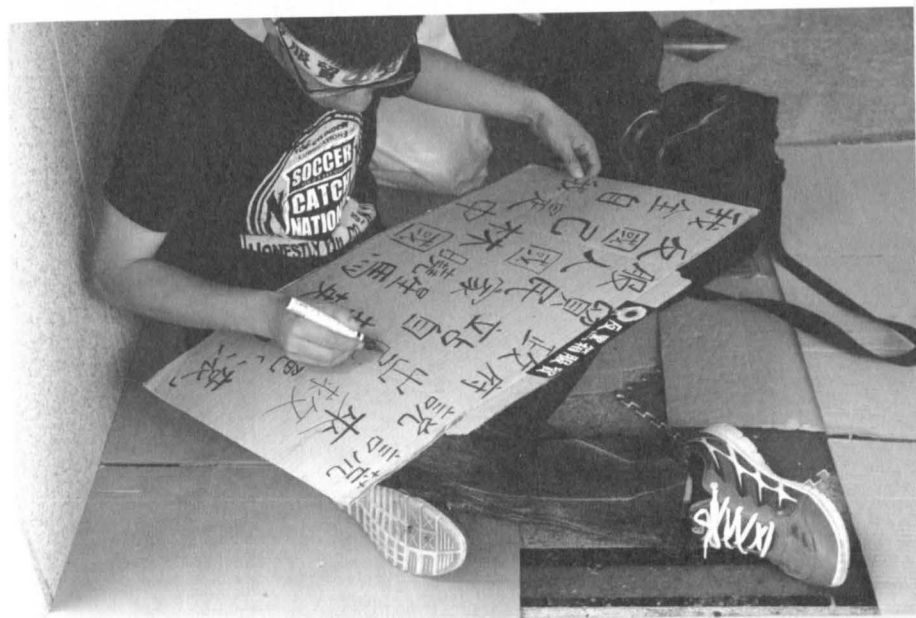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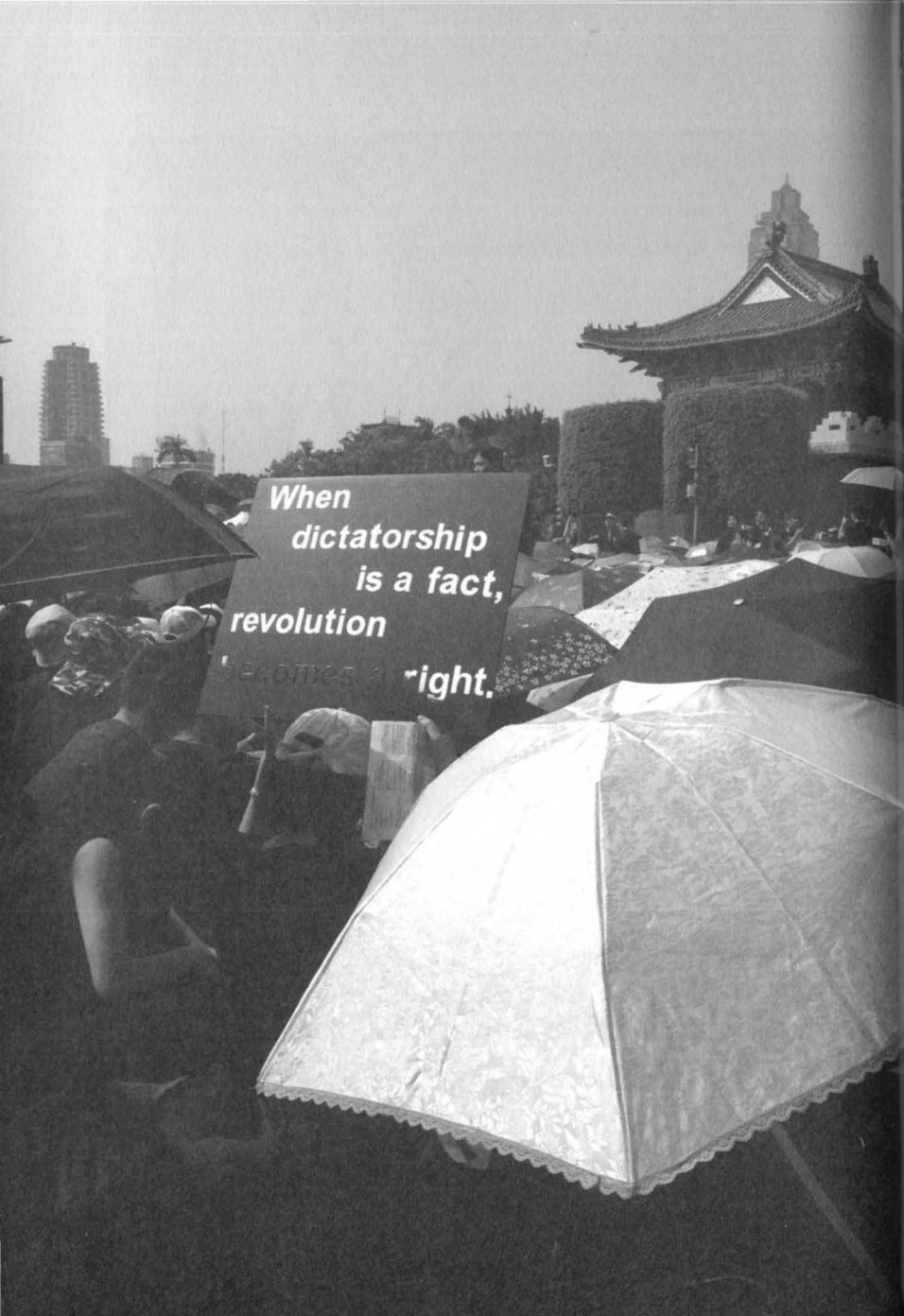


以反黑箱為口號而開始的這場運動，最初的最大成果，是從佔領後不久，就開始轉播議場內的情形，而且一直持續到最後一天。他們不只透過媒體，讓黑箱變成透明，還讓大家看到「轉播」這件事本身。這一點是劃時代的做法。今天我們透過手機或個人電腦、視訊相機、轉播基地的組合，個人要做到影片的同步傳輸，已經是稀鬆平常的事了。但這只不過是技術上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傳輸的影片如果不能考慮到品質，讓觀眾可以理解畫面的內容，就不能構成轉播。如果只是要拍攝的話，監視用攝影機就已經足夠。然而議場的內部設置了媒體部，外部還有負責影像網站的轉播部，提供了高畫質的影像；在這個意義下，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成就。

轉播製造出有趣的環境。學生和總統府之間的對話在議場內也有同步轉播，學生們看著這個轉播的情景，也轉播到外面去。這種情況，就像現實世界在相對的兩面鏡子之間不斷擴大，有好幾種存在的可能。每一個影像如果加上不同的評論，就會產生不一樣的看法。即使是同樣的轉播影像，學生這邊加上的評論，和總統府方面也可能正好相反吧！

換句話說，轉播的技術越是普及，影像本身的可信度越是動搖。乍看之下這好像是一種矛盾的說法，事實上並不是。這是和複製技術同時產生的基本問題。複製必定

帶來差異。然而如果只是少許的差異，我們不妨把它們當作是同樣的東西。對複製來說，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容許差異到什麼樣的程度。複製也是一種轉換，既然是複製，就必須讓原始檔案和拷貝之間，轉換的幅度限縮到最小。所謂轉播，就是同步進行的、現實的複製技術，這裡面還殘留著轉換的空間。





隨著參加、聲援運動的人不斷增多，街道上也滿是各式各樣的文字。還好網路上的交談與通信在街道上看不到，要是這些言語也物質化的話，這個都市就要被——照著字面的意思——文字的洪水淹沒了吧！因為文字的群眾，由群眾而生。

大馬路的柏油路面上貼著白色的紙張。好幾個人蹲在地上閱讀。仔細一看，那是聲援者透過電子郵件傳送過來的聲音，且主要是從日本寄來的電子郵件整理在一起列印





10 | 譯註 | 馬歇爾·麥克盧漢 (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加拿大出身的思想家、評論家、教育家，以有關媒體的理論知名。

出來的。其中大多數的訊息表示，東日本大震災時台灣人立刻給予日本支援，現在換成日本人想要支援台灣。這是為了讓大家可以路上閱讀，特地用幾十張列印紙拼起來的。如果是手機或個人電腦上的訊息，就只有個人可以看到，但是把它化為肉眼可見的物質，街道就變成了告示板。

另外有一天，我遇到了一個人拿著電子看板到處走動。就像我們常常在店裡看到的，那種數位化的文字顯示方式，仔細一看，那是一個一個電燈泡，以奇妙的方式組合起來的。它是用飲料空罐對半切開，中間裝著LED燈泡做成的。我詢問拿著看板的那個人，原來顯示用的線路板也是他自己做的，整個看板完全是DIY的。

像這樣的意見的表達，街道上到處都是。光是發現、閱讀這些意見，就給人彷彿迷失在巨大畫廊中的感覺。一個一個人，找到可以表達他意見的文字，把它寫下、張貼出來，只是這樣，整個都市就變成一個「議場」。群眾的言語不只是在電視畫面上播出的口號而已，把語言物質化所下的工夫，本身也是一種訊息。媒體就是訊息。人們已經忘卻的，馬歇爾·麥克盧漢¹⁰的話語，就浮現在台北的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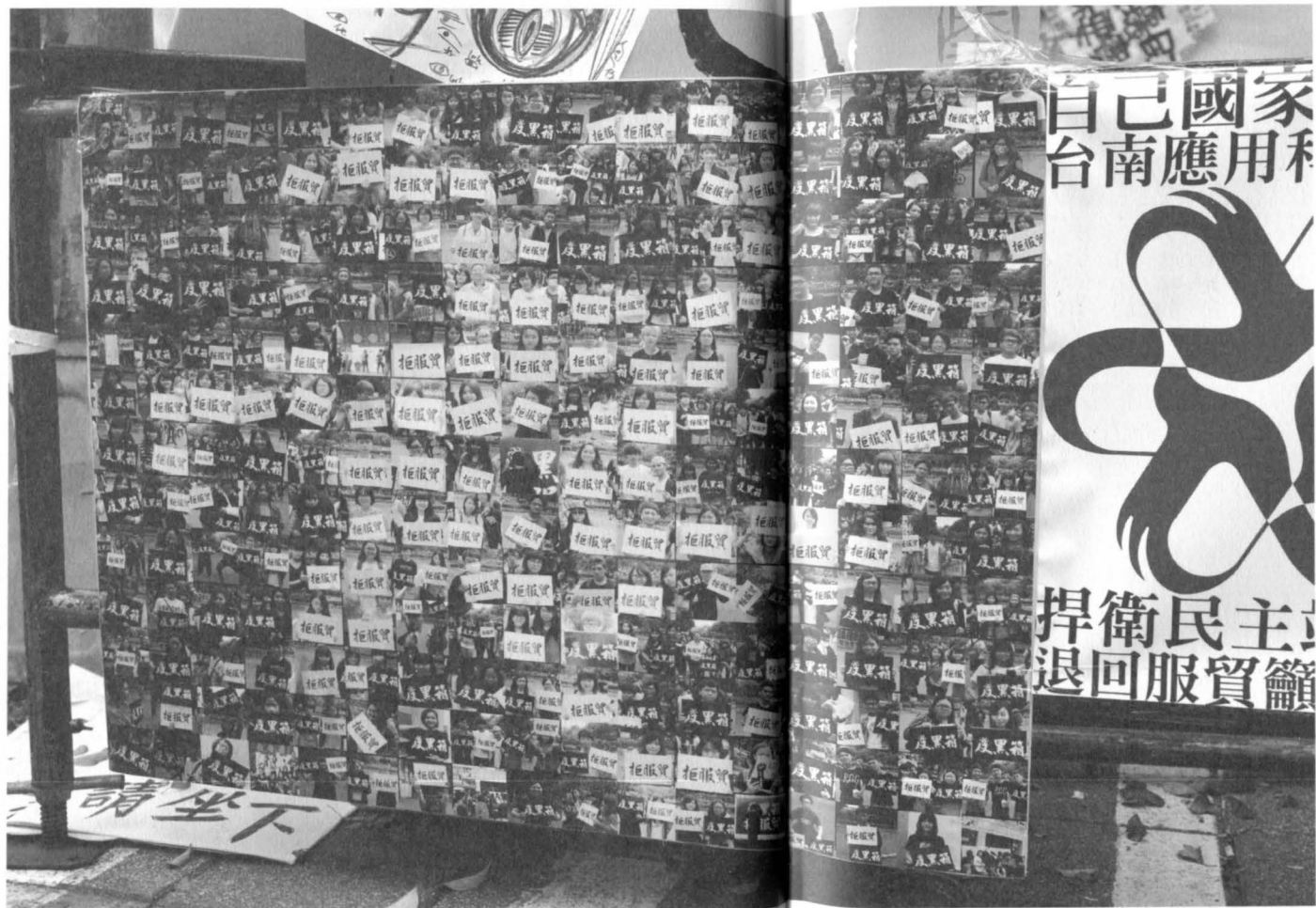




配合了三月三十日的示威，《紐約時報》的國際版刊登了全版的廣告。黑色的紙面上，只印著二十四日凌晨，被警察鎮壓的學生們的照片，還有「凌晨四點的民主」（Democracy at 4 am）這樣的標題而已；設計很簡單，卻非常具有衝擊力（請參考37頁）。版面的下方用小小的字寫著，刊登廣告的費用來自市民的捐款。「凌晨四點的民主」在網路上已經是有名的一句話，透過《紐約時報》的刊載，更試圖向國際的讀者們發聲。照片的力量發揮的方式，要看它在什麼樣的脈絡下被共有。示威隔天，台灣的日報紛紛推出特集，大量刊載了示威群眾的面容，但是以視覺的效果來說，還是紐約時報那幅廣告的力量，遠遠強大許多。

然而以量的方面來說，讓更多人共有的，是參加示威的人自己用手机拍的照片吧！一想到這麼龐大的數量，各自保管在個人的手機裡，可以說最大的存檔（archive）就是手機了。那並不是統一集中在一個地方，而是保管在數十萬個個別的場所。三十日夜裡舉行的群眾晚會，在這個意義下也充滿象徵意味。聚集在全國廣場或大馬路的群眾，一起打開手機內建的燈光，好像被探照燈照到那樣地明亮，令我大吃一驚。那彷彿是一個訊號，告訴我們這無數燈光中的每一個都內藏著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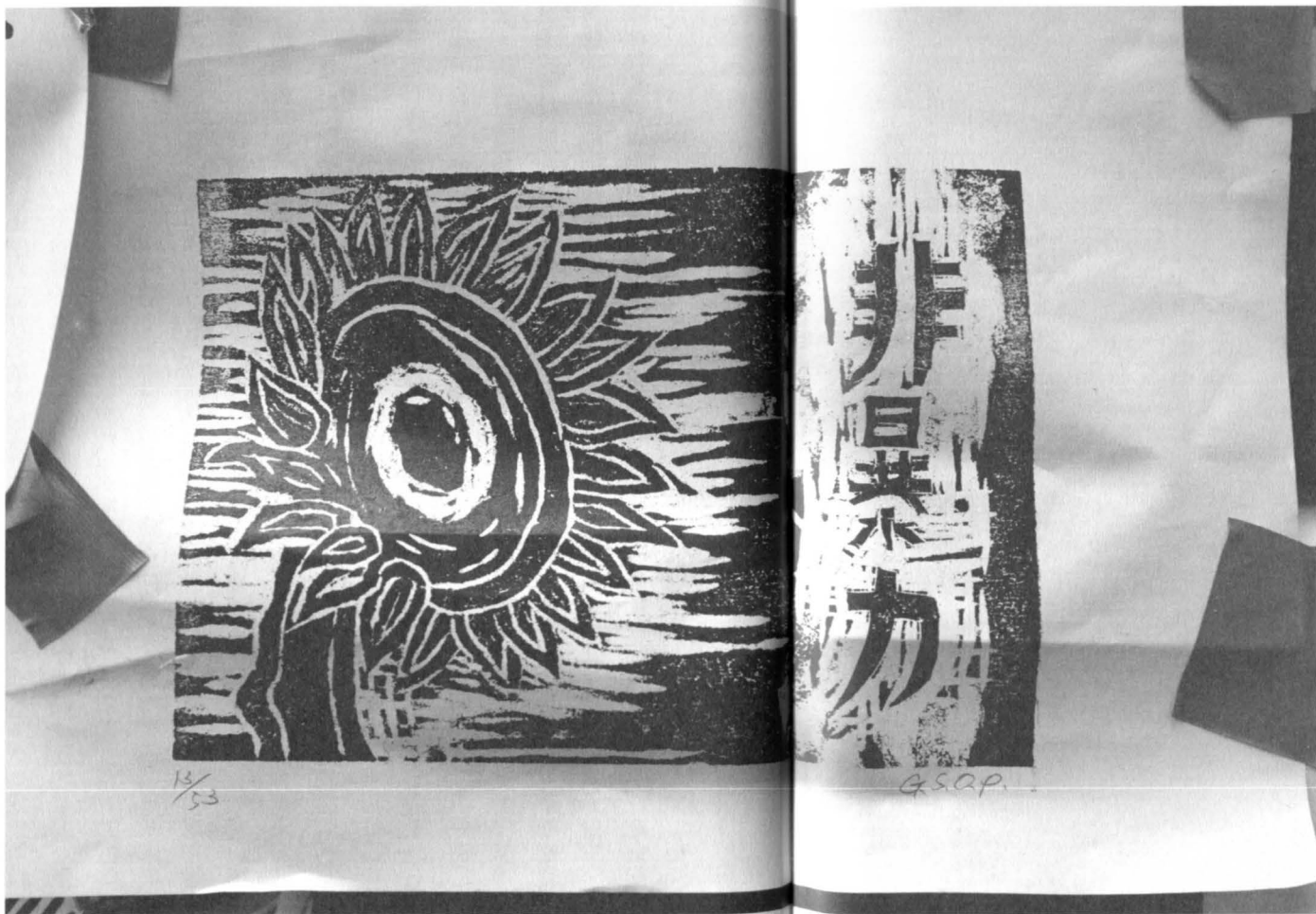
說不定太陽花運動是歷史上照片最多、影像紀錄時間最長的運動。問題在於，這些



紀錄將會以什麼樣的形態保存下來？分散型的紀錄，有它的限制。經過一段時日，時間與空間的秩序將會變得曖昧不明。以結果來說，大概也會像十九世紀的革命那樣，只留下概論式的記述而已吧！記憶的殘留和技術的品質或紀錄的量，並沒有比例的關係。只有在現實的脈絡中為記憶尋求定位，闡明該記憶和其他場所、其他時間的關聯性，人類在這樣的努力中，記憶才會保留下來吧！







藍天化為畫廊，青島東路的牆壁上張貼了引人注目的作品。那是單色印刷的版畫，和手畫的插圖、手寫的標語擺在一起，具有一種特別的力量。粗獷的線條與手刻特有的文字，讓人感覺到灌注在雕刻刀裡的力量，好像突然從別的時代傳送過來的一樣，給人不可思議的存在感。

我腦海裡首先浮現的的是一種在中國製作的木版畫，稱為「木刻畫」。一九三〇年



代因中國文學家魯迅主導而知名的木刻畫，作為一種具體的表現形式，在當時抗日運動中大放異彩。不過當時內山嘉吉¹¹在上海舉行的版畫技術講習會，也是一個契機。繼續聯想下去，不禁令我想起影響魯迅的凱綏·柯勒惠支¹²的作品。據說魯迅是透過艾格尼絲·史沫特萊¹³，接觸到畢生描繪普法戰爭、第一次大戰、第二次大戰等動盪時代的柯勒惠支的作品。一九三六年魯迅親自編纂了《凱綏·柯勒惠支版畫選集》，並且致贈中野重治¹⁴，使得日本的一部分人也認識了柯勒惠支。順帶一提，沖繩的佐喜真美術館藏有柯勒惠支的作品，以前在北京舉辦凱綏·柯勒惠支展的時候，曾經把館藏的版畫作品借給北京展覽。這些過去的事，一件一件出現在我的記憶裡。

手刻的版畫和現代的電子影像正好相反。複製的技術沒什麼不同，但是張數是有限的，這和經由網路傳送的照片不一樣。然而從一九三〇年代開始，一直到四〇年代，版畫是抗暴民眾的武器，在治安維持法鎮壓下的日本，也從柯勒惠支的作品得到莫大的勇氣。沖繩反抗美軍基地的美術館，也共有同樣的情感；然後在北京的展覽，也帶給中國的年輕藝術家感動……影像以出乎意料的旅行方式，發揮它的力量。

仔細觀看青島東路的版畫，畫像一頭有鉛筆寫下的數字。那是版畫作品一定會記錄

的印刷張次；也就表示作品是一張一張印刷，直接貼在路邊。畫作本身很優秀，透過寫下數字，作者也有意識地提示，它和電子影像的流通與共有方式不同。把力量直接刻進木板的版畫，身手依然矯健，和轉播車、網路傳送放在一起，沒有任何扞格。那是藝術潛藏的力量。

11 | 譯註 | 內山嘉吉(1900-1984)，魯迅的日本友人與支持者，內山書店社長內山完造之末弟，曾經擔任美術教師。於內山完造過世後，接任內山書店社長。

12 | 譯註 | 凱綏·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1867-1945)，德國表現主義版畫家與雕塑家，二十世紀德國最重要的畫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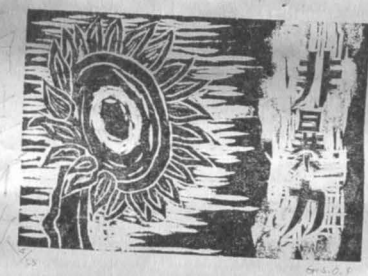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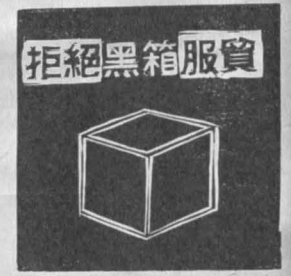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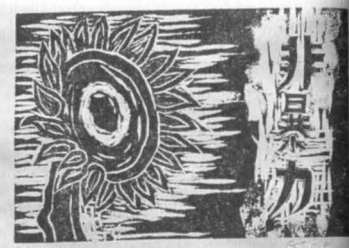
13 | 譯註 |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1892-1950)，美國著名左派記者，以對中國革命的報導著稱。她支持女權、印度獨立、以及中國共產主義革命。

14 | 譯註 | 中野重治(1902-1979)，日本小說家、詩人、評論家、政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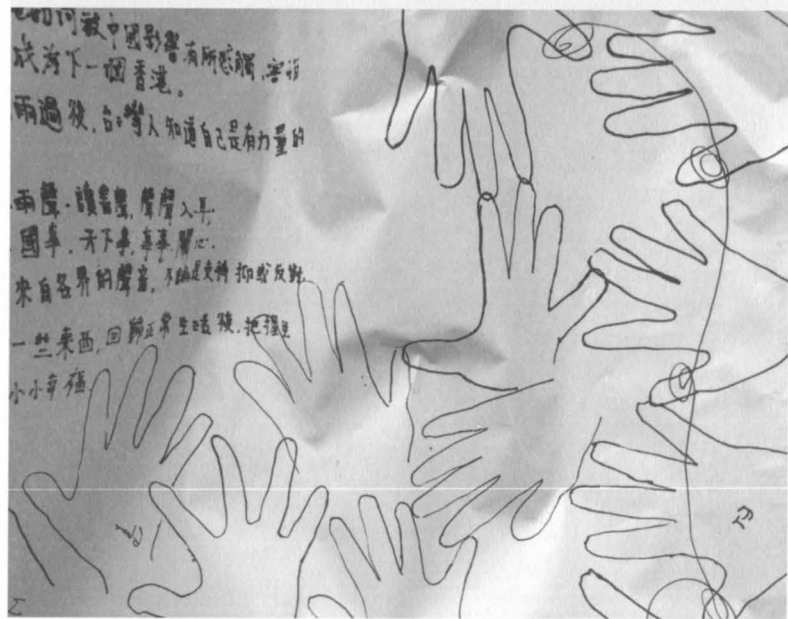
!!! WATCHING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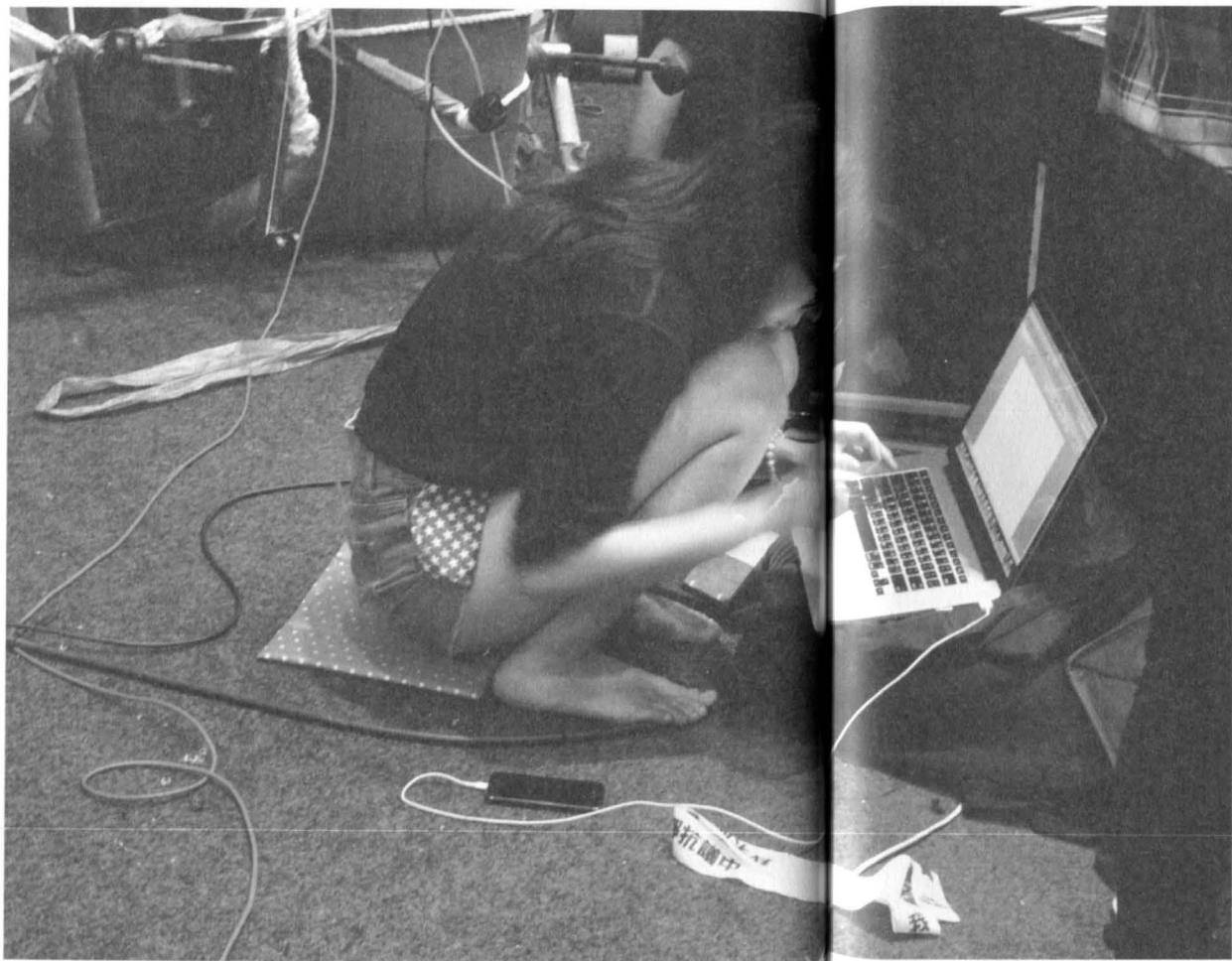
!!! WATCHING !!!



北約大 + 華南大 挺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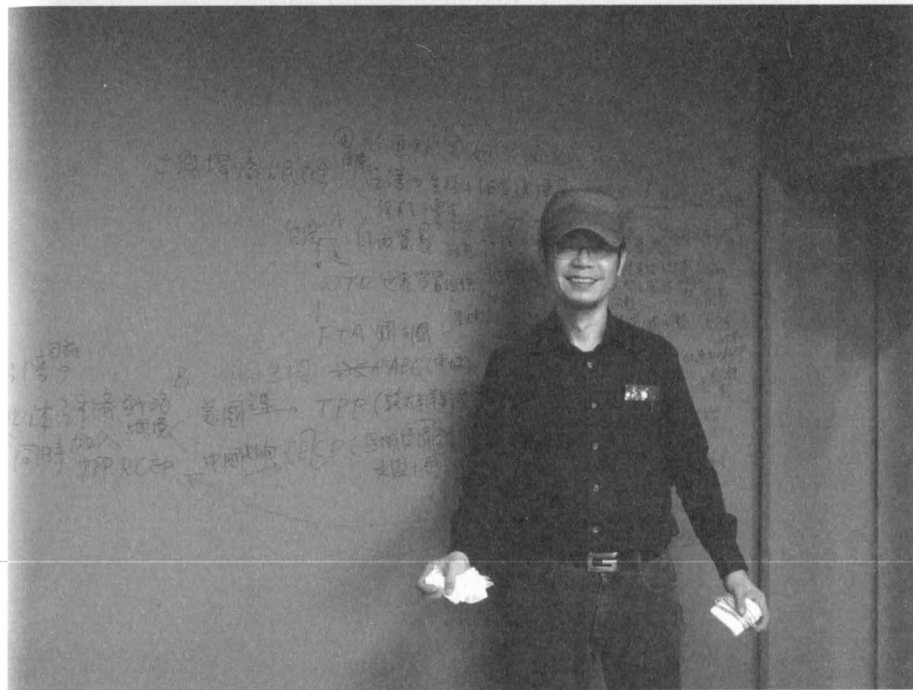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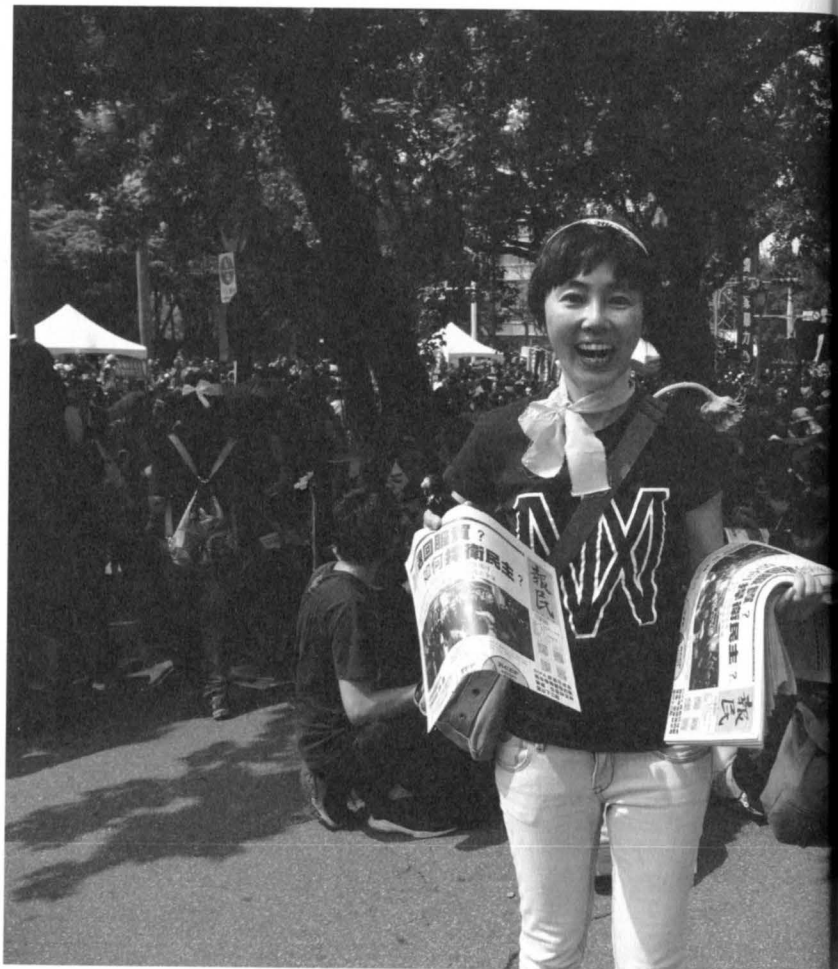
因為佔領，街道顯露出看不到的次元。街道在今天，不只是為了人或物流通的場所。隨著各種資訊流通，人或物的關係也跟著變化。毫無疑問地，公共空間早晚會變成「物品的網路」。就算沒有準備特別的積體電路或設備，記載著條碼或「RFID」的傳單四處張貼在議場的牆壁與鐵絲網上，都可說是為了聯結場所與資訊所下的工夫，但是，這裡面也包含了不經由電腦，物品與物品的直接聯結吧！「物品的網路」將會擴大物品所具有的關係性。在議場與路上可以看到的，物質與資訊與人的相互交織，預示了今後充滿創意的環境。





革命的
做法





革命的
做法



《報民》是為了在三月三十日的示威中分發，由支持太陽花運動的大學教授與藝術家團體，在短時間內所製作出來的媒體。他們認為在運動擴大、議題變得多樣化的時候，必須要以簡潔的方式提示重要的論點，因此製作了一份「報紙」，以單純的方式來解說「服務貿易協議」的問題點和運動的訴求。一張紙對折，前後一共四頁；翻過第一頁之後，內頁出現大大的空白。剩下的頁面也都是空白，雖然像報紙那樣畫有欄



為何退回服貿？ 如何捍衛民主？

我們必須捍衛公民社會，保障台灣生存的價值選擇
因此，我們要求重新立法、公民審議、召開國是會議



台灣與中國簽訂 ECFA 是自由貿易的「例外」狀態

自由貿易→WTO世界貿易組織→FTA 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協定(需由國
WTO)，目前目前已與國簽訂 FTA(台巴、台日、台韓 FTA)，但
有別於 FTA，ECFA 是一種與國與國關係的貿易協定。



WTO 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國際間最權威的貿易組織，由123個國家組成，佔世界貿易額的98%。
FTA 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是國際間最權威的貿易協定，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簽署，旨在消除貿易障礙，促進貿易自由化。
ECFA 兩岸經貿合作協議(ECTA)是台灣與中國簽署的貿易協定，旨在促進兩岸經貿合作，但並非自由貿易協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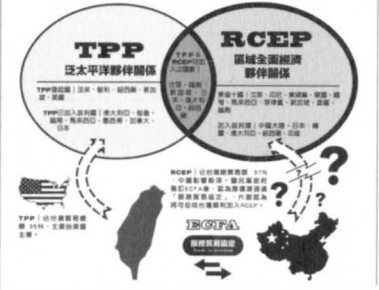
國際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主要目的，在於
國與國之間各自對其發展發展的需求，
穩定自身經濟上之選擇，而與他國簽署的
國家或國際組織簽署的。因此，與中國簽署的
字樣都屬於內部的經濟關係。
雖然我們不反對與中國簽署貿易協定的
必要，但是，在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前，
以國際貿易協定之，所以必須先立法審查

台灣目前的總體經濟戰略與困境

- 目前政府認為台灣應向加入兩種區域經濟組織。
1) TPP (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 - 佔台灣貿易額 35%，主要由美國
主導，民選黨加入。
2) RCE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 佔台灣貿易額 57%，中國影響
深。

目前政府認為台灣應向加入兩種區域經濟組織。
1) TPP (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 35%，主要由美國
主導，與美國關係、經濟關係、投資等主權
外，也針對政府採購、勞工、正統問題、環境
問題等打聽，民選黨加入。
2) RCE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57%，中國影響
的極深 (中、日、韓、澳大利、紐西蘭、

(附註)：依中華經濟網際 17%，以中國為主，
經濟關係。因此政府以加入 ECFA 為前提，認為
這將使台灣在未來投資之信心大增，
進而吸引投資及高科技人才，
以建立統一市場的自由
貿易區。 (李遠達，2014/9/24)



回歸公民社會，排除中國影響下不明確的協議效應

- 1) 重新立法：a. 依據憲法 63 條 b. 比照 TPA 模式，建立事前
審議、事參與與事後監督的機制。
2) 公民審議：a. 經 ECFA 與服貿相關協定為重要事項，
4000 個小時以上的公民審議會議。 b. 經 ECFA 與服貿相關
協定為兩岸特殊關係架構，並且建立公民參與與審
議、進行全體 4000 個小時以上的公民審議會議。
3) 如果上述兩法無法達成，我們要求召開國是會議，編之為
4000 個小時以上的公民審議會議。 b. 經 ECFA 與服貿相關

重新立法：a. 依據憲法 63 條 b. 比照 TPA 模式，
審議、事參與與事後監督的機制。
公民審議：a. 經 ECFA 與服貿相關協定為重要事項，
4000 個小時以上的公民審議會議。 b. 經 ECFA 與服貿相關
協定為兩岸特殊關係架構，並且建立公民參與與審
議、進行全體 4000 個小時以上的公民審議會議。
3) 如果上述兩法無法達成，我們要求召開國是會議，編之為
4000 個小時以上的公民審議會議。 b. 經 ECFA 與服貿相關
協定為兩岸特殊關係架構，並且建立公民參與與審
議、進行全體 4000 個小時以上的公民審議會議。
3) 如果上述兩法無法達成，我們要求召開國是會議，編之為
4000 個小時以上的公民審議會議。 b. 經 ECFA 與服貿相關
協定為兩岸特殊關係架構，並且建立公民參與與審
議、進行全體 4000 個小時以上的公民審議會議。

報民

今日大報 每份定價 0.5 元 廣告費
創辦人 羅長平
發行人 羅長平
地址：(3330) 高雄橋南大橋
發行專線：0930-2014
零售每份：20000份
訂閱專線：0930-2014

ECFA 目前已成為 兩岸特殊關係的新 架構，但是缺乏考 量以下三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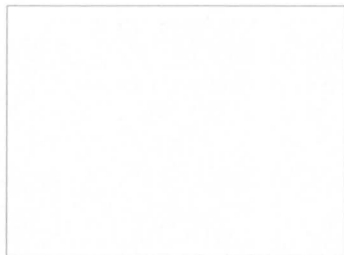
- 1) 法制上的合理結構與程序。
2) 經濟上的利害與風險，勞動就業與社
區文化衝擊影響評估。
3) 國家安全問題。

ECFA 與服貿協定，係依據 WTO 所訂
的貿易自由化原則，簽署 (Harmon Trade
Agreement) → 2015 年加入 RCEP。
政府分析認為透過 ECFA 的基礎上，擁有中國的
條件，仍可加入 RCEP，因此政府認為可以
加入 RCEP，以達到國際化目標。但事實上
內政與保衛，政府所簽署的保護呢？

重新立法：a. 依據憲法 63 條 b. 比照 TPA 模式，
審議、事參與與事後監督的機制。
公民審議：a. 經 ECFA 與服貿相關協定為重要事項，
4000 個小時以上的公民審議會議。 b. 經 ECFA 與服貿相關
協定為兩岸特殊關係架構，並且建立公民參與與審
議、進行全體 4000 個小時以上的公民審議會議。
3) 如果上述兩法無法達成，我們要求召開國是會議，編之為
4000 個小時以上的公民審議會議。 b. 經 ECFA 與服貿相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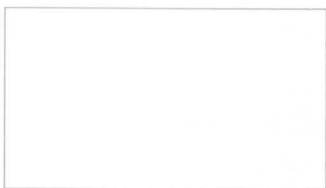


位線，卻沒有報導的內文。標題是學生對政府所提出的四項要求。在空白的地方，我們將讀到什麼？《報民》要求讀者發揮想像力。尖銳的設計，使它成為一種媒體藝術。雖然印刷了兩萬份之多，示威當天很快就全部發送完畢。取而代之的，是在《報民》網頁下載的 PDF 檔，可以用智慧型手機一邊行走、一邊閱讀。紙本是中文的，網路版還有英文版本。後來我也幫了一點忙，製作了網路版的日語版本。以下收錄的，是原始版本以及日語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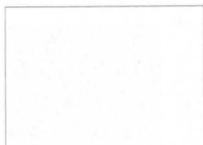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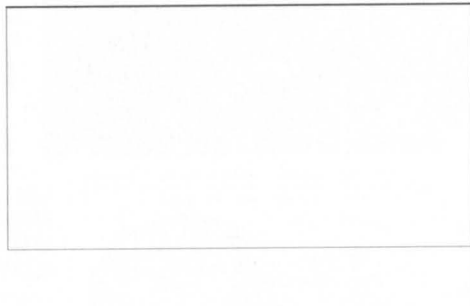
重新立法

依據憲法 63 條，視 ECFA 與服貿相關協定為國家重要事項
 比照 TPA 模式，建立事前審核、事中參與與事後監督的機制



公民審議

相關協定為國家重要事項，設立公民論壇。
 視 ECFA 與服貿相關協定為兩岸特殊關係架構，並建立公民參與審議管道。





報民

遍地開花 [日本語版]

なぜ「サービス貿易協定」は撤回すべきか? いかにも民主主義を擁護するのか?

私達は公民社会を擁護し、台湾が生存するための価値の選択を保障する! そのために、私達は法律制定、公民審議、国会会議の開催を要求する。

台湾と中国とのEFCA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経済協力枠組み協定) の締結は、自由貿易の「例外」状態。

自由貿易⇒WTO世界貿易機構⇒FTA自由貿易協定(WTOに報告する必要あり)。現在台湾は4国とFTAを締結(パナマ、グアテマラ、ニカラグア、エルサルバドル)・ただしFTAとは違い、ECFAは、国と国との関係を回避する貿易協定である。



WTO | 世界貿易機構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は、現在もっとも重要な国際貿易組織。2013年3月まで加盟国数が159あり、また加入申請中の国は25ある。台湾は、2002年1月1日に正式にWTOの会員になり、現在29国が二国間の協定を計画している。

FTA | 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は、2国間または2国間以上と地域貿易実体の間に法律に制約されている契約である。台湾と中国との主権の競争と中国に長期的に外交に圧力をかけられるため、台湾は4国(パナマ、グアテマラ、ニカラグア、エルサルバドル)しか締結してい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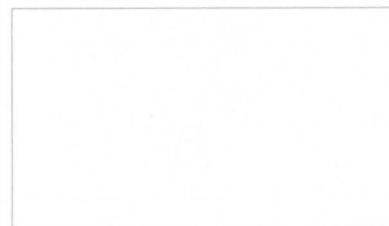
ECFA | 経済協力枠組み協定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元の名称は「兩岸綜合經濟協力協定」または「兩岸綜合經濟協力協定」(CEC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この協定は、中華民国(台湾)政府が2009年に提案し、積極的に推し進めている経済協定。協定名の「兩岸」は、台湾海峡の両側の中華民国(台湾)と中華人民共和国(中国)の意味である。2010年1月6日に、中華民国(台湾)の大統領馬英九がECFAの正式名を兩岸經濟協力枠組み協定と宣言したが、FTAとは違う。台湾が中国と締結したECFAとは、実は「国と国との間の関係を規程する」貿易協定である。FTAとの違いは、FTAを締結する国はWTOに報告する必要があるが、台湾と中国とのECFAは、WTOに報告する必要がない。このために国際社会に不満を引き起こした。

国際間に自由貿易を締結する主な目的は、国と国の間にそれぞれが産業の発展の将来像を予想し、自身の政策の優位順位を計画してから、他の国とのお互いの信頼関係を協議し、経済と国際貿易の手段を通じて、本国内部の産業構造を改めることである。

私達は、中国との貿易協定に関する交渉の必要性には反対していない。しかし、台湾と中国はお互いに国と国の関係を樹立していないため、中国との協議に関する締結の法的な基礎として、まず新法案を作成する必要がある。この事に対して、関係法案と監督システムが不十分な状況で協議を急いでしまうと、元来政治色の強いEFCAは、法律や社会的な緩衝がない状況下では、直接中国が台湾へ内政干渉するための貿易手段となってしまう。

召開國是會議

我們要求召開國是會議・視之為憲政危機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戰爭中戰敗，把台灣割讓給日本；整個20世紀前半，台灣被帝國主義日本佔領。1945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迎接它的「光復」；被中國共產黨趕出大陸的國民黨接收了台灣。在東亞冷戰結構的背景之下，台灣的戰後史，基本上隨著它和中國大陸的緊張關係發展；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最後。以這樣的歷史為背景，讓我們對太陽花運動所傳承的、學生參與反抗運動的系譜，作一個簡單的素描。

1947年2月，中華民國憲兵隊射殺台灣人，對抗議的示威隊伍開槍，引發了全島人民起義的「二二八事件」。學生一方面進行武裝抵抗，同時和國民黨政府交涉，並且維護治安。雖然二二八事件在國民黨軍隊的鎮壓下結束，但是受到社會主義影響的學生們繼續反抗內戰、貧困、政治體制、以及國民黨的壓制。1949年4月國民黨對學生運動進行鎮壓，即所謂的「四六事件」。四六事件之後，進入白色恐怖時期，知識份子與學生的聲音完全遭到抹殺。

1963年學生發起「自覺運動」，批判人們對社會的冷漠，呼籲參加社會活動。但是因為組織擴大，引起政府的警戒，最後以叛亂罪的罪名進行鎮壓。1969年，因為美國承認日本領有釣魚台群島（日方稱為

尖閣諸島）的契機，學生們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從台灣大學擴展到全國的校園，並且舉行示威。當初帶著愛國運動色彩的運動，逐漸發展成對政府的批判。也有部分學生轉向左派。

1970年代前半，政府解雇自由派教員，即所謂「台大哲學系事件」，繼續打擊運動。社會意識比較強的學生，開始在校外參與黨外運動。

1980年代，學生團體提出大學民主化的問題，並且聲援反公害等等社會運動。1987年戒嚴令解除以後，隨著民主化的進展，學生團體間的串聯也更加強化。

1990年發生「野百合運動」，六千名大學生靜坐一個星期，並且絕食，要求政治經濟的改革。最後李登輝接受了學生的要求。

野百合運動之後，學生運動的對象從政治問題逐漸移向社會問題。1990年代前半以大學法修正運動為中心，展開學生參與校務、廢除軍事教育等等議題。1994年文化大學學生反對不當退學，佔領了美術系。另一方面，參與環境問題、農民運動、反核等等社會問題的學生，也不在少數。然而，1997年的「芒花學生運動」^{註1}，2004年的「孤挺花運動」^{註2}，在從政治問題朝向社會問題的轉換中，以失敗收場。

2000年以後，大學自治、反對學費上漲、反核、樂生療養院保留等等，各式各樣的運動都有學生的參與。2008年因為反對馬英九政權對集會自由的限制，發生了「野草莓運動」。雖然最後以敗退收場，但是以此為契機，全國各大學大量成立運動組織，年輕的運動者也參加各種運動，進行串聯，形成了太陽花運動的基礎之一。

2 原註

1 原註
一九九七年五月，學生組織藉著市民示威（針對治安問題）的機會，進行靜坐抗議，但是為了訴求的焦點是要放在撤換內閣或是性別問題上，形成分裂，在五天之內收場。
發生於二〇〇四年四月，有幾個學生（未滿十人）懷疑總統選舉中有不當情事，進行靜坐抗議。關心並參與社會問題的學生運動組織試圖介入，但遭到國民黨支持者拒絕。

代表民進黨參選的陳水扁在總統選舉中獲勝，成就了中華民國（台灣）史上第一次的政黨輪替。



2008年 5月

國民黨參選人馬英九在總統選舉中當選，國民黨奪回政權。

國民黨名譽主席吳伯雄，以執政黨黨魁身分訪問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進行會談。這是國共內戰以來，中華民國執政黨黨魁首次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

6月12日

第一次江陳會談在北京召開，由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中國方面的對口機關）會長陳雲林，以及海峽交流基金會（台灣方面的對口機關）理事江丙坤擔任代表，針對有關兩岸觀光及直航問題進行協商。

11月4日-6日

第二次江陳會談在台灣舉行，討論「三通」，也就是直航、海運、郵務等議題。

11月6日

野草莓運動：學生在行政院前靜坐抗議。起因江陳會談會場——台北圓山大飯店周邊過度的警備以及強制驅離行動，造成市民受傷的事件；運動以集會自由等等為訴求，一直持續到2009年1月4日為止。其後轉入校園內，繼續發展。

2010年 6月29日

經過第五次江陳會談的協議，正式在中國重慶締結「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其第四條的內容為：「雙方同意，在第八條規定的『服務貿易早期

收穫』基礎上，不遲於本協議生效後六個月內就服務貿易協議展開磋商，並儘速完成。」

2011年 2月22日

ECFA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在其例會上宣布，開始有關「服務貿易」之協商。

2012年 7月25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有條件通過親中媒體「旺旺中時」集團「併購中嘉網路案」。針對此事，黃國昌等學者召開記者會，提出反對的意見。記者會之後，一百名以上的學生與教師在 NCC 前抗議。

8月9日

第八次江陳會談。陳雲林主張兩岸經濟一體化之必要性，雙方締結「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與「海峽兩岸海關合作協議」，並且決定「服務貿易及其摩擦之緩和與解決」為下一次的議題。

9月1日

大約一百個民間團體，一萬人參加反媒體壟斷示威。

11月26日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併購「壹傳媒」案正式簽約。數百名學生在行政院前靜坐抗議到隔日。11月29日，千人以上的民眾在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前示威。「反媒體壟斷運動」獲得海外台灣人留學生的聲援。12月31日到1月1日，總統府前舉行千人以上的示威。

2013年 2月20日

旺中併購案因為不符合 NCC 的條件而失效。3月26日，「旺旺中時」媒體集團



- 3月27日 國民黨召開黨員大會，討論有關兩岸服務貿易之議題。
- 6月20日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締結前夕。
前中華民國國策顧問郝明義（大塊文化董事長）發表〈我們只剩下二十四個小時〉一文，他於文中對於政府不和與此協議有關的業界協商，僅於簽約前夕「告知」業者的做法提出批評。他認為服務貿易協議所造成的兩岸出版、印刷業的開放，將對台灣的業界造成衝擊性影響，並且帶來危機。社會上開始提高對於服務貿易協議的關心。
- 6月21日 第九次兩岸會談，簽訂服務貿易協議^{註3}。
- 6月25日 黨團協商會議結論，未經立法院表決認可的服務貿易協議之簽訂無效。
- 7月27日 「反黑箱協議，要生存權利」全民大會：回應服務貿易協議臨時審查會，超過二十個公民團體在凱道前舉行集會。
- 7月28日 民主團結之夜：回應服務貿易協議臨時審查會，超過二十個公民團體在立法院前集結，提出「反對黑箱，守護民主人權」的訴求。
- 7月29日 立法院臨時總會（第二次臨時審查會）：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核四公民投票案將進入7月30日的大會議案討論。
- 7月30日 立法院成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公聽會」臨時總會。
全國各大學學生成立「佔領立院，奪回未來——青年反服貿行動」。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全國學生聯盟）在立法院前發起學生示威，主張依產業別舉行公聽會。
- 9月30日 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發起全國學生抗議：內政委員會委員長張慶忠召開服務貿易協議公聽會。相對於三天內八場公聽會的計畫，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提出「停止趕場公聽、退回黑箱服貿」的要求。
- 10月9日 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在總統府前發起學生示威，10日清晨與警方發生衝突，政府方面沒有作出反應。
- 12月中旬 「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與「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等團體舉行記者會。
民進黨籍黨員要求制定監督台灣與中國協議作業的法律。
公民團體在總統府前凱道集結，對政府提出「反黑箱、要監督、顧飯碗、要重談」等要求，訴求明確化。
- 2014年 3月12-13日 國民黨黨員兩度在立法院杯葛：原本排入議程的服務貿易協議審查，因為國民

3 原註一
原本的江陳會談，因為雙方理事相繼辭職，改由林森（台灣方面）與陳德銘（中國方面）擔任代表。因此也稱為林陳會談。

黨的杯葛而停止審議。在議程中排入17日、19日、20日再度召開審查會議。

240



241

- 3月14日 馬英九在獅子會的會談中，談論有關 FTA 的重要性。他舉出紐西蘭加入 FTA 的例子，強調協議的簽訂對台灣的衝擊不大。
▼台灣新三寶之一——馬英九的鹿茸、馬卡茸事件：馬英九在談到紐西蘭產業的時候，說出「鹿茸是鹿耳朵裡的毛」這樣的失言。這個發言在網路上廣為散播，產生了「馬卡茸」這樣的綽號，一方面與甜點「馬卡龍」諧音，一方面揶揄馬英九就像馬的耳朵裡塞滿了毛，聽不到市民的聲音。
- 3月17日 立法院審查會議：內政委員會委員長張慶忠在審查中使用自己準備的麥克風，在三十秒內宣布會議的決議：「出席人數五十二人，已達法定人數，開會，進行討論事項，海峽兩岸服貿協議已逾三個月期限，依法視為已經審查，送院會存查，散會」。
- 3月18日 在野黨在立法院針對服務貿易協議之問題，對議案進行杯葛。
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在立法院前召開記者會。
晚間6點 呼籲民眾參加「守護民主之夜」。
晚間9點 超過一百名的民眾突破立法院的三道大門，佔領立法院。堆積椅子作為屏障，阻止警察進入。
▼18日夜晚，一位不具名人士送了一朵向日葵（太陽花）到立法院，場內的人不經意地把它插在議場的講壇上。之後，參與 318 運動的成員在飾有向日葵的
- 講壇上發言的影像，透過眾多媒體流傳，於是群眾送進更多的向日葵。這場運動的精神，遂以向日葵作為象徵。
- 3月19日 民眾相繼到立法院集結。
凌晨3點 警方暫停攻堅。
凌晨4點 民眾取下「立法院」的匾額。
- 3月20日 佔領立法院的運動人士對總統馬英九、立法院長王金平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在21日中午12點以前回答他們的要求。
下午3點 立法院周圍開始「街頭民主教室」。
- 3月21日 馬總統預定召集副總統吳敦義、立法院長王金平、行政院長江宜樞等人召開院際會商，但因為王院長拒絕出席而流會。
後來，馬總統並沒有對運動者的最後通牒作出回應。
- 3月21日 行政院院長江宜樞在立法院與學生會面，在立法院外與運動代表林飛帆會談。對於抗議群眾的要求，他回答「如果去除（反對的）前提就可以談」。在沒有結論的狀況下結束會談。學生繼續要求馬總統的回應。
- 3月23日 馬總統舉行國際記者會，向媒體強調服務貿易協議的必要性與好處，並且非難佔領立法院是反民主的行為。



- 下午1點 學生重新提出四點要求：「一、退回服貿協議。二、制定兩岸監督條例。三、先立法再審查。四、召開公民憲政會議」。民進黨表態支持。國民黨則呼籲，如果學生不堅持反對的立場，他們就準備對話。
- 晚間7點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舉行罷課投票，全系統一決定罷課。這是太陽花運動最早的學生罷課。
- 3月24日 一部分的學生與民眾佔領行政院。約一千名民眾進入行政院，周邊也有六千人左右的民眾包圍、支援。
-
- 3月24日 凌晨0點，警察開始強制驅離，消防噴水車與鎮暴部隊共出動六次，到清晨佔領群眾被完全排除。造成了大量民眾受傷，數十人遭到逮捕。
- 台灣大學、政治大學等大學呼籲「自主罷課」，數十校的自治會參加。
- 立法院群賢樓九樓召開服務貿易審查會議，但因為國民黨議員全員缺席，議決17日的決議無效。下午立法院舉行黨團會議，但沒有結論。
- ▼塗成黑色的臉書大頭貼照片：行政院強制排除的流血事件發生之後，為表達哀悼之意，許多人把臉書上大頭貼照片改成黑色方塊。方塊中保留了白色的台灣圖樣，表示不要逝去希望的意思。
- ▼台灣新三寶之二——蕭家淇的太陽餅：佔領行政院之後，官員們回辦公室清點財物。這時候副秘書長蕭家淇抱怨「我的太陽餅被吃掉了」。之後，有民眾訂購了三千盒的太陽餅，用宅配送到蕭家淇的辦公室，加倍奉還。但蕭家淇表示，「如果民眾有那個餘裕，可以轉寄到相關弱勢團體」。
-
- 3月25日 再度召開黨團協商會議，仍然沒有結論。馬總統表示只要去除前提，他願意在總統府會見學生代表，聽他們的意見。學生方面以「馬總統還在介入黨團會議，看不到他的誠意」為由拒絕。
- ▼台灣新三寶之三——邱毅的香蕉：前國民黨籍議員邱毅，在中國中央電視台節目「海峽兩岸」中，指著不清楚的照片發言：「你看，一大堆的香蕉。很明顯的。後來我查得很清楚，這些香蕉就是民進黨的黨團送進來的」。但是講壇上放置的黃色物品並非香蕉，而是318運動的象徵向日葵。邱毅的發言引起民眾的嘲諷，成為話題。因此台灣名產的鹿茸、太陽餅、香蕉，變成消遣政客的話題。
-
- 3月26日 針對外界對於暴力驅離的非難，行政院在記者會上反駁：「24日的強制驅離是非暴力的行動」。
- ▼前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一一八年冥誕紀念日，學生在校內舉行紀念活動，出現許多引用傅斯年名言的看板。他在擔任校長時期發生「四六事件」註4大鎮壓，那時，他向當時的警備總司令表示：「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請參考190頁圖)。這一句話正好適合3月24日的流血事件。
-
- 3月27日 第三次黨團協商會議，仍然沒有結論。
- 下午3點 學生在記者會上呼籲民眾參加3月30日凱道前的示威。
- ▼滅火器樂團(FIRE EX.)與台灣藝術大學學生一同創作了歌曲《島嶼天光》，



- 3月29日 馬總統召開記者會，表態贊成國民黨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但是拒絕退回協議本身。
- 3月30日 總統府周邊舉行盛大集會。主辦單位宣稱有五十萬人參加，警方則發表有十一萬六千人。馬總統讚賞集會在和平中進行，但是呼籲早日把立法院還給國民。呼應台灣舉行的「大太陽花」大型示威，海外合計有二十個國家、超過五十個以上的城市，舉行了民主聲援活動。
- 3月31日 行政院公開表示，為了呼應產業界的需求，將舉行「經濟貿易會議」，以取代「公民憲政會議」。
- 4月1日 支持服貿協議的幫派大老「白狼」張安樂，號召兩千人在國會周邊示威。
▼Over my dead body：對於幫派宣布要佔領立法院，在野黨黨員手牽著手在立法院周圍築起人牆。黨員王世堅表示「如果幫派要進入立法院，首先要踏過我的屍體！Over my dead body！」。龐克樂團將此發言編入他們的歌曲，在網路上廣為流傳。
- 4月2日 「賤民解放區」竄起：為了反對議場內由少數人領導的運動模式，非黨派的社運人士在濟南路的公共廁所旁，舉辦「公共廁所解放論壇」。採取直接民主的

方式，由參加者投票決定議論的主題。參加者一旦投票，就有參加到最後的義務；同時規定要尊重所有的意見。討論的主題除了反對服貿協議以外，還包括自由貿易以及來自中國的影響。

- 4月3日 行政院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送立法院審查。
- 4月5日 學生與民眾召開「人民會議」，由公民來「審查」政府版與民間版的監督條例，並將結果做成意見書發表。
- 4月6日 王院長進入議場，發表「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完成立法前，將不召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相關黨團協商會議」之聲明。隨後，國民黨黨團表示不支持王院長的立場。
- 4月7日 佔領立法院的學生決定在4月10日從立法院退場。
大腸花垃圾話論壇：決定退場時，在立法院周邊舉行了「大腸花論壇」（諷刺太陽花），創造出所有人都可以自由發表自己想法的場所，一直持續到4月10日。長期抗爭所累積的壓力得以抒發，並且出現有關性別、少數民族、外國人以及環境問題等等，各式各樣的議論。
▼鄭南榕自焚紀念日。在「台灣獨立=叛亂」的時代，鄭南榕主張台灣獨立，追求「百分之百言論自由」，1989年在企圖逮捕他的警察面前自焚身亡。在大腸花論壇這個具有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場所，現場的年輕人幾乎都是主張「台



- 4月10日 學生的運動代表在發表「人民議會意見書」之後，主要團體（黑色島國青年陣線、農村陣線、教授協會等等）由立法院退場。但是「公投護台灣聯盟」^{註5}則沒有完全撤退。
同時在議場的二樓有一群自稱「奴工」的非黨派運動人士，主張退場未經全員的同意，批判運動決議的產生方式。為了表達批判的意見，他們從二樓散發自己的宣言文件，拒絕從樓梯，而是從窗戶使用梯子退場。
行政院召開與中國的「自由貿易港區（FTZ）」會議。
- 4月11日 清晨，警方以支援太陽花運動為由，取消了公投護台灣聯盟的集會許可，並且予以強制驅離。之後中正一分局局長方仰寧在議會發言：「就算違反憲法，對於公投盟日後所申請之集會皆不予許可」。民眾感於公投盟在運動中的支援以及其抗爭精神，在網路上號召示威「還給聯盟集會權！方仰寧道歉！」當夜，兩千人以上的人群包圍中正一分局，方仰寧道歉，並且撤回決定。
- 4月16日 「守護民主，守護石虎」示威在環保署舉行。
- 4月21日 護樹聯盟在台北巨蛋的工地舉行「守護樹木」示威。
- 4月22日 民進黨前黨主席林義雄（七十二歲）為了廢除核四的主張，開始在義光教會無

限期絕食。義光教會原本是林義雄故居，1980年林義雄作為政治犯服刑期間，其女兒與母親在此遭到殺害。兇手至今仍然不明，據信是與政府有關人士。

- 4月24日 公投護台灣聯盟呼籲，核四停建與否由全體國民決定。
- 4月26日 連續兩天的反核示威：「NO NUKE NOW 反核接力」在總統府周邊舉行，參加者約有七千人。
- 4月27日 連續兩天的反核示威：總統府周邊舉行「十萬聯署、衝破鳥籠公投」的大型反核集會。示威遊行途中，兩萬人的示威隊伍突然突破警備，佔領了台北車站前的忠孝西路。
當夜，馬總統和國民黨籍地方縣市長會談時表示，決議「核四停工」；反核團體提出反駁「停工只是暫時的，距離廢除相差甚遠」，繼續佔領。
- 4月28日 清晨，警察出動鎮暴部隊與消防噴水車，強制驅離佔領群眾。許多民眾因而受傷。
- 4月30日 林義雄表示「核四停工，讓我充分看到人民的行動力」，停止無限期絕食。
- 5月1日 烏克蘭學生在網路上上傳聲援太陽花運動的影片。

5 原註
主張台灣獨立、主張改正集會遊行法與公民投票法，長年在立法院靜坐抗議的團體。以年長者居多。



- 5月3日 「割闌尾」國會議員罷免運動開始。闌尾（盲腸）是切除也無妨的無用器官，同時也和「爛委」諧音。在網路上投票，選出在服貿協議審查中違反民意的立委，進行罷免活動，並且到議員辦公室示威抗議等等活動。
-
- 5月18日 一部分參與佔領立法院的運動人士，成立「島國前進」(Taiwan March) 組織。
-
- 5月25日 高雄舉行公民憲政會議：除了服務貿易協議以外，也討論自由經濟區域問題。
-
- 6月13日 立法院臨時會議重新審查兩岸三大案：服務貿易協議、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自由經濟示範區。
-
- 6月25-27日 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訪問台灣。這是第一次以「主任」這個官方身分來台訪問。
發生多起反黑箱協議的示威（黑色島國陣線以鐵鏈綁身的方式阻斷交通、潑漆撒冥紙抗議等等）。
-
- 6月28日 因為示威不斷，張志軍取消當天的訪問行程返國。
-
- 6月29日 學運領導人之一陳為廷赴香港，計畫參加香港7月1日的示威，但被禁止入境。
-

8月22日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所提出的，有關核四存廢的公投案，在立法院遭到否決。自此以來，台灣不斷成立各式各樣的民間團體，並且互相串聯活動。

（本表由台灣大學許仁碩、早稻田大學鍾宜庭、早稻田大學何時宜共同製作）



本書的內容，除了來自太陽花運動當時的攝影、採訪、訪談之外，還來自太陽花運動之後，在台灣與日本所進行的對談、報告會、展覽會、圓桌會議等許許多多的交流活動。特別是透過以龔卓軍與賴志盛為首的《報民》的成員，他們在台北製作《報民》的過程，以及之後在台南舉辦的展覽會與研討會——「絕對不純粹」，讓我得到了這場運動與當代藝術深刻的關聯，以及東亞運動的觀點。此外在三月三十日，許多台灣的創作者聚集在台北熱烈的示威氣氛中，我也從他們那兒聽到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在日本，則有東京 PLACE M 畫廊所舉行的展覽會以及圓桌會議，讓我知道運動的後續發展。以上我所參與的活動由呂孟恂小姐擔任口譯與翻譯，對我幫助良多。另外，卷末詳細的運動時間表，感謝何時宜、許仁碩、鍾宜庭三人細心製作。雖然本書的內容，本人負有全部的責任，但是如果沒有這許許多多人的幫助，這本書也不會成形，特別在這裡表列，以示我由衷的感謝之意。

龔卓軍、賴志盛、陳怡潔、何采柔、吳梓寧、黃昶智、游適任、江洋輝、黃怡婷、王柏偉
 高俊宏、廖建忠、稻葉真以、陳劍青、李俊峰、金江、金潤煥
 小野、吳明益、胡淑雯、鴻鴻、伊格言、日星鑄字行、張介冠
 李鳳嬌、李鳳新、呂孟恂、周芝羽、陳佾均

張照堂

李家驊、林欣怡、秦雅君、曾房英、羅文岑、李基宏、張恩滿

三木學、丸川哲史、池田剛介、何時宜、永原康史、陳思婷、瀨戶正人、明石建五

小倉禮子、許仁碩、鍾宜庭、丸山哲郎

絕對空間（台南）、駒空間（台南）、PLACE M（新宿）、週刊讀書人

SHADOW TIMES



- 《傘聚》(2015)，區家麟，天窗。
- 《傘裡傘外：民主前夕的香港故事》(2015)，陳奕廷，水牛。
- 《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2014)，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商周出版。
- 《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2014)，何榮幸，時報。
- 《在每一個可以改變歷史的時刻》(2014)，小野、張大魯，有鹿文化。
- 《天光》(2014)，太陽花學運攝影集製作團隊。
- 《318 佔領立法院：看見希望世代》(2014)，劉定綱主編，奇異果文創事業。
- 《那時 我在：公民聲音 318-410》(2014)，One More Story 公民聲音團隊，無限出版。
- 《從我們的眼睛看見鳥嶼天光：太陽花運動，我來，我看見》(2014)，許悔之主編，小

野、柯一正、范雲、余永寬合著，有鹿文化。

- 《暴民畫報：島國青年俱樂部》(2014)，黃子欽、朱宥勳等，健行。
- 《魯蛇之春：學運青年戰鬥手冊》(2014)，墨者工作室、張勝涵、黃守達、余崇任，公共冊所。

· 《衛生紙 74：太陽花詩集》(2014)，鴻鴻主編，黑眼睛文化。

- 《哲學的起源》(2014)，柄谷行人，心靈工坊。
- 《空間就是想像力》(2014)，畢恆達，心靈工坊。
- 《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治與去政治》(2014)，郭力昕，麥田。
- 《醞釀中的變革：社會建構的邀請與實踐》(2014)，肯尼斯·格根(Kenneth J. Gergen)，心靈工坊。

· 《台灣生死書：自己的國家自己救》(2014)，袁紅冰，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

- 《反抗的意志：1977-1979 美麗島民主運動影像史》(2014)，財團法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時報。
- 《公民不冷血：新世紀台灣公民行動事件簿》(2013)，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紅桌文化。
- 《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2013)，戴耀廷，天窗。



- 《再寫攝影》(2013)·郭力昕·田園城市。
- 《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2013)·陳翠蓮、吳乃德、胡慧玲·衛城。
- 《空間與權力：政治地理學新風貌》(2012)·裘·潘特(Joe Painter)·艾利克斯·傑佛瑞(Alex Jeffrey)·韋伯。
- 《公民，不服從！梭羅最後的演講》(2012)·亨利·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紅桌文化。
- 《審議民主指南：21世紀公民參與的有效策略》(2012)·約翰·蓋斯提爾(John Gastil)·彼得·列文(Peter Levine)·群學。
- 《教育小革命：大學生的十堂社會參與課》(2012)·東華大學教學卓越中心社會參與教師社群·心靈工坊。
- 《革命將至：資本主義崩壞宣言 & 推翻手冊》(2011)·隱形委員會(Comite invisible)·行人。
- 《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2011)·何明修、林秀幸主編·王金壽、江以文、杜文苓等著·群學。
- 《柄谷行人談政治》(2011)·柄谷行人·小嵐九八郎·心靈工坊。
- 《倫理 21》(2011)·柄谷行人·心靈工坊。

- 《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2010)·蕭新煌、顧忠華主編·巨流圖書公司。
- 《全球崛起的公民媒體：新聞革命進行式》(2010)·胡元輝、李岳昇等·允晨文化。
- 《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每個公民都該知道的民主故事與智慧》(2009)·賴瑞·戴蒙(Larry Diamond)·天下文化。
- 《群眾運動聖經》(2008)·賀佛爾(Eric Hoffer)·立緒。
- 《空間就是權力》(2001)·畢恆達·心靈工坊。

革命的做法

從318太陽花看公民運動的創造性

革命のつくり方 台湾ひまわり運動—對抗運動の創造性

作者—港千尋(Minato, Chihiro) 譯者—林暉鈞

出版者—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王浩威 總編輯—王桂花

執行編輯—趙士尊 美術設計—羅文岑

通訊地址—10684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53巷8號2樓

郵政劃撥—19546215 戶名—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702-9186 傳真—(02) 2702-9286

Email—service@psygarden.com.tw 網址—www.psygarden.com.tw

製版·印刷—彩峰造藝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8990-2588 傳真—(02) 2990-1658

通訊地址—248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二號

初版一刷—2015年3月 ISBN—978-986-357-025-7 定價—500元

革命のつくり方 台湾ひまわり運動—對抗運動の創造性

Copyright © by 港千尋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PsyGarden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革命的做法：從318太陽花看公民運動的創造性／港千尋著；林暉鈞譯。

--初版.--臺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15.03 面：公分

譯自：革命のつくり方：台湾ひまわり運動—對抗運動の創造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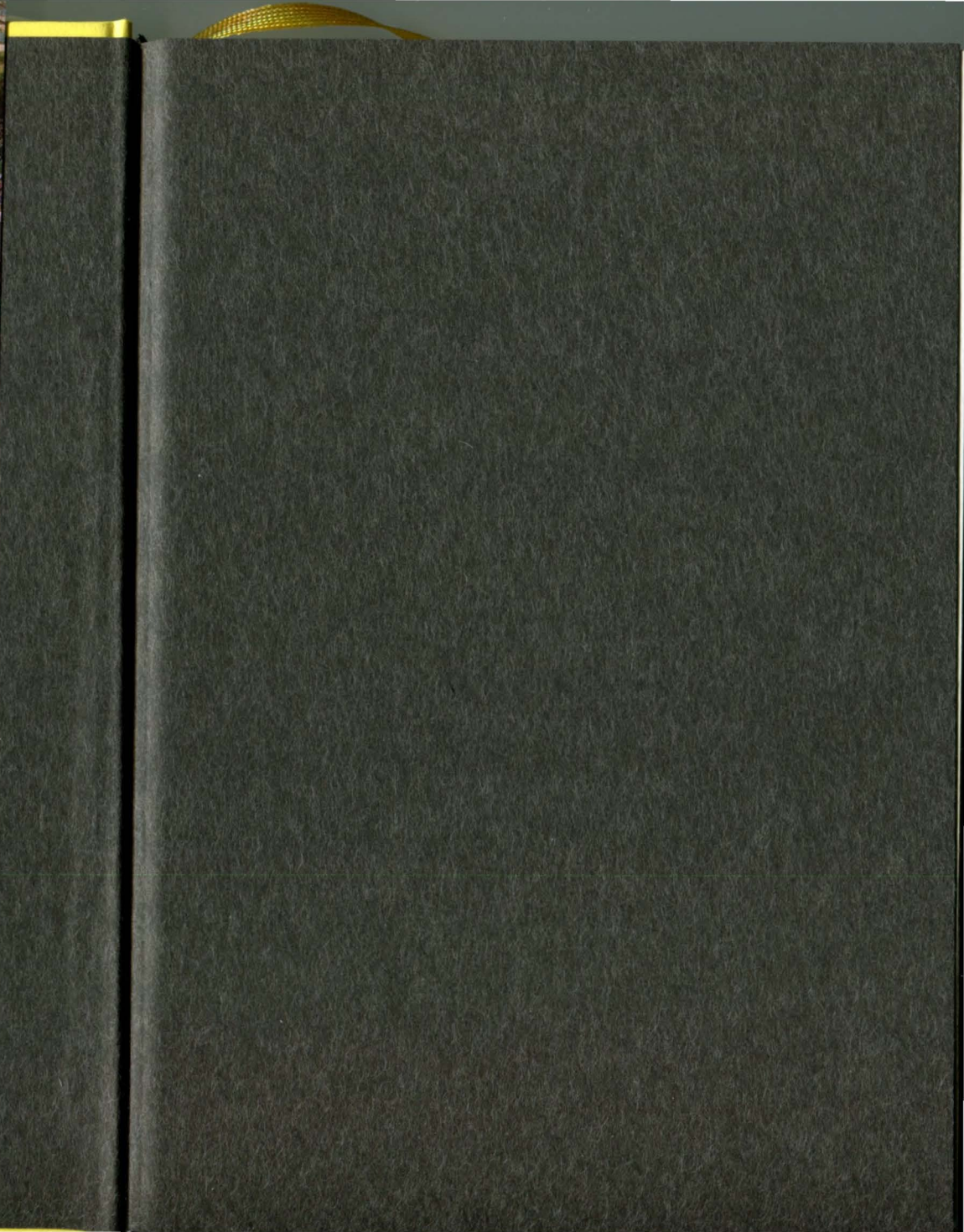
ISBN 978-986-357-025-7(平裝)

1. 社會運動 2. 學運 3. 臺灣

541.45 104001586



一個市民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社會，
不會產生為他者設想的人際關係。
——港千尋



當立法院被占領，那些沒被分配到語言權利的人開始說話，議會原本的意義才顯露出來。——港千尋

1980年以降，全球化加速，各國公民運動在這個浪潮下風起雲湧，是對不公不義的反抗，也是一次次民主出路的新實驗。關心公民運動的國際知名攝影家、日本學者港千尋長期走訪各國運動現場，2014年，他在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發現了「革命的做法」。

非暴力，不奪權，這場革命很特別。在各國民運紛紛遭到政府武裝驅離時，太陽花運動卻以和平的訴求成功扭轉輿情。它是如何辦到的？

「我們必須洞悉自己與這些聲音的關係，聆聽這個被佔領的都市空間中學生與人民所發出的『聲音』。」港千尋擅長解析空間中人群的「移動」與「身體布局」，他見證了學生們如何透過都市與議會空間的另類使用，傳達出民主的理念與現實。在這本攝影文集裡，除了呈現作者穿梭各公民運動現場的紀錄與分析，更拆解了太陽花運動的元素：黑箱、議會、向日葵、身體性……生動地呈現了一場時代洪流中的創意革命，彷彿告訴世人：如果你想革命，且看太陽花怎麼做。



9 789863 570257

00500